

# 2017 亚洲经济论坛

## “一带一路”的影响与意义

联合主办单位：

世界银行  
与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

研讨会（一）：东盟的竞争力、贸易、宜居性和生产力

2017年8月28日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黄仲涵楼大堂

## 论坛论文集

编辑：

陈企业

林道维

蔡娇

叶欣怡

在2016、2017年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及公民社会项目的“最佳大学附属智库”排名中，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在九十多个全球智库中排名第十三，并在亚洲排名第二，在新加坡排名第一。

##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简介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成立于2006年八月，隶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本研究所致力于建立学术领先的智囊网络，以资理解与发展东盟地区的竞争力。通过对城市群及其他可比较地区竞争力的研究，并力求发现可能阻碍政策干预发挥作用的问题与挑战，我们寻求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途径。

## 愿景与使命

- 本所总的愿景在于以专业智库的身份，进行高可信度并具政策影响力的研究。
-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对竞争力的识别与对区域竞争及协同互补的促进，建立一所立足于世界的一流的政策智库。
- 我们引导与促进对话，以期积极影响亚洲国家政府间公共政策领域中的议程。
- 我们进行以实证为基础的公共政策效果评估，以分析它们的绩效与社会包容性。

## 重点研究项目与合作伙伴

- 一、在面临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竞争以及区域互补的大背景下，对竞争力发展趋势的识别与东盟地区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分析。
- 二、在区域经济整合的背景下，以国际化尺度确定新加坡的竞争优势并开展相关政策分析。
- 三、我们持续定期发布三个城市宜居性排名，对象分别为六十四个全球城市，一百个大中华城市以及十七个东地级市。
- 四、我们对印度二十一个邦及印度尼西亚三十三个省份研究设立了包含投资者吸引力，营商友好度和竞争力政策三方面的宜商指数排名。
- 五、我们与世界银行(2015及2016)、新加坡标新局(2014)以及欧洲央行(2014)签署了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
- 六、我们与包括上海社科院(2016)，山东社科院(2015)，重庆市人民政府(2015)，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15)，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合作意向书，2014)以及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2015)在内的多个大中华区研究机构签署了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
- 七、我们与印度安得拉邦(2015)，比哈尔邦(2015)，恰蒂斯加尔邦(2015)，中央邦(2015)，奥里萨邦(2015)以及旁遮普邦(2015)的六个首席部长办公室签署了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
- 八、我们与印度尼西亚印尼经济统筹部(2016)、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2014)，印度尼西亚农业部下属农业研究与发展机构(2014)，印度尼西亚总统办公室发展监测和监督行动组(2013)以及印度尼西亚雇主协会(2013)签署了共四份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
- 九、我们与包括越南总商会(2016)、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5)，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2015)，菲律宾发展研究所(2015)，泰国发展研究所(2015)，以及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2015)在内的多个东盟智库签署了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

##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重点研究方向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ACI)一直积极从事与新加坡和亚洲地区有关的经济研究。多年以来，ACI的研究集中于定量的竞争力研究和模拟，研究结果包括了其方法论的应用和对地区发展的见解，并发行了系列丛书。在此阶段，ACI有以下三个重点研究方向：

### 研究方向一：省级经济体的竞争力研究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通过实证的方法，系统地研究省级经济体的竞争力，其研究方法全面涵盖了相关指标并将指标归类到不同层次（大类及小类）中。ACI 的许多研究项目，包括大中华经济圈、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东盟国家的竞争力研究以及其他主题研究项目，均采用了这一方法论，并根据具体的大类和指标进行了不同的调整。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竞争力研究超越了传统研究，通过运用“what-if”模拟研究，模拟每个省提升最弱 20% 指标的情况，对各省提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帮助其提升排名。

### 研究方向二：微观层面公司级别的竞争力研究

微观层面公司级别的竞争力研究是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第二个重点研究方向，因为公司在生产力、生产效率及管理方面的竞争力在本质上也是相当重要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活动的流动性、边界的模糊化和对公司竞争力决定因素和动力的理解，对于决策者应对当下竞争愈发激烈的经济环境显得尤其重要。因此，ACI 与欧洲中央银行合作，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以欧洲竞争力网络的数据库和方法作为公司生产力研究的坚实基础。ACI 预见到了竞争力网络在亚洲的扩展，因此开辟了涵盖亚洲 16 个经济体的亚洲竞争力网络研究。

### 研究方向三：新加坡的长期经济增长策略和公共政策分析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第三个重点研究方向是在未来数十年的变动环境和未来趋势下，伴随新兴机会出现，新加坡的长期经济增长策略。具体来说，ACI 将通过评估以往的政策成功、识别新问题和现有的政策空缺，运用系统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研究调查以及量化的方法论和实证数据，批判性地检验新加坡公共政策的强项和需要提高的领域，来影响我们的政治专家网络。

## 创始赞助人和国际咨询小组

---

### 创始赞助人:

杨荣文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新加坡前外交部长

### 国际咨询小组:

#### 联合主席:

迈克尔·波特教授 (2006-2010)

哈佛大学商学院威廉·劳伦斯主教大学教授

杨敏德女士 (2006-2012)

溢达集团董事长

#### 成员:

马凯硕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昆托罗·孟古苏布洛托教授

印度尼西亚总统办公室发展监测和监督行动组组长

纳拉亚纳·穆尔蒂先生

Infosys 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烈国先生

新加坡标准、生产力创新局主席

罗锦贤先生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常任秘书长

杨颖仪女士

新加坡公共服务署常任秘书长

陈金梁教授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

##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

### 所长:

陈企业副教授 (2011 至今)

陈光炎教授 (2011 至今)

# 内容

简介 .....	1
内容 .....	4
摘要 .....	6
欢迎致辞稿 .....	11
陈永财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候任校长、常务副校长(学术事务)兼教务长 .....	11
法蒂玛杜尔易卜拉希玛女士 (Ms Fatouma Toure Ibrahima), 世界银行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部代理主任和运营顾问 .....	13
主礼嘉宾演讲 .....	15
尚穆根先生, 新加坡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 .....	15
问答环节 .....	40
主题演讲 .....	45
廖文良教授, 盛裕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兼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务长教授 .....	45
问答环节 .....	60
第一节: 东盟经济体的竞争力分析及实际汇率对外贸的影响 .....	64
午餐会演讲 .....	66
任冬艳女士, 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 .....	66
张怡女士,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运营主管 .....	70
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省份与区域竞争力分析的竞争力分析及实际汇率对外贸的影响 .....	72
第三节: 新加坡中小企业生产力与效率监控指数 .....	74
第四节: 评估城市宜居性与生活成本: 宜居城市一定是昂贵又难以承受的吗? .....	76
第五节: 促使越南成为一个平衡, 可持续和竞争力提升的经济报告: 一个批判性的评估和其发展潜能 .....	78
闭幕词和未来发展方向 .....	80
阿尔穆德卫兹女士 (Ms Almud Weitz), 世界银行交通全球实践主任 .....	80
马凯硕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	82
2017 亚洲经济论坛议程 .....	84
演讲者、评论员 和研讨主持人的简介 .....	88
媒体报道 .....	96
For Belt and Road to succeed, China must work harmoniously with other countries: Shanmugam, 2017 年 8 月 28 日 .....	96
先趕間諜後讚最強 完美示範打倒昨日的我 新加坡突力撐一帶一路, 2017 年 8 月 28 日 .....	98
尚穆根: 智库扮演着重要角色 必须保持客观, 2017 年 8 月 28 日 .....	103
尚穆根: 我国会继续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2017 年 8 月 28 日 .....	104
【亚洲经济论坛】尚穆根: 支持一带一路 积极发挥影响力, 2017 年 8 月 28 日 .....	105
尚穆根: 中国有能力克服挑战 实现一带一路愿景, 2017 年 8 月 28 日 .....	106
尚穆根: 中美双方要找出新的共存方式, 2017 年 8 月 28 日 .....	107
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面对风险 尚穆根: 中国应争取他国合作支持, 2017 年 8 月 29 日 .....	108
智库应在必要时提供独立客观观点, 2017 年 8 月 29 日 .....	108
中国将很快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2017 年 8 月 29 日 .....	108
尚穆根: 新加坡应求新求变为‘一带一路’做贡献, 2017 年 8 月 29 日 .....	109
S'pore must stay smart to profit in 'multi-polar world', 2017 年 8 月 29 日 .....	110

<i>Harmonious collaboration key to success OBOR: Shanmugam, 2017 年 8 月 29 日</i> .....	110
<i>S'pore in 'a position to benefit' from Belt and Road push, 2017 年 8 月 29 日</i> .....	111
<i>Think tanks 'may disagree with Govt, but not under a foreign state's influence', 2017 年 8 月 29 日</i> .....	111
<i>Firms urged to 'act fast to secure first-mover advantage', 2017 年 8 月 29 日</i> .....	111
<i>Think-tanks useful for policymaking, but must be objective: Shanmugam, 2017 年 8 月 29 日</i> .....	112
<i>Think-tanks must be objective: Shanmugam, 2017 年 8 月 29 日</i> .....	113
<i>Singapore hails Belt and Road, 2017 年 8 月 29 日</i> .....	114
<i>S'pore well-positioned to reap gains in Belt &amp; Road: Shanmugam, 2017 年 8 月 29 日</i> .....	116
<i>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s Facebook post on Minister Shanmugam's speech on One-Belt One-Road, 2017 年 8 月 31 日</i> .....	117
<i>Q N A Session At Asia Economic Forum On "The 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2017 年 8 月 31 日</i> .....	118
<i>"一带一路"理念须集体来实现", 2017 年 9 月 2 日</i> .....	124

# 2017 年亚洲经济论坛

## 摘要

伴随着对贸易和金融的逆全球化会压制全球经济的担忧，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任务是克服相对不太有利且不太开放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系统所带来的挑战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主持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机会，通过加强和深化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连接来加强全球经济合作以实现更加一体化，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增长。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与世界银行共同在 2017 年 8 月 28 至 29 日举办了主题为“一带一路”战略：效果与影响”的 2017 亚洲经济论坛。该论坛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平台，以便就“一带一路”战略带给亚洲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商议，讨论及分享学术和政策上的见解。此外，该论坛还发现了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初步研究结果对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贸易，宜居水平和生产力等经济意义上的相关问题的传播。

2017 年亚洲经济论坛研讨会（一）聚焦于“东盟经济体的竞争力、贸易、宜居水平和生产力”，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候任校长、名誉校长（学术事宜）兼教务长陈永财教授，与世界银行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部代理主任和运营顾问法蒂玛杜尔易卜拉希玛女士（Ms Fatouma Toure Ibrahima）致欢迎词。陈教授强调一个诸如“一带一路”这样大型的连通计划有潜力加速亚太和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增长。卜拉希玛女士非常恰当地重申了“一带一路”的成功会产生的积极经济影响的巨大规模，她指出 64 个国家和 62% 的世界人口将受益于更紧密的基础设施连通性和因此降低的贸易成本，因而成为支持这一宏伟举措的基础。

继欢迎辞之后，本次论坛荣幸地请到了新加坡共和国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先生为论坛主宾，他对“一带一路”的经济，政治及地理战略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叙述。他的深刻和发人深省的演讲介绍了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两国相对力量变化所决定的地缘政治趋势的改变。尚穆根部长回想起今天“一带一路”的宏伟愿景实际上是试图重现和复兴长期盘踞历史世界贸易中心的古老丝绸之路的历史重要性。不过，他同时警示说，中国必须注意中亚一些国家存在显著的体制挑战，并调整中国与俄罗斯和印度等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

尚穆根部长最后指出，新加坡一直都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举措，并且必须继续创新，利用这些努力产生的更多新的机会，以在多极化的世界秩序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以赞扬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囊团排名中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他的演讲，并指出他期待在未来看到更多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在这个引人入胜吸引了大量听众的演讲结束后，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所长陈企业副教授主持了一个生动的问答环节。尚穆根部长回应了关于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西方关系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竞争态势不断变化等各种问题。

本次论坛随后的主题演讲来自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及盛裕控股集团主席兼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务长教授廖文良教授。他的演讲标题为“从地缘经济角度看待一带一路”，基于城市化与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 21 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的假设，阐释了“一带一路”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他指出，尽管中国有能力执行这样一个巨大的倡议，但如此巨大的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往往会有相关的执行风险。这种风险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实质性的机会，包括与新加坡的合作会证明这对于该倡议的成功至关重要。特别地，廖教授强调新加坡作为全球领先金融中心之一的独特作用使新加坡处在一个能够对“一带一路”的成功作出特别贡献的位置。从被新加坡金融机构管理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85% 的投资和中国通过新加坡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33% 的投资就是最好的印证。

在最后，廖教授重申了“一带一路”计划是地区发展的主要动力的显著性，以及这个计划的实施会如何对这个大型经济计划的相关国家产生各种积极的溢出效应。最后他强调新加坡和海外的企业必须共同努力去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提供的机会。陈企业副教授主持了问答环节，随后廖教授就管理中国政治腐败和所涉及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私营部门能力建设需求能够从“一带一路”中受益等方面提供了深入的见解。在以论坛主宾尚穆根部长发表的讲话和廖文良先生的主旨演讲为中心集中讨论之后，论坛进行了专题会议，涵盖了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团队开展的各种相关研究课题的初步实证结果。

研讨会的第一节为“东盟经济体的竞争力分析及实际汇率对外贸的影响”，专注于两项重要的政策课题。第一个课题涉及东盟经济体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重申了东盟经济体之间的发展鸿沟。此项竞争力调查结果在引入另一种客观加权方式“沙普利权重”后依旧稳健。第二个课题是从贸易增值的角度看待东盟的汇率变动和波动对货物及服务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汇率升值与总出口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尽管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多进口商品的国家通常能很大程度上抵消这些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强调了加剧的汇率波动对出口业绩影响显著且出口商品中较高的进口含量对其并无抵消影响。

第一节的评论者包括东盟+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李才永博士（Dr Lee Jae Young），他是集团主管和主要经济学家并且负责监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日本的经济。另一位是马来西亚国际研究所客座教授兼新加坡国立大学尤索夫依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谭小燕博士。两位评论者都赞扬了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相关性，严谨性和适用性。特别地，谭小燕博士指出这些调查结果与观察到的东盟经济体发展鸿沟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李才永博士重申了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了解东盟贸易的重要性，尤其是为了抵抗日益增强的反全球化情绪。

论坛的第一节结束后，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光炎教授主持了两场杰出的午餐会谈。第一位尊贵的演讲嘉宾是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地区的总经理任冬艳女士，她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融资”。任冬艳女士精简地介绍了“一带一路”并重点介绍了建行等金融机构对其进展的重要性。她进一步罗列出了建行在资助与“一带一路”有关项目方面的具体作用，并且表示有兴趣继续在本地区和其他地区提供支持。

第二位尊贵的午餐会谈嘉宾是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的运营主管张怡女士。她介绍了“清算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张女士列举了人民币清算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在加强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市场联系方面是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她还详述了“一带一路”的相互联系及其互补性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工商银行的工作是如何促进和推动了这一过程。

午餐后，论坛开始了第二节致力于了解“印度尼西亚次国家的竞争力，汇率和贸易业绩”的会议。会议介绍了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对印度尼西亚各省份的研究，包括2017年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对印度尼西亚各省份竞争力排名和模拟的年度更新以及汇率变化（变动和波动）对省级贸易流量的影响。竞争力的研究结果显示了竞争力明显高于其他省份的六个爪哇地区省份的主导性。与实际汇率变动对印度尼西亚省级出口的具体影响有关的结果表明，实际汇率升值阻碍了省级出口，但是实际汇率的波动并没有任何显著的经济影响。

第二节的评论员包括印度尼西亚巴布亚天堂鸟湾大学（Cenderawasih University）参议院主席巴达莎勘布亚教授（Professor Balthasar Kambuaya）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贸易司贸易政策分析和发展署署长卡桑穆赫里博士（Dr Kasan Muhri）。这两位评论者都非常赞赏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有关研究政策的实用性。勘布亚教授建议可以对研究结果补充一些有关自然资源丰富但竞争力落后的省份的具体案例分析。卡桑博士建议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可以将其对汇率的研究扩展到产品层面。

论坛第三节名为“新加坡中小企业生产力追踪和效益管理监督（PTEM）”介绍了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正在进行的关于构建一个综合性 PTEM 指数的研究，以便了解新加坡中小企业生产力和效率的动态。演讲重申了这项研究与新加坡政府为了协助本地中小型企业发现其作为有前途的本地公司的潜力所做的，致力于提高他们生产力并且监督管理效率的承诺的一致性。该演讲还强调，该研究项目符合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跟随着政府旨在帮助中小企业创新，国际化和数码化技术的未来计划所制定的企业未来计划。该演讲进一步罗列了该项目的核心目标包括：（i）通过建立商业信息矩阵来推动中小企业的信息获取过程；（ii）一个可能的能让中小企业通过竞争力排名和模拟分析来确定其相对优势和劣势的过程；（iii）聘用业界专家为中小企业提升数码能力，创新和扩大提供定制咨询；（iv）协助劳工发展署设计更符合中小型企业需要的培训课程；及（v）带动跨国基准分析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中小型企业的比较。

此节会议的评论者包括中华民国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全教授与台湾亚洲大学金融与大数据研究中心首席教授黄永强博士。两位评论者都表示这项研究非常深刻，因为它帮助决策者借助一个新颖且全面的数据库来鉴定与企业生产力和效率有关的实际问题，从而使对企业的相关支持更加灵活。

第四节会议为“评估宜居程度和生活成本：宜居城市是否昂贵并且难以负担？”。该会议展示了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关于全球外派人员和普通居民生活成本的最新研究成果。演讲还通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对比案例研究，探讨了竞争力、生活成本、工资、购买力与宜居程度之间关系的交织性质。本次会议的评论者为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蒂莫西麦克唐纳先生（Mr Timothy McDonald）和马来西亚国库控股研究与投资战略副总裁许福禄先生。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认为由于两组群体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异，经济学人智库衡量外派人员生活费用的研究并没有反映出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麦克唐纳先生同意了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判断。他还指出，对生活成本的分析是不够的，并强调了追踪工资和购买力对衡量负担能力的重要性。与麦克唐纳先生一样，许先生对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着重分析超出生活成本的因素，如工资和购买力的研究表示欣赏。许先生还建议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可以扩展到跟踪不同收入群体的普通居民的购买力，以了解城市层面上的不平等程度。

当天最后一节，也是第五场题为“关于越南平衡，可持续和强化竞争力的研究：批判性评估及发展潜力”，为越南的竞争力提供了综合评估，并概述了该国实现可持续增长及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一些确切的方法。在各种显著的发现中，该演讲强调，越南的决策者必须培育微型及中小型企业以实现包容性增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强化市场机构；最终利用河内的优势发展越南北部。

论坛还有两位尊贵的评论者，他们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阮庭宫博士（Dr Nguyen Dinh Cung）与越南工商会主席兼总裁、2017 年亚太经合组织总裁峰会主席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第十四届议会议员武进禄博士（Dr Vu Tien Loc）。这两位专家都特别感激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对越南经济的分析及政策建议。阮庭宫博士进一步表示，对“一国两制经济体”的出现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观点，他欢迎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为越南提供更多政策建议以提高其机构质量。武博士表达了他非常热忱地想要与越南总理，河内党委书记以及市人民委员会主席分享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关于将河内发展成为越南和本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建议。

论坛的闭幕致辞由世界银行交通全球实践主任阿尔穆德卫兹女士（Ms Almud Weitz）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发表。卫兹女士在闭幕致辞中指出，近年来全球情况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她还强调，这些发展都会在不久的将来保持下去并且每个发展都将有其自身的衍生物，这意味着通过更缜密的研究来更好地了解不断变化的动态是重要的。卫兹女士强调需要加强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与世界银行集团之间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各国了解其成为“一带一路”等举措的一部分所可能获得的实质性结果。

马凯硕教授最后给出的一些发人深省的评论收尾。他强调，尽管“一带一路”是中国驱动的举措，但是除非所有相关国家对推动预期目标拥有强烈的所有权，否则该举措不会走得很远。此外，他还指出，由于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需求相对较大，东盟经济体将在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中比中亚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他强调，在新加坡本地，重要的是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所有权并不集中在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相反地由于中小企业在新加坡的分量越来越重，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也应该有这样的所有权。马凯硕教授感谢世界银行集团与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合作，并进一步祝贺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团队使本次论坛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2017 年亚洲经济论坛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黄仲涵楼大堂举行

## 欢迎致辞稿



### 陈永财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候任校长、常务副校长（学术事务）兼教务长

尊敬的内政部长及法务部长尚穆根先生、世界银行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部代理主任和运营顾问法蒂玛杜尔易卜拉希玛女士（Ms Fatouma Toure Ibrahima）、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和新加坡盛裕控股集团主席廖文良教授、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尊敬的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

早上好，我很荣幸看到大家对世界银行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共同举办的 2017 亚洲经济论坛有着如此巨大的反响。我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对你们致以热烈的欢迎，欢迎你们来到绿树环绕、风景秀丽、具有历史意义的武吉知马校园。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一带一路战略：效果与影响”。这一巨大工程有加速亚太、中欧、东欧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能，是一个对连接性的宏伟蓝图。它不仅是地理上的连接，还包括数字网络连接以及人文网络连接。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尊贵的来宾，尚穆根部长，来听他分享政府关于这一战略以及新加坡所扮演的惠及东盟和亚洲的催化作用的想法。之后，廖文良教授会谈谈新加坡公司如何更进一步国际化，开拓新市场，以及如何进一步巩固及扩大新加坡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

至于午餐会谈，我们请到了两位尊贵的来宾，代表着两家全球最大的银行。他们会谈谈基础设施融资和清算银行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

本论坛还包含许多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进行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政策研究。研究的课题包括竞争力研究、东盟十国汇率及贸易表现的研究、中小企业生产力追踪和效益管理监督的研究等。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自 2006 年成立以来一路上经历了许多。在 2016 年及 2017 年，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及公民社会项目的“最佳大学附属智库”排名中，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在九十多个全球智库中排名第十三。作为新加坡一流的公立大学及亚洲地区全球领先的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寻求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通过研究、教育及创业来创造美好未来。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及全体教员，在学术研究上继续努力。

最后，我希望大家能享受这次的会议，从本次会议中获益。致我们尊贵的海外来宾及与会者，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听说了新加坡最新的品牌口号，“激情让一切成为可能”。这口号号召让那些有激情的访客能够在新加坡探索他们感兴趣的事物。我希望我们的外国友人能够有时间探索新加坡的风光和美食，享受这座现代化、不断进步、充满活力的花园城市。谢谢。

## 欢迎致辞稿



法蒂玛杜尔易卜拉希玛女士（**Ms Fatouma Toure Ibrahima**）  
世界银行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部代理主任和运营顾问

尊敬的尚穆根部长、廖文良教授、陈永财教务长、马凯硕教授、陈企业教授、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要感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与世界银行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像往常一样，陈教授的活力和精神促使我们今天聚在一起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重申我们致力于推动政策对话和辩论，从而带来更好的改变。

我们今天的联合活动反映了新加坡与世界银行之间五十年的伙伴关系。

在许多方面，我们与新加坡的接触是我们机构的最佳实践。从 1963 年开始，我们为建设港口、清洁供水设施、电信系统等早期发展提供了帮助。然而，通过艰苦的工作和决心，新加坡人已经充分利用了那一投资。因此，在十年内，你们不再需要我们的帮助，不再向国际组织借款。

再看看新加坡现在的情况：全球商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导者。你鼓舞人心的事例是部分推动我们在新加坡的办公室，世界银行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部门的动力。与亚洲各地的客户国家合作，我们的团队致力于制定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一些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并充分利用新加坡的专业知识和政策诀窍。

我们目前在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拥有约 200 名员工，这些机构是世界银行集团在致力于提供基础设施融资和城市发展方面的发展解决方案的机构。我们关注的是水、能源、交通和信息通信技术。我们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基础设施贷款都是由新加坡中心管理的。

但是，我们所动员的资金仍然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国家今天需要的一小部分。

许多数据被用来描述全球基础设施的差距。一些人说 1 万亿美元，另一些人说 2 万亿美元。但这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目前的投资水平还不够。世界银行每年发放的贷款中有一半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大约有 400 到 600 亿美元。这比仅仅印度尼西亚每年维持基础设施所需的数额还少。

持续的基础设施缺口将指向我们在未来两天要讨论的问题：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怀疑，所谓的“丝绸之路”的复兴对我们所有人能否产生影响。但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单一的问题是一个孤岛，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情都会跨越时区产生影响。

让我与你们分享一些说明了中国这一创新倡议的雄心的数字。通过基础设施更好地连接的国家数量达 64。将从较低的贸易成本中受益的世界人口达 62%。到目前为止，参与国家承诺的金额达 2400 亿美元，其中有一半是由中国承诺的。如果“一带一路”只实现了这些目标的一小部分，这在规模和影响力方面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引擎。

我们世界银行已经在这一倡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通过倡议在这些国家的持续承诺将达到约 860 亿美元。这笔投资中，近三分之一用于交通，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帕普-安格连铁路或哈萨克斯坦的东西公路项目。国际金融公司正在与丝路基金和中国公司合作，在巴基斯坦开发水电。我刚刚提到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向该地区提供了约 10 亿美元的担保，这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提供了超过 18 亿美元的投资。

此外，我们正与中国财政部合作，确定“一带一路”的关键基础设施瓶颈。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在新加坡中心都有广泛的代表，它们也在为帮助加速项目提供建议。

这是因为，就像在座的许多人一样，我们世界银行也意识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监管改革、有效治理、鼓励私营部门参与，这些都是我们试图解决的挑战。我们从经验中了解到，发展项目必须是一项持续几代人的前瞻性的活动。

我们还了解到，结果来自于有效的实施，而正如他们所说，有效的实施靠的是注重经常被忽视的细节。

最后，我们了解到，尽管政府在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增长和创造就业的真正引擎是企业家和私营部门。

如果这听起来很符合新加坡的故事，那么今天在这里举行的关于“一带一路”的对话是多么的合适。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这里参加了一个类似的会议，但参加的人只有这个房间的一半，所以可以看到，大家对今天的讨论真的很感兴趣。我相信，我提出的许多问题将在本次论坛上进一步讨论，我们期待着向你们学习。

感谢大家与我们共同分享这一事件，我希望你们能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谢谢！

## 主礼嘉宾演讲



尚穆根先生  
新加坡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

世界银行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中心代主任兼营运顾问  
法蒂玛杜尔易卜拉希玛女士 (Ms Fatouma Toure Ibrahima)

新加坡国立大学候任校长兼教务长  
陈永财教授

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兼盛裕控股集团主席  
廖文良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马凯硕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  
陈企业副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

1. 大家早上好。

1. 开场介绍

2. 在此感谢世界银行及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举办这场论坛，并邀请我发表演讲。今年 6 月，陈企业副教授向我发出邀请，我也应邀出席。

3. 我将就“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影响，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 (1) 首先，我将以地缘政治的大趋势为背景，提出看法，这个大趋势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一带一路”；
- (2) 其次，我将阐述“一带一路”的历史前沿，以及这段历史前沿对现今社会的影响；
- (3) 其三，我将例举一些我认为可能会加快“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以及改变地缘政治大趋势的国际局势。

4. 接着，我会列出我认为“一带一路”可能对（1）世界经济、（2）安全架构及（3）地缘政治方面带来的影响。

## II. （I）地缘政治趋势

5. 我们先来探讨地缘政治的大趋势。为什么要探讨大趋势呢？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因为这些大趋势而形成的，它也会给大趋势带来影响。

6. 这些趋势是什么？简单来说，这些地缘政治大趋势都是众所周知的。

7. 第一个趋势是中国的崛起。如果以绝对值而言，中国很可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尽管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话，中国的确还没达到最大经济体的规模，但这是迟早的事。无论在技术或军事方面，中国将在未来的 20 到 30 年里发挥其实力。中国的目标是成为超级强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考虑经济、技术和人口的综合指标，就可以得出个结论：中国成为超级强国的目标指日可待。

8. 第二个趋势是，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实力将会无可避免地出现变化。

9. 我得阐明的是：我并不是说美国正在走向没落。这是相对实力的问题，两国的相对性已经出现变化，并且还会继续改变。

10. 以绝对值而言，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肯定还需要好一段时间，才能在军事上和美国抗衡，更别说超越美国了。

11. 美国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和巨大的能力，在全球各地展现实力的能力让人赞叹。这在世界历史上的确是绝无仅有的。

12.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单方面行动的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尤其是在中国强烈关注的地区。

13. 中国在崛起的当儿也不能忽视美国的利益，必须找到两国和平共处的方式。

14. 我并不认为这些结论是特别有争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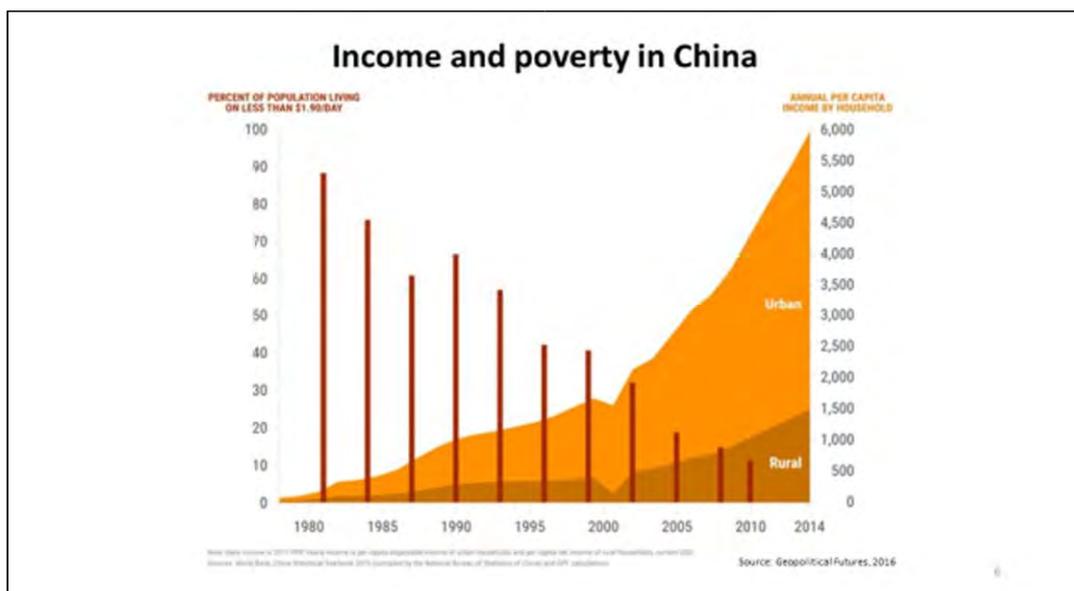
15. 让我以这个背景为前提，分享我于 2012 年，以外交部长身份在华盛顿说过的话。

“It is quite untenable to speak in terms of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 China with a population of 1.3 billion people is **determined to progress in all fields and take its rightful place in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It will succeed in that. Its people are bright and technologically savvy.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are not going to be contained.**

From Singapore’s perspec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not a zero-sum game**. The rise of China does not imply the decline of the US. **Competition between both countries can take place within a stable framework, with both countries playing a constructive role in world and regional affairs.”**

– Speech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ngapore Conference, 8 February 2012 <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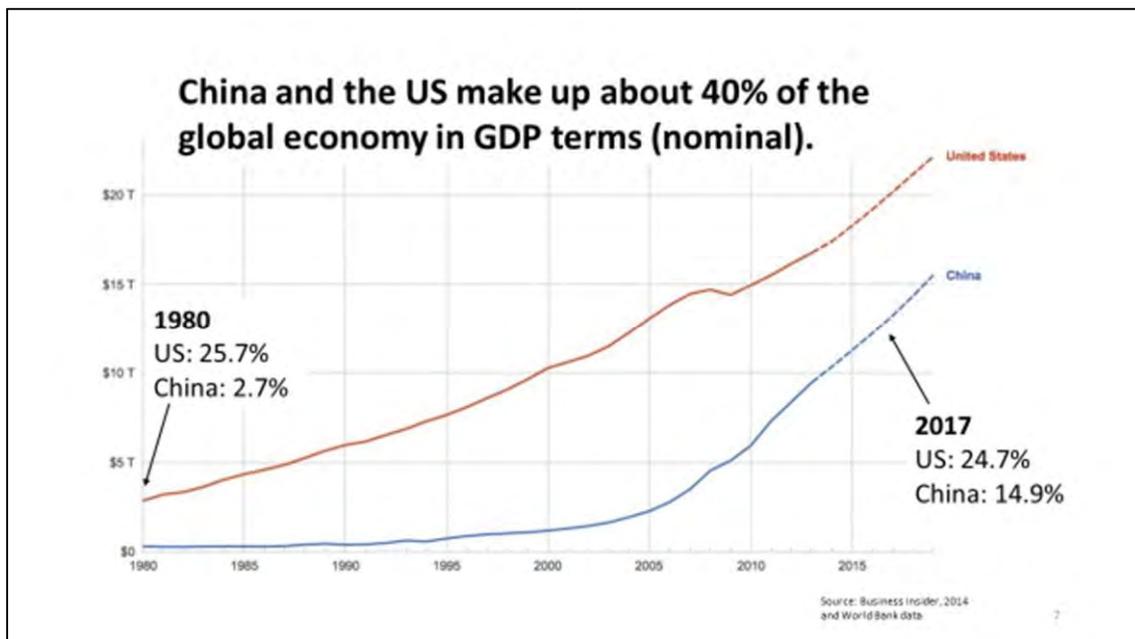
16. 当时，美国将重心转向亚洲是个重大议题。我很直接地说：有些人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是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之一，但这样的说辞在许多层面上是错误的。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任何手段都是行不通的，本区域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会支持这些行动。
17. 五年后的今天，中国在许多领域已追上最先进的国家，在一些领域更是已经超越了对手。
18. 如今，中国的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系统都已超越世界级水准。
19. 中国尽管受到诸多批评，却能在 30 年内让 7 亿人民脱离贫困。
20. 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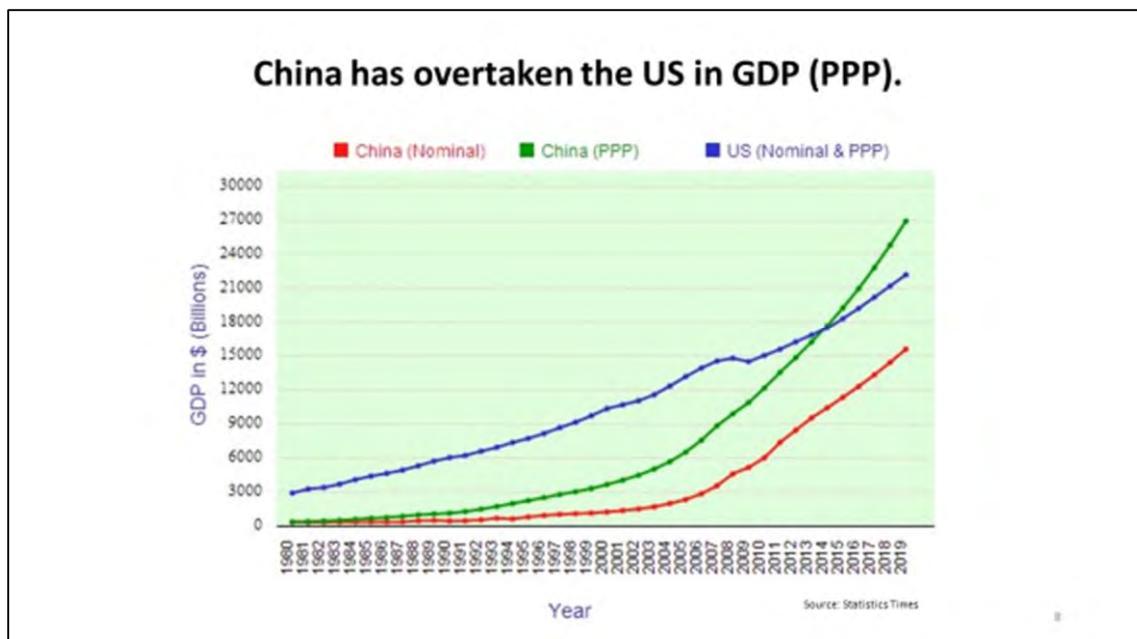
21. 因为 80 年代的中国，可是一个穷困落后的国家。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人士可要认清这个事实：7 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不同于他们的论述。

22. 我们来看看一些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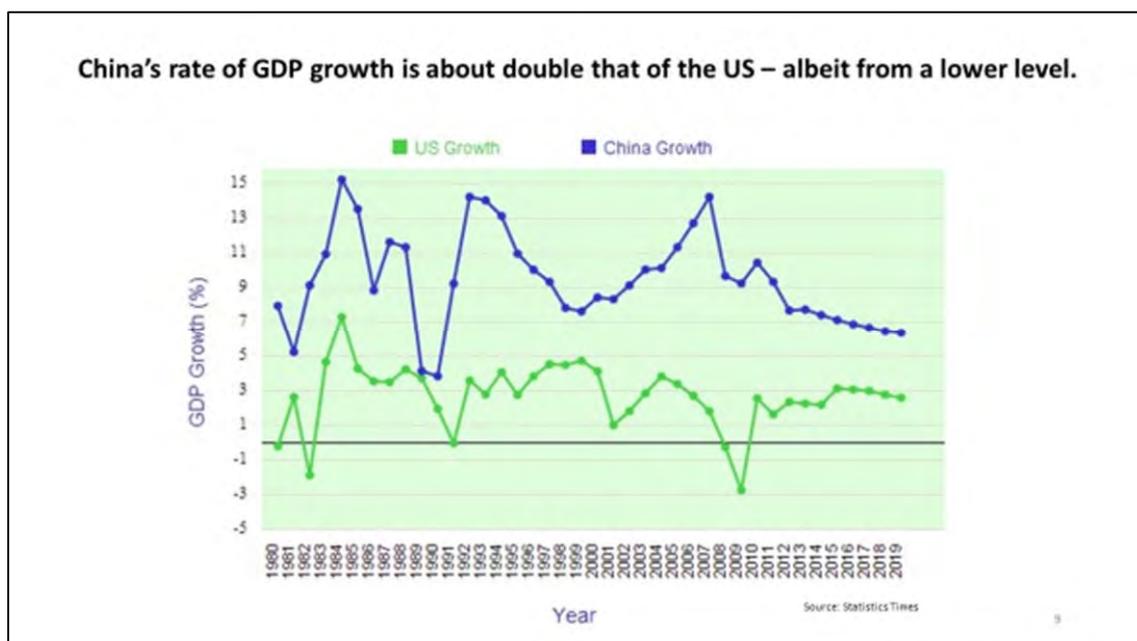
(1) 国内生产总值



23. 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的话，中国和美国占全球经济的大约 40%，美国现在占大约 25%，中国则是占 15%。回溯到 1980 年的话，美国当时占大约 26%，中国只占 2.7%。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美国则维持自身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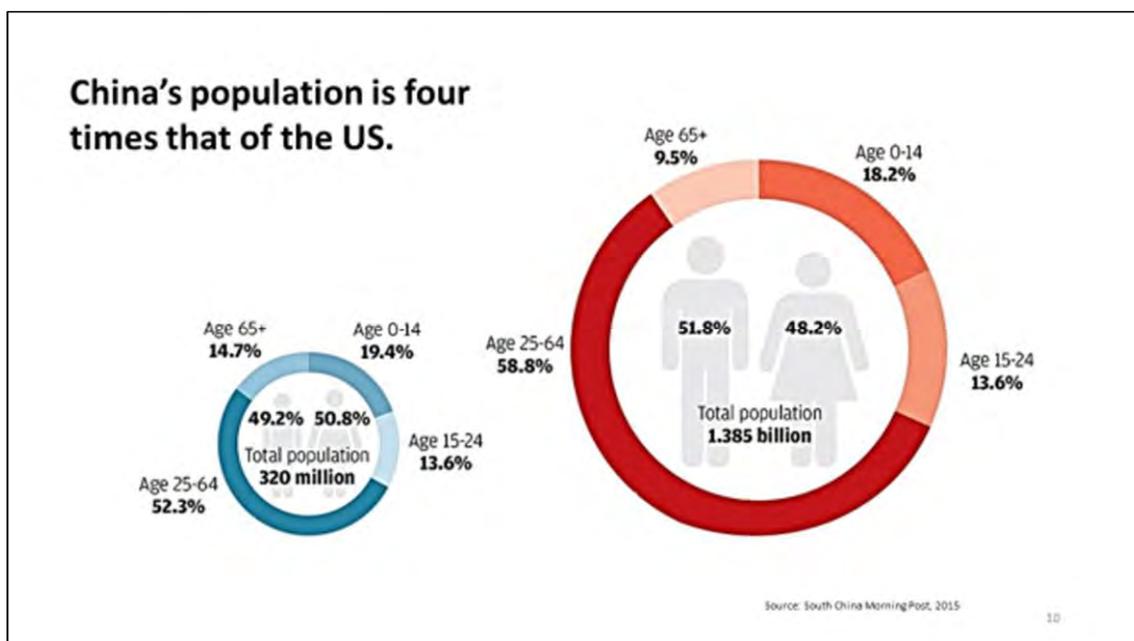


24. 中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将继续增加。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话，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越了美国。然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话，中国与美国仍有一段距离，这个情况很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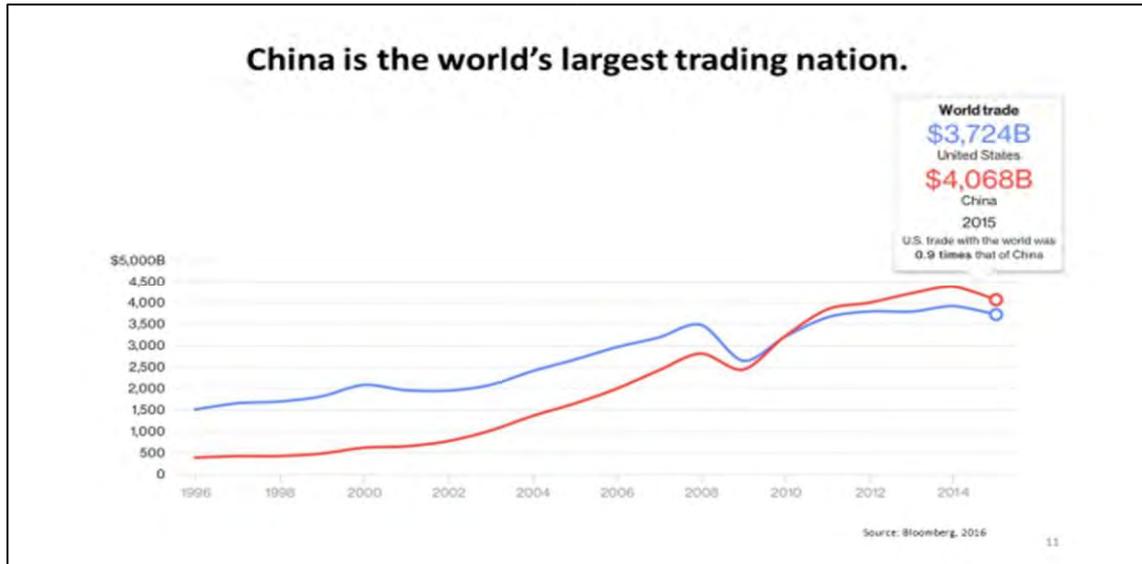
25. 不过，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大约是美国的一倍。

(2) 人口



26. 以人口来计算的话，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以年龄层来做对比，应该也会很有意思。

### (3) 贸易额



27. 以贸易额来看的话，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也是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28. 这些趋势是无法逆转的，任何企图逆转或阻止这些趋势的尝试都不可能成功。

29. 让我来举个例子。美国国会设下重重难关，想要阻挠中国在世界银行扮演应尽的角色。但是，一个拥有如此强劲经济、庞大外汇储备的国家，怎么可能因此受到阻挡呢？中国于是设立了自己的国际银行，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都急忙支持亚投行。

30. 因此，无论“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与否，这些潜在趋势都是不可阻挡的。

31. “一带一路”倡议除了是这些趋势产生的一个结果，也很可能进一步推动这些趋势。我稍后再回到这一点。

### III. (2) 历史语境

32. 现在让我谈谈第二个重点——历史语境。

[A] 学校所教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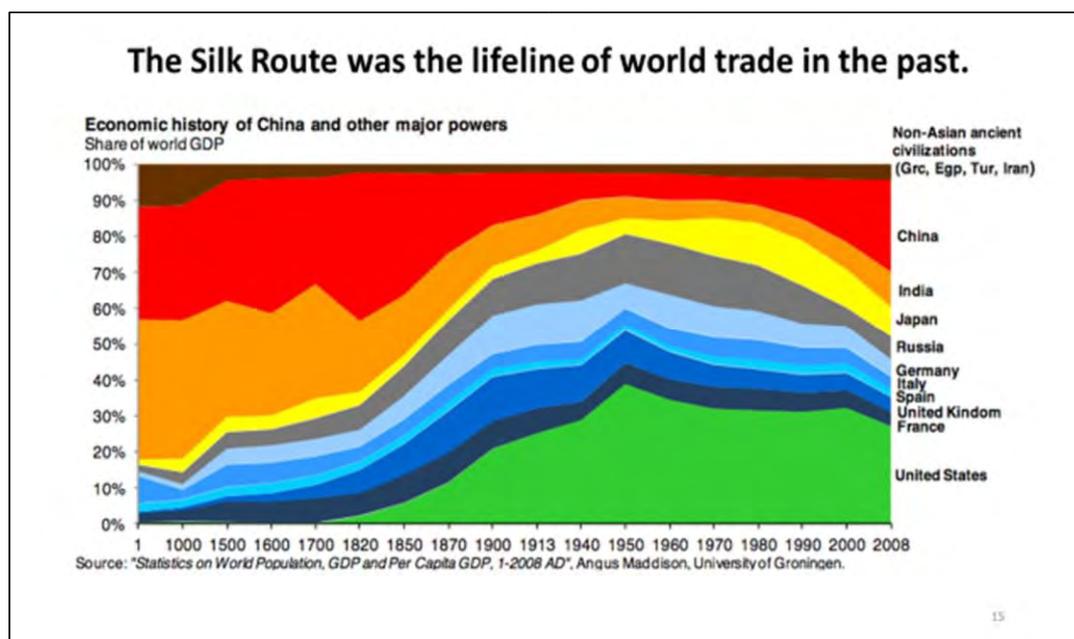
33. 我们在学校所学的历史（尤其是在殖民地国家），主要涵盖世界古代文明，例如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埃及、印度河流域、希腊和中国。但是，这些早期文明往往只是被视为西方崛起的序篇。

34. 关于中国、印度、伊斯兰教起源和犹太人流散史的内容，偶尔会穿插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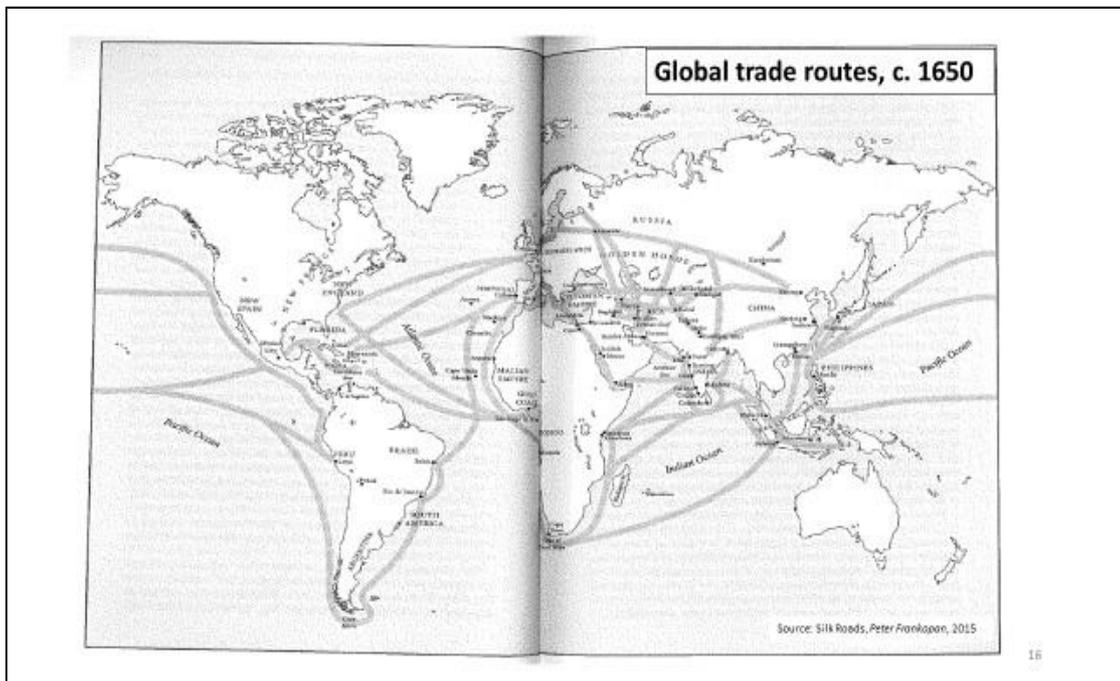
35. 但总体而言，我们在学校所学的历史主要是以西方为中心来看世界——学校所教的都是有关西方帝国的历史、西方的伟大航行探险和西方征服者的事迹。

[B] 历史的另一面：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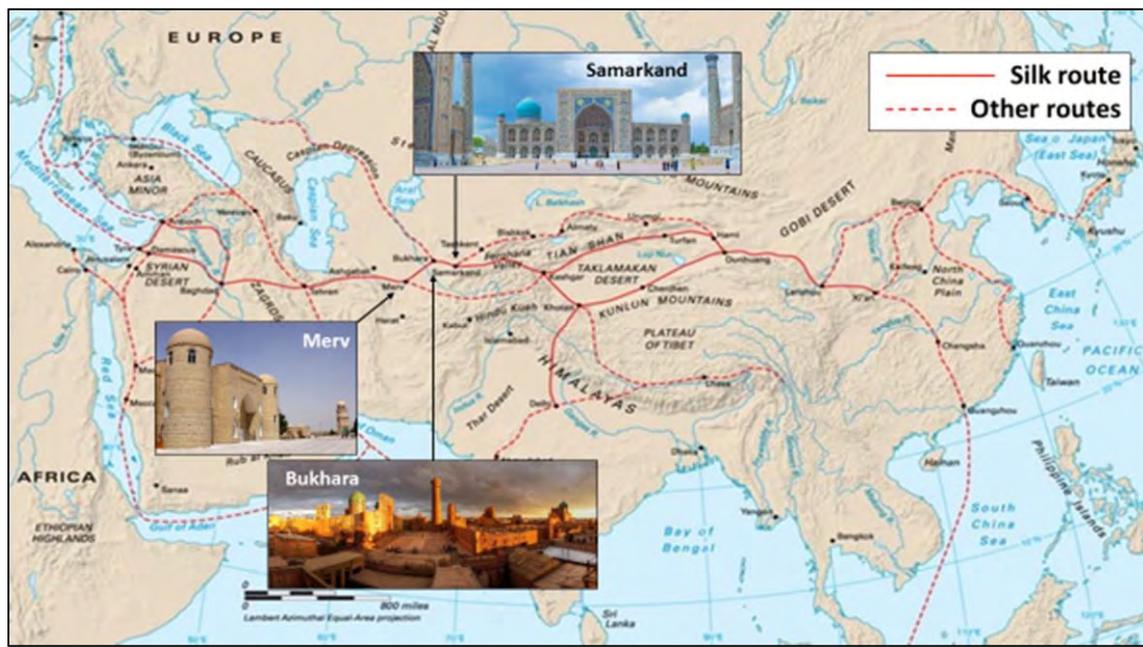
36. 其实，有另外一个历史视角也很重要。早在西方探险家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出现之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了。除了过去的三百年时间，丝绸之路在过去两千年里的多数时间，一直是世界贸易的命脉。



37. 纵观国际贸易史，不难发现中国和印度在人类史上，扮演了国际经济重心的角色，而丝绸之路更是世界贸易的命脉。以往的大城市，如撒马尔罕、布哈拉（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梅尔夫（位于土库曼），都是因为位于丝绸之路地段上，因而繁荣昌盛。



38. 丝绸之路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让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受惠。



39. 各种思想也因为丝绸之路而得以传播开来。佛教起源于印度，之后传到阿富汗，再传入中国。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也是贸易、学术、宗教和文化的中心。

40. 亚洲也是文明的中心。在亚洲，中亚就是文明、科技和世界的中心。

41. 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重塑这段历史。这是一个大胆、创新、宏大的愿景。而要实现这个愿景的国家，如今在基础建设科技方面可以说是全球领先。



42. 就拿建筑在永冻层上的青藏铁路为例。其工程上的种种挑战就包括——永冻层会因为气温上的微小变化而融化，而火车的高温也会使之融化；永冻层融化后，满地泥泞将影响铁路系统的整体运作。在较脆弱的铁路段，中国的工程师在深入地底的桩基上建起高架轨道。中国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在永冻土上建筑铁路网络，确实令人瞩目。

43. 中国的高速铁路网，铁路线路长达一万九千公里，每年的载客量达 8000 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铁路网。

44. 中国的一句成语“堑山堙谷”，便是源自于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削山填沟的建筑方式。

45. 中国在几个世纪以前修筑的万里长城，至今即使是从外太空，还能看得见。

46. 由此可见，中国人对建筑是有很深的理解的。

#### IV. (3) 目前的国际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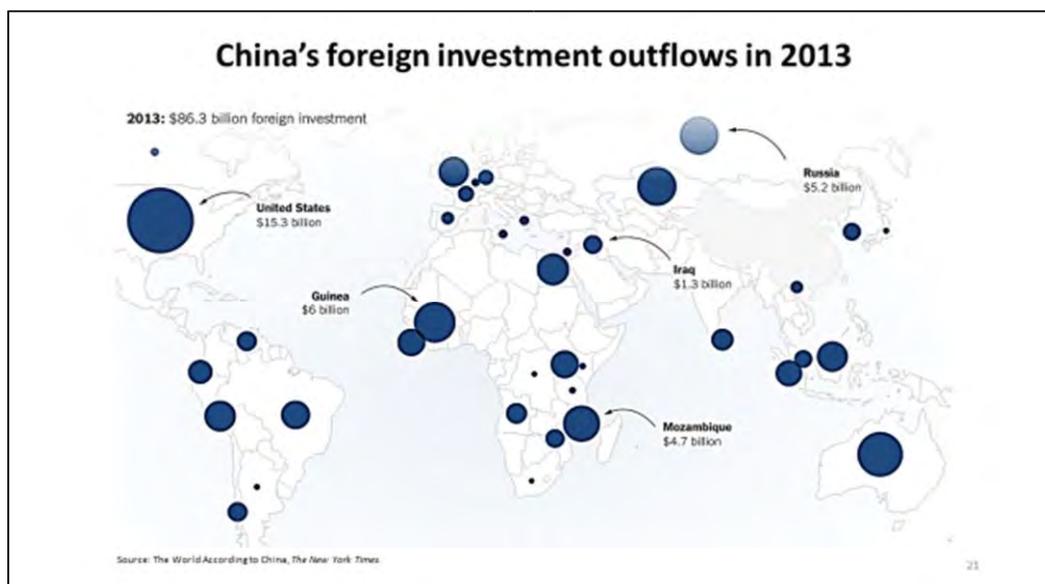
47. 现在，让我谈谈第三点——目前的国际局势。

48. 我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会加速推动我之前所提到的地缘政治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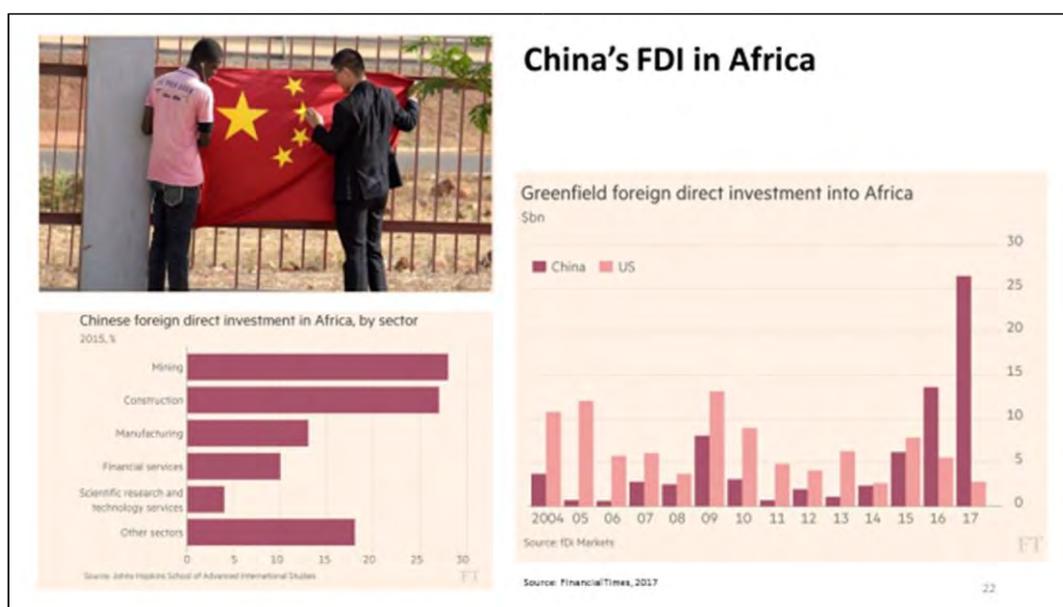
49. 容我列举会影响这些趋势的三项发展。

[A] 中国的经济交往战略

50. 中国通过投资战略，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和关系。



51. 综观世界各地——亚洲、非洲，甚至南美洲，不难发现中国企业正不断拓展版图。这些企业投下数十亿的资金，愿意承担风险投资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
52. 中国锁定他们感兴趣的区域后，就会毫不松懈地将注意力放在这些区域。
53. 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系统都不一样。他们的国家领袖也无法做出和中国一样的长期承诺。
54. 就以非洲为例，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在 2000 年是 100 亿美元，在 2014 年则达到 2200 亿美元。中国企业买下非洲矿业公司的股份，并由中国提供贷款，合作展开建造道路、铁路和港口等大型基础建设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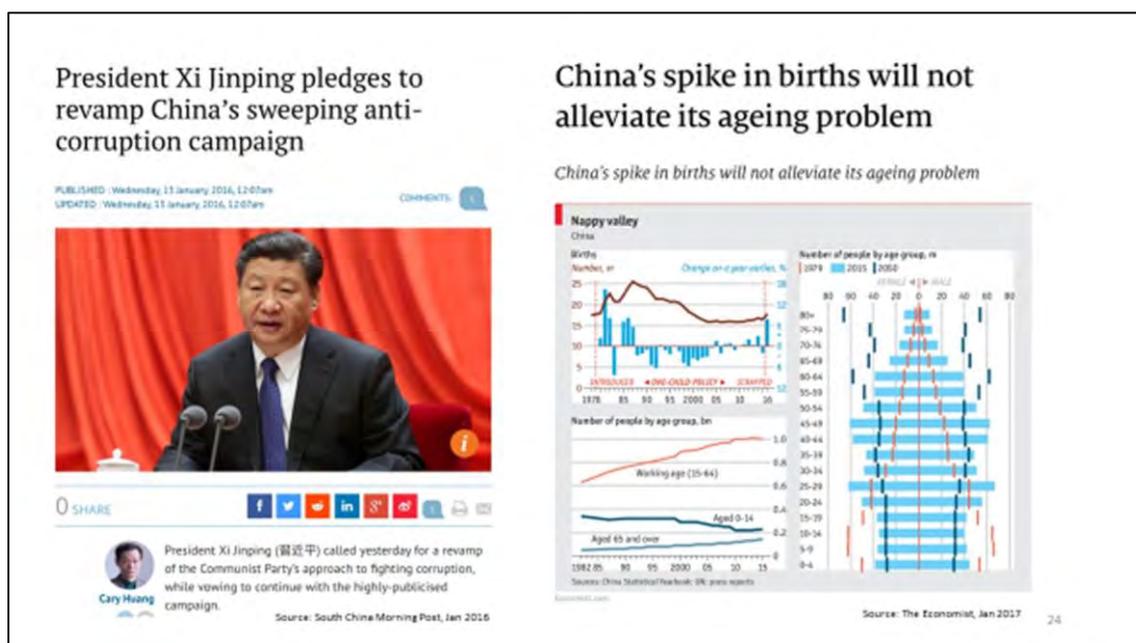
55. 这些投资项目让中国与合作伙伴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当然，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并非完全受欢迎。但是总体而言，这还是促使许多国家倾向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56. 中国在东南亚的“陆地国家”也有可观的投资项目，而且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股趋势还处于初期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这股趋势也会加速。

[B] 中国有能力聚集资源并能够坚定地朝目标迈进

57. 中国拥有一套中央体系，让它能聚集所需资源，集中精力，坚持不懈地达成所设下的目标。

58.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系统一切都好或样样都行之有效。中国本身也面对一些严重的问题，而中国本身也承认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例如，贪污在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团队正在积极地处理这个问题。



59.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迟早也会面对其他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些都是极为重大的课题：

- a. 例如，人口老龄化。中国将需要在社区基建上投入大量的资源。（有些人说，中国会“未富先老”。）
- b. 还有，应付教育水平更高的年轻一代的各种需求。

这里只是略提当中的一些挑战。

60. 客观来说，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过去 35 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造福了其人民。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尤其是它让国家快速发展起来，并且协助众多人民脱贫致富。

61. 因此，即使有许多针对中国和其政治体系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往往都有偏差，或有点不公平。

62. 例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的政治体系不容许创新，因此中国无法走在现代科技领域的前沿，与其他国家一争高下，而最终也无法取得成功。

63. 类似的说法，包括对于共产党一党独大的言论，甚是普遍。
64. 然而，中国却以行动证明了这些批评都是错误的。
65. 比如科技这一领域 —— 中国展现了自己的实力，能够迅速晋升到科技价值链的上端。我先前已经提过了中国的基础设施技术。
66. 又如电信领域 —— 华为已经成为信息科技方面的佼佼者，引领世界。无论是在开发硬件或软件方面，华为都处于领先地位。英国一直以来都向华为购买最新的科技。2016 年华为在英国的营收超过 9 亿英镑，增长了 30%。

### Innovation

#### Sales jump at Huawei's UK arm



**Source:** London Evening Standard

“In the UK we broke through into the market not as we had in other countries – through budget devices – but through the premium tier of devices. Our biggest seller in the UK is the P9, so the UK is a special market, so it must have a special strategy... I think if you can be number one in China, in the most competitive devices market in the world, we can have the confidence of success elsewhere as well.”

– Huawei UK Consumer Business Group MD James Jie, interview with Mobile Today in 2017

67.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 量子卫星。中国已经成功发射首颗量子卫星，掌握了卫星和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的高科技。通过这种科技进行长距离通讯，他人要窃听及破解有关信息将几乎不可能。一旦有人试图窃听或截获，量子密钥的自身状态会发生改变，而量子密钥会让信息自毁。这项技术其实是在欧洲研发的，但是中国却投入了大量资源，进一步完善此技术。

#### China uses a quantum satellite to transmit potentially unhackable data

- China has demonstrated way to send data over long distances which is potentially unhackable.
- It relies on "quantum cryptography" and a satellite sending data via photons from space to earth.
- The implications could be huge for cybersecurity, making businesses safer, but also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governments to hack into communication.

**Source (top):** CNBC, 2017  
**Source (right):** BBC, 2017

#### China's quantum satellite in big leap



The term "spy satellite" has taken on a new meaning with the successful test of a novel Chinese spacecraft.

68.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 量子卫星。中国已经成功发射首颗量子卫星，掌握了卫星和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的高科技。通过这种科技进行长距离通讯，他人要窃听及破解有关信息将几乎不可能。一旦有人试图窃听或截获，量子密钥的自身状态会发生改变，而量子密钥会让信息自毁。这项技术其实是在欧洲研发的，但是中国却投入了大量资源，进一步完善此技术。
69. 中国对自己的地位具有信心，中国人口庞大、资源丰富、财力雄厚。中国能在投资和经济上做出长远的承诺、建立长远的关系，并且可以放眼长远，为实现美好未来推行有效的政策。

### [C] 美国的外交政策

70. 让我以美国的外交政策为背景来谈第三点。二战后，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是，维持世界和平和秩序，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71. 现在有舆论提出，美国应该更狭隘地定义其国家利益，采取“美国优先”政策。
72. 这一观念的转变，可从备受敬重的军事战略家麦克马斯特中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一番话看出。



73. 他谨慎指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并非“美国独行”（America Alone）。但这确实表示美国现在的立场已有改变，美国同与各国的关系，已有别于从前。
74. 每一个国家都会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当美国重新审视自己的利益，改变想法时，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世界各国。
75. 现任美国政府会重新评估国家立场，因为他们需要兑现对选民的承诺。这是可以理解的。
76. 同样的，美国也正在重新审视他们过去的“基本立场”，如：坚守对北约组织的承诺、确保美国与中国关系稳定、推行自由贸易等。

77.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今年五月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能完全依靠别人的时代从一定程度上说已经结束了……我们欧洲人必须把掌握自己的命运”。

“The times when we could completely count on others, they are over to a certain extent. I have experienced this in the last few days.

And that is why I can only say that we Europeans must really take our fate into our own hands, of course in friend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friendship with Great Britain and as good neighbours wherever that is possible, also with other countries, even with Russia.

But we have to know that we must fight for our future on our own, for our destiny as Europeans, and that's what I want to do together with you.”

— Angela Merkel, German Chancellor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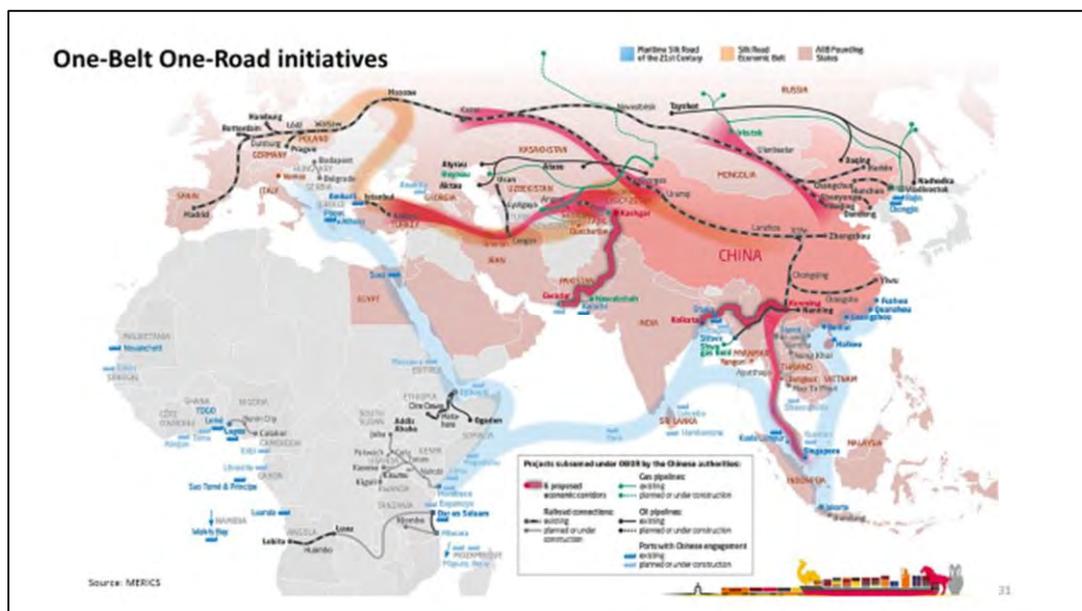
78. 美国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合理的。例如，自 1980 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指出，美国在北约组织承担的费用不成比例。所以，现任政府再次指出这一点，并要求其他成员国解决这个问题，是没有错的。
79. 美国在多年冷战后感到疲惫，再加上美国在推展中东政策上承担了主要的费用。因此，美国要求其他成员国公平承担防卫的费用，是可以理解的。
80. 事实上，目前的情况对于美国来说，在政治上是不能持久的。
81. 因此，如果在德国的带领下，欧洲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领导责任，特别是在维持欧洲安全方面，那么这将能确保一个更能保持平衡和可持续的国际格局。
82. 现任美国政府已决定提出一些需要其他国家关注的课题。目前还不清楚的是，这会产生什么结果，现任美国政府是否会跟进并贯彻始终。我想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这些问题会如何发展。
83. 尽管美国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在需要时，现任政府展现了立即采取行动的魄力和决心。
84. 回过头来看历任美国政府，尽管经历了起起落落，自二战以之后，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大致上保持平稳。
85. 现任政府也延续了这一传统。例如，美国在持续向朝鲜施压的同时，并没有排除与朝鲜进行谈判的可能。
86. 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极为重要，不容忽视。

87. 美国将如何处理这些利益，我们且拭目以待。
88. 一旦现任美国政府的政策逐渐明朗，届时，美国若仍然让其他国家感觉到它选择脱离国际舞台或减少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那么就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我先前所谈到的地缘政治大趋势。
89. 再说，如果美国继续鼓吹反贸易言论、选择退出各项贸易协定、对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制裁，由此引发关税/贸易战争，那势必会让更多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更具吸引力。
90. 在上述描绘情况的前提下，让我们进一步来谈“一带一路”倡议。

## V. “一带一路”倡议

### [A] 史上最具雄心壮志的基础建设项目

91.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史上最具雄心壮志的基础建设项目。基础建设的开支预计将高达数以万亿美元，项目涵盖了 60 多个国家。迄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获得了近 500 亿美元的投资。
9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新发展银行的注册资本合计金额已高达 2400 亿美元。
93. “一带一路”倡议为伙伴国勾勒出美好的前景。许多准伙伴国相信只要建好这些基础设施，财富就会随之而来，就如同当年丝绸之路如何为他们的先辈创造财富一样。
94. “一带一路”倡议有潜力拉近欧亚大陆、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通过海陆渠道来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



### [B] 温馨提醒

95. 不过，我同时要提醒大家，提到撒马尔罕、布哈拉、梅尔夫等古老城市的名字，人们联想到的是它们所散发的浪漫情怀以及所代表的辉煌过往。

96. 但现今的中国人不是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者。他们讲求实际、实事求是。他们知道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充满着冲突和暴力，在那里的投资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97. 回到中亚大陆。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侵略者包括成吉思汗、坦麦能和纳迪尔沙等先后占领过这片土地。中亚大陆环境恶劣，不容易执法和维持秩序。
98. 拿阿富汗来说，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都面对困难，并视这里为烫手山芋。
99. 阿富汗被称为“帝国坟场”，是有它的道理的。

**Rudyard Kipling – The Young British Soldier (extract)**

If your officer's dead and the sergeants look white,  
Remember it's ruin to run from a fight:  
So take open order, lie down, and sit tight,  
And wait for supports like a soldier.  
Wait, wait, wait like a soldier...

When you're wounded and left on Afghanistan's plains,  
And the women come out to cut up what remains,  
Jest roll to your rifle and blow out your brains  
An' go to your Gawd like a soldier.  
Go, go, go like a soldier...

32

100. 中亚大陆是一片不容易发展的土地，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发展的地区。这个地区也一直处在极其动荡不安中。
101. “一带一路”的跨区域对接能带动贸易的往来，不过也能促使极端分子更容易交流，散播圣战思想。这是把双刃剑。
102.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些地区不一定会取得预期的成效。
103. 除此以外，中亚大陆还存在着其他相关风险。
104. 首先，中亚各国的政治体系还有欠完善。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立场和支持更多取决于某个领导人或领导队伍的意愿。领导层一旦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的政策也可能会改变。
105. 其次，中亚大陆对俄罗斯来说存在着显著的利益。在“一带一路”倡议这方面，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不一定吻合。若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俄罗斯是有能力将自身的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中亚各国将不愿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被逼做出选择。
106. 第三，印度在中亚区域也有其关键的利益，而他们也有决心去捍卫并推进这些利益。

107. 第四：其他国家，如土耳其和伊朗等，在中亚区域也有自身的利益，而他们也有决心去推进这些利益。
108. 中国必须尝试与各个利益方合作，协调利益、达成互惠。这不容易办到。相较之下，建造基础设施就比较容易办成。
109. 除了在中亚大陆面临的挑战，中国也必须去争取那些对“一带一路”倡议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的支持，如印度和日本。
110. 作为成功的大国，中国必须认识到，基于其面积、重要性和影响力，它的行为将对他国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措施去向其他国家保证，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并且积极同其他国家交流。
111. 我们希望中国能得到各国的尊重、喜爱与信任，这对大家都好，因为大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一旦出现信任赤字，本区域就会出现对立集团；印度、日本等国，可能与亚洲以外的国家组织起来，形成对立集团。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记载，讲述这些国际关系的局势发展。
112. 美国在本区域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美国将继续以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科技实力，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俾斯麦就这样评论过美国：“上帝对傻瓜、醉汉、孩童和美国格外眷顾！”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轻视美国。
113. 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集团或对立集团的形成，这是不利的；不管是对中国或其他国家，或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现今世界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特立独行，这包括中国在内。
114. 对中国而言，如何协调各方的利益，缓解利益的冲突，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我没有重点讨论这些课题，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不重要。
115. 中国的和平崛起，或看似和平的崛起，并且晋升为超级大国的地位，不但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116. 第五，基本上，“一带一路”倡议不能取代目前的国际秩序。目前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如果全球各国都采取保护主义，这必将影响此倡议。而如果中美展开贸易战，此倡议也会受到影响。
117. 美国已实现能源自给自足，更低的能源成本也促使美国把各种产业转回国内。这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影响。让我加以说明。基础设施能促进贸易，但这些设施本身通常并不能创造贸易。贸易往来主要取决于需求与供应。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各国都有多个贸易伙伴。而虽然中国是许多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却是大多数制成品的消费国。这些产品作为中间品运往中国，并且在中国完成制作，然后这些制成品再从中国运往美国。这样的情况相信将持续一段时间。
118.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要完全发挥功效、取得最大成功，国际贸易和全球化趋势就必须持续，全球化经济模式也要继续操作。这意味着，中美不能发生贸易战。全球经济需要持续增长、和平及稳定。这些都是此倡议取得成功的一些必要元素，也包括其他元素。

- 119. 如果中国走对这步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其他区域项目，成功地向合作伙伴表示善意，中国就有潜力构建一个新的经济框架，提升北半球的经济增长。
- 120. “一带一路”倡议是大胆的愿景，中国必能克服挑战，实现愿景。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有条件达成目标。
- 121. 如果中国能够和那些对全球经济有影响力的经济强国融洽合作，并且得到那些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合作，那么中国就会比较容易实现目标。
- 122. 这些道理相信中国都知道。
- 123. 新加坡是个小国，无法影响或参与这些组合和对立组合。我们是观察者，常常只能接受各种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如果国家利益受到影响，我们就把话说清楚，希望大家展现智慧，保持和平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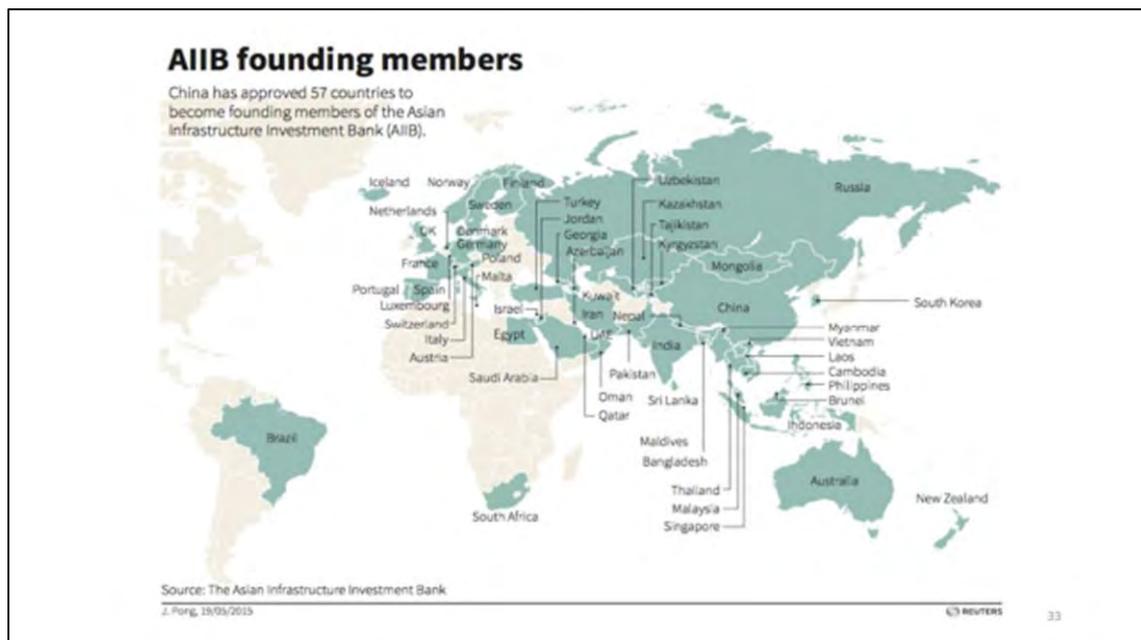
[C] 东南亚

- 124. 有了“一带一路”倡议，相信中国会比较容易融入东南亚地区。各个道路、铁路、海港和机场之间所形成的交通网将带来很大的好处。这些网络也会带来巨大的潜力，在本区域包括沿海国家，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区。

[D] 可能对“一带一路”倡议有利的主要机构

- 125. 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和之后设立了一些重要机构。我认为这些机构将有助于此倡议取得成功。

(I) 亚投行



126. 第一：亚投行。亚投行将和其他国际机构联合为沿线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例如，资助这次论坛的世界银行是其中一个积极参与的机构。

(2) 上海合作组织



127.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这个组织横跨欧亚地区，旨在促进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上有效合作。印度和巴基斯坦今年六月正式加入该组织。而上合组织成员国总人口是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而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则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3) 亚细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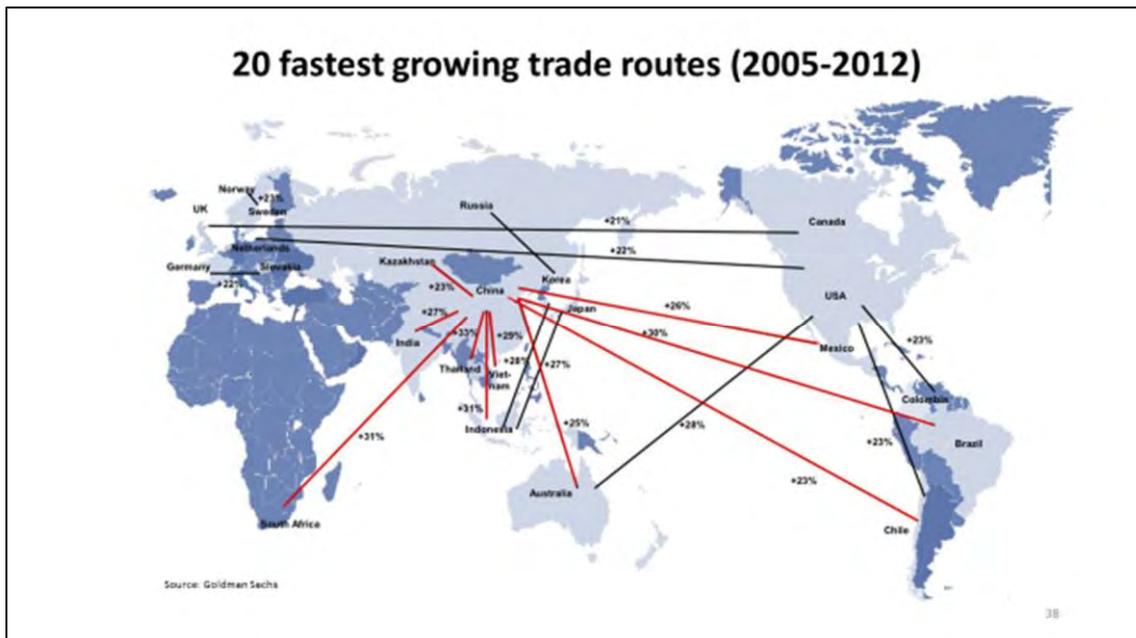
128. 第三：亚细安。中国正积极与亚细安打交道，促进区内基础设施的强劲发展。中国也在水源合作课题上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积极交流。众所周知，水源是湄公河地区一个重要的基本资源，并且对这一带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具有影响。

129.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将大力提升区内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也很有可能改变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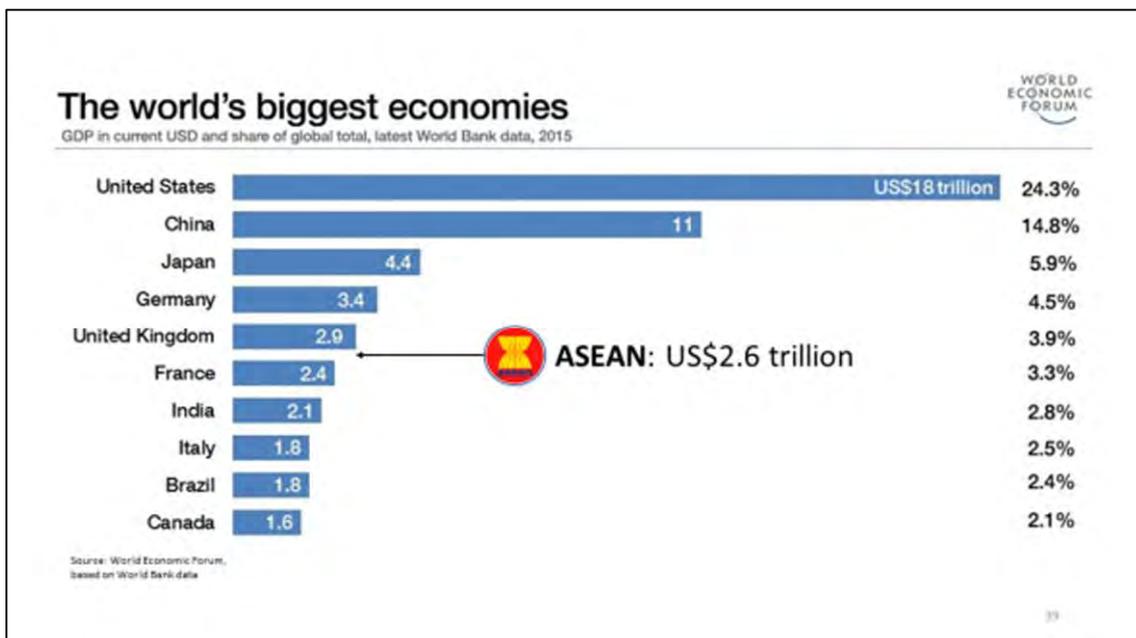
130. 接下来，让我阐述，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对世界经济、安全架构和地缘政治产生什么效果和影响。

**VI. 效果与影响**

131.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不少，我对这方面的结论应该显得易见。所以，接下来我将概括地说明。



132. “一带一路”倡议一旦成功落实，必将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论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印度和日本已经列入世界十大经济体，亚细安作为单一的经济体也名列前十。“一带一路”倡议将把世界经济的重心锁定于亚洲，而中国会是这个重心的中心。即使不是每一条路都通往北京，但还是会有很多条路可以到北京。



133. 而前提是，亚洲的各大经济体互相合作，没有贸易战，没有对立的联盟。

[B] 安全架构

134. 安全课题通常伴随经济活动出现。

135. 随着中国的贸易路线日渐扩展，相信中国也会致力于保护这些陆路和海洋贸易路线。所以，日后大家很可能看到中国在新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带设立更多军事基地以及进行更多的安全部署。

[C] 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136. 我们应该会看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多级。美国、欧洲、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是不会在亚洲或其他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消失。就如我之前所提到的，美国在过去的 25 年可以单方面做出各种决定，可是今后要继续这种行为，就比较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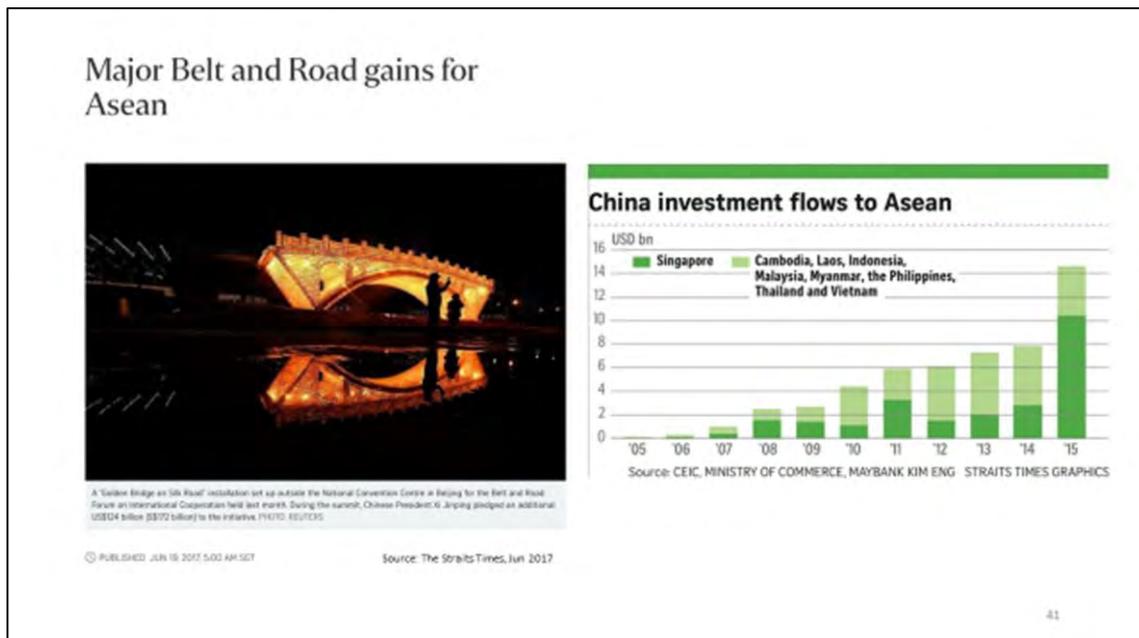
137. 同时，我们也很难想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取代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包括中国。

138. 而且，美国在数个区域仍会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虽然，我们很难预测，这样一个多级化的世界会多稳定，但是一个稳定的世界符合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所以它们必将确保世界维持稳定。

VII. 新加坡

139. 最后，这一切对新加坡来说有何意义？

140. 新加坡早在 1980 年代早期就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潜力，并积极推动其发展。



141. 我们从一开始就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且认识到倡议将有利于亚洲和亚细安，也能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142. 此外，我们也意识到亚投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所以成为首批支持亚投行成立的国家之一。

143. 亚洲充满着机遇，除了有“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和印度也在增长中。亚细安本身的增长率也十分可观，到了 2020 年，亚细安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预计高达近 4 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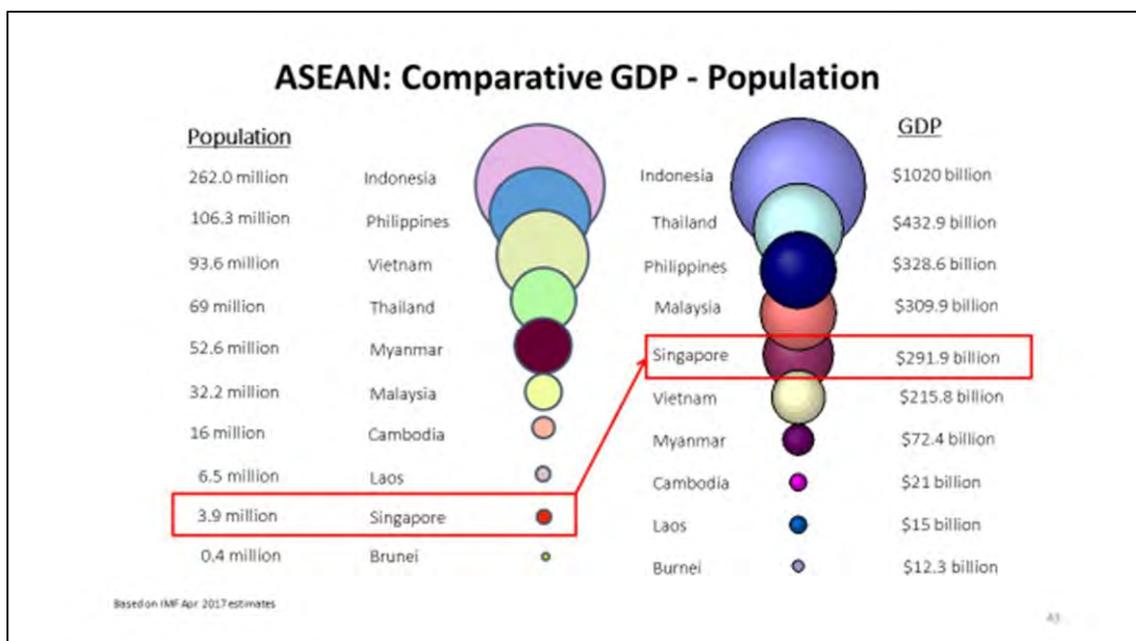
144. 作为一个治理良好、推行法治和拥有高学历人口的小国，新加坡应该能从这些经济增长中受惠。
145. 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提供了许多经济机遇，非常让人期待。
146. 如果各国之间更加互联互通，那么更多人会出游，投资流量也会进一步提高，新加坡便能从中受惠。不过，前提是我们自己必须做好准备，有足够机智来抓住这些时机。
147. 根据《金融时报》今年五月所刊登的一份报道，“在“一带一路”国家中，2016年首要投资目的国是新加坡，新加坡却是个基础设施发达的高收入国家。”
148. 其实数据显示我国已经从“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机遇中获益良多。中国在新加坡的投资是它投入在“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的三分之一；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则是“一带一路”国家对华总投资的85%。
149. 有了新的机遇，我们可以也应该能够找出让我们发挥经济作用的方法。
150. 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多极世界里，而更为重要的是，尽可能和各国建立良好关系。
151. 小国必须能不断在世界舞台发挥作用，显示自己具有影响力。一百年后，中国、美国和印度仍会存在。一百年后的新加坡则是个未知数。我们可以在一瞬间被世界淘汰，并且消失。丝绸之路的那些遭人们遗忘的古老城市让我们引以为戒。新加坡必须不断进取，求新求变；我们要寻找新的方法，确保自己仍对其他国家有影响力，并且继续受到重视。
152. 新加坡会继续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因为这些项目让我国乃至本区域受惠。我国也会继续与邻近国家、中国、欧洲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些年来，新加坡就是这么做，以国家利益为先，我们将继续这个做法。
153. 新加坡是否能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发挥作用？我认为我们可以，只要我们够机智，可以抓住时机。

“A small state that is united, very clear in its purpose, focused in finding good sets of relationships, can be very powerful and exert a lot of influence.”

– Prof Wang Gungwu, Chairman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42

154.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曾说：“一个小国如果能团结一致、拥有明确的目标并且专注寻找和建立良好关系，它便可以拥有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155. 或许我们应该尝试发挥实力，让大家知道新加坡并不只是一个位于马来西亚半岛南部，面积只有 700 平方千米的“石块”。
156. 而且我们有很好的理由保持积极乐观，因为身为小国，我们在经济方面实力雄厚。



157. 许通美教授在这个月上旬也提过，虽然新加坡在领土或人口方面显得很小时，但是我们并不是小国。尤其是当您是以其他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比如外汇储备、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亲商环境等。
158. 激烈的竞争是肯定会有的。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也应该设想到周边国家会，比如说，想要建造更大的码头来同我们打对台，因为他们有权那么做。
159. 我们必须很机敏、随机应变，以确保我国的集装箱码头够现代化，并且继续扩充这些码头；我们也要有远见，和以往一样，决心为更好的明天做出必要的改变。这一来就能够保障我们的未来，并且可以确保新加坡依旧是东南亚区域的一个重要的停靠港口。
160. 我们千万不可以轻易被动摇。就如《海峡时报》所报道的，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枢纽地位使我国的港口不容易完全被取代。



161. 可是，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我们一定要认真看待新加坡的竞争者。虽然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但是我们不应该被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传言和信息蒙骗，认为新加坡即将被包围，并且遭孤立起来。
162. 最后，我想说是：正因为我们勇于梦想，大胆尝试，我们才取得今天的成就，我们不曾让任何国家欺负或屈就来迎合其他国家的要求；许多国家曾尝试要我们这么做，但我们都一一拒绝接受。
163. 利用丛林法则看待国际关系，小国身处险境。
164. 小国如果受到大国威迫或遭利诱，并让他国来决定自己的身份和利益，那么这些小国将无法长久维持国家的主权和自主。即使它们继续拥有国旗，国歌，或者在联合国保有投票权，但是它们将失去做自己的自主权。
165. 这是个攸关国家生存的课题。
166. 倘若我们允许自己被强大的国家或势力所欺负或引诱，这将破坏或严重打击我们的社会与政治契约。独立后的新加坡就建立在这项契约上；一旦被破坏，我们很难，甚至无法，重新建立它。
167. 如果当年，我们的建国元勋向命运妥协，认为新加坡的行为就应该像个小国，做一个听话的“小弟弟”。那么，我和你今天就不会聚在这里，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我们肯定不会用英语交谈。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也不会存在。
168. 还好，我们的建国元勋勇于梦想，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生气蓬勃、充满自信的现代国家。
169. 我要再次感谢世界银行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邀请我来此演讲。喜闻贵研究所，今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为 90 所国际研究智库排名时表现不俗，名列世

界第十三、亚洲第二和国内第一谨此恭喜您。我也期待贵研究所今后能发表更多、更好的学术作品。

170.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同在座的与会者进一步讨论这些话题。

谢谢。

## 问答环节



## 论坛与会者的答复

## (1) 关于新加坡与中国

问：您提到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投资涌入新加坡。显然，新加坡作为一个金融中心非常成功。您认为多大程度上这些投资将留在新加坡本土，或新加坡更像是作为一个投资中心，进而引导资本进入东盟地区？第二，您能否列举中新之间的成功合作或基础建设工程？新加坡—吉隆坡铁路工程是否是其中之一？

答：我会先回答你的第三个问题。在高速铁路方面，我们以及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将进行公开招标。投标的模型和框架将会被指定，然后公布。

关于你的其他两个问题，新加坡和中国有许多政府间的合作。比如，众所周知的苏州工业园。我不确定你是否把它算作基础设施，但它包括房地产及相关设施的发展，致力于在中国复制新加坡成功的一部分。它将作为其他项目获得成功的范例。我们还有天津生态城的项目。当然，针对一带一路战略，在中国西部地区我们有物流合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合作机会。）

但除这些“招牌”工程外，还有很多资金需要用在该地区基础设施上的升级。

如果贸易交流也因此提高，在这些前提下，我们将获益良多。我们有最好的、最高效的港口，良好的金融系统，健全的法律，和世界各国所信任的完善体系。我觉得没有理由你不从中获利。我相信我们会很大地受益于此。

问：如果我们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否会破坏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答：在冷战时期，我们与美国有非常好的关系，同时我们与苏联也有贸易关系。如果当时苏联的贸易更有效，我们会加大与它的贸易。正如吴庆瑞博士所说，我们的贸易没有意识形态，我们可以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对于小国来说，这是必须的。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他们可以有争端，但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不能偏向任何一边。我们跟任何想和我们进行贸易的人进行贸易。

## (2) 中国和西方国家

问：您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态度有什么看法？

答：在西方，对于官方意识形态而言，媒体是“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是独立的，他们不会因为金钱或者其他而屈服而改变他们的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中国有明确划清什么是可以在媒体上报道的。

对此有许多批判，如我之前所说，有一些批评是扭曲和不均衡的。但你也可以看到，像彭博社，他们的主席在 2014 年说，（我重新转述一下，这些不是他的原话）“也许他们应该在中国相关的报道方面做得更加小心”。他们报道一系列的文章，但他们也提供一些交易者和银行等等使用的终端，让他们在中国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们知道他们的金融底线处于危险之中，所以他说他们应该更着重于经济问题并更加仔细地对待他们的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现了混乱，他们删除了 300 余篇关于人权和西藏等问题的文章，面对学术界反弹，他们又撤回了这一决定。

你看澳大利亚，我觉得悉尼先驱晨报或其他澳大利亚媒体现在经常戴着“中国手表”，我相信这是因为金融上的束缚。

最终，中国是个大国，有许多经济合作机会。所以我认为它显露出西方媒体打造的意识形态和实际现实是有区别和不同的。

**问：对于美国政府当局，及其在政府管理方面的有效性，您怎么看？**

**答：**回答这个问题，你首先需要问问自己：你怎么定义政府管理，以及你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目标是无限制的权力——比如选举权（这很重要）、表达权（这也同样重要，但我觉得表达权应该在一定的框架下行使）、持枪的权力、焚烧国旗的权力、说肮脏口号的权力、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权力——这是一个很广的范围，在美国，所有这些都你可以做到。

但你可以进一步问：政府管理是否意味着政府积极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的生活，增强民力，通过合理利用资源增强国力？

如果你问的是这第二个问题，且不是意识形态上地思考它，我觉得你会说，总体上，美国体系在过去的两百多年来做得不错。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它在不同时期遭遇过危机，政府机构不能够调和利益矛盾。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经历了重大的内战，经历了许多民权运动，经历了在二战前的孤立主义，在大萧条时期转为对内为主。

所以它经历了各种起伏，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其体系运行良好，偶尔其体系会遭遇一些困难。

如果你看现在，对于这个体系仍有许多严重疑问。这个体系是 18 世纪成立的，当时大约 15% 的人有选举权——你必须是拥有土地的白人男性才能进行投票选举。所以当时当权者实际上都是来自这个阶级的，社会也有着长期的稳定。

当今，社会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很大的分歧，关于文化、种族、经济、教育机会的分歧。这些问题过去也存在。我也不知道这些问题将会如何发展。美国在过去曾反弹过多次。

经验丰富的观察者认为，如果美国要调和利益矛盾，提高人民生活，改善其政治体系是必须的。富裕的人能照顾好自己，但普通人呢？像教育系统、鸦片危机等问题也提出了挑战性的疑问。

**问：许多人默认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体系是首选的。但您提到了中国过去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您是否认为中国体系应该是首选的，尤其是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答：**我应该这样说，事实上，在某些重要方面这没有冲突。

比如美国，从它从内战中独立到之后的 100 年期间，它经历了高速的发展，变成了超级大国。在发展的早期，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我所说，谁拥有着特权？只有 10—15% 的人口有着特权。因为权力的本性，掌权者大多相似。无论什么党派当权，他们采取的方式大多相似，因此宏观政策比较稳定。

现在经历了数代人，当然有不同、有变化、有争论，包括那些导致内战和流血的纠纷。

但某种程度上，对主要的政策方向还是有着广义上的认同。

所以你可以说，在早期的发展中，稳定以及给领导人在未来 20 或 30 年思考、改变提高教育、女权、增长、经济发展的可能，是国家需要的和政治体系所该提供的。

你看英国，关于特权这一点是一样的：长时间里少数人拥有特权。这一点长期稳定，可国家也在发展。国家都需要经历这一阶段。

中国的发展模式更多的跟着台湾、韩国的道路。中央政府会强加意志，思考长远，动用全部的资源，展望未来。

你可以说在其他体系下中国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但仍然，你可以对发展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争议。所以我说，如果你觉得选举权和表达权比教育、医疗、物质上的利益、机会更重要，那么你可以保持这样的观点，中国的体系的确不能实现这些。

但是如果你认为教育、基础设施发展、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是政府重要的目标，那么中国的体系是能够实现这些的。我认为，中国的体系如今已经实现了这些，但随着人民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政治体系将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问：您觉得多大程度上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

**答：**我想我的发言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两国之间显然存在着竞争，而且是各方面的。我们希望这样的竞争在和平及保持国际秩序的框架下。

美国之前存在过竞争者。二战后，苏联曾是有力的竞争者。苏联是军事上而非经济上的竞争者。然后是日本，我想一部分人可能还记得像《日本是第一》之类的书籍。但我认为，现实地来说，人口和资源上的不同，导致日本不可能在每个方面成为美国的竞争者。但日本在经济上的确是美国的竞争者，而非军事上。

你看中国，它是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竞争者，其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是我下一些结论的原因。我们必须看近代的历史。不必说近代历史会一直延续，随着时间总会有一些磕绊。但我觉得长期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 (3) 其他问题

**问：所有国家都面对着竞争的现实，尤其是小国。但同时，它们也需要合作。您认为国家该怎么平衡竞争和合作之间的关系？**

**答：**竞争是事实。国家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当需要时，它们合作。所以合作和竞争不冲突。比如，作为港口我们与其他港口竞争，但同时我们也与其进行合作，包括我们的邻国。所以就要接受现实，人人都想从你这里获利，没有人会想要给你利益。

如我经常说的，有三种获利的方式：你要么直接用现有的资源，要么自己生产，要么就和其他人进行交易。我们不利用地下的资源来销售，我们不生产东西来销售，所以我们必须为利用资源或生产的国家提供服务。

当然，他们会问，“为什么我不自己赚这笔钱？为什么我要让新加坡赚这个钱？”基于我们小国的事实，我们可以继续赚这个钱的唯一方法是保持我们经济的增长。我们有着三百万的人口和三千亿美元的经济。要持续发展，你必须发展得更快、更高效，符合时代的脚步。

否则，其他人将会取代你，这是简单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我最喜欢的书是《谁动了我的奶酪》。如果你觉得你原地踏步就能保持经济增长，那你肯定要遭殃。

**问：您认为智库和商业人士在与他国建立关系上扮演着怎样的作用？**

**答：**吴庆瑞博士是新加坡有那么多成功智库的推手。吴博士很有远见，新加坡的很多成功都是因为他的高见。

吴博士认为如果只是单单听取政府官员的意见来决定经济外交政策，最终会回到某种“集体思维”。你需要积极的优秀的智库来为政府提供宝贵的意见。

他认为智库应该为政府提供博学、客观、公正的观念，不必在所有事情上认同政府的观点。如果他们只是不经思考、一味地认同政府的观点，那智库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但我认为，如果智库变成人人被唆使，在公正和学术自由的外衣下，站在外国的视角向你建议，来影响你的政策，吴博士会死不瞑目。这是吴博士和我们不能接受的。你可能因为与外国情报机关工作或被他怂恿而被收买。

另一种不客观是因为你有政治议程而因此变得不客观，你用学术来掩盖你的政治立场。重点并不是你是否同意政府的观点，而是你是否客观，或你的立场背后是否有其他原因。所以智库在呈现不同观点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吴博士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智库，东南亚研究院，其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东南亚地区，因为智库能够到处走和说，去发现，提出不同的观点。这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我觉得智库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那就是警觉性要强，作为真正的学者而提供实际的学术观点，来帮助国家建设。如我所说，这不代表在所有事上认同政府，这意味着在必要时客观地挑战政府的权威，或者是在必要时挑战任何人的权威。

我认为商业人士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投资扩展经济，建立关系，构造我们成功的基础。没有经济我们如何立足？所以他们很重要。

但同时，让我回到吴博士所说的，在他提及区域性国家时，“商人在日常工作中与各自国家的政府官员打着许多交道。他们需要获得执照、授权、合同、许可。所以在政府眼中，新加坡的商人是来求助的。因为我们的商人经常需要寻求帮助，那可想而知这建立的新加坡的形象。”

自然而然，那些政府会期望新加坡政府也这样。商业人士经常在我们与邻国有争议的时候给我一些关于如何与外国搞好关系的建议。但他们不理解，恐怕他们也不会理解，本质上，独立主权国家间的关系不可能像祈求者和统治者的关系一样。商业上成功的模式不可能对政府间适用。

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商人的确有着大的作用，他们对经济、对建立良好关系有着重要作用。经济关系好了，外交关系自然会好。

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里。政府需要为新加坡的利益而为，有时候，这意味着偏离商人的建议。商人有他们自己的商业观念，但政府作为有主权的国家需要采用一个更加宽广的国家层面的视角。

## 主题演讲

### 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



廖文良教授

盛裕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兼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务长教授



各位领导：早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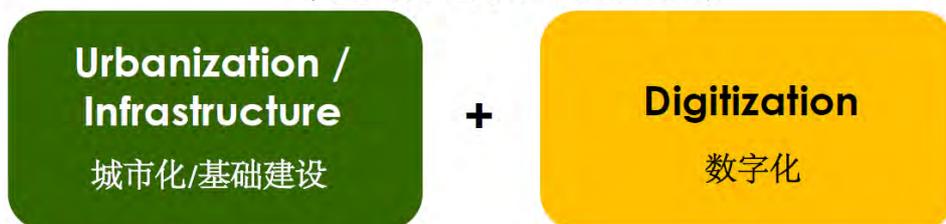
首先，让我先谈谈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有这么一个理论假设：在 21 世纪，世界经济增长主要靠两个因素：一是数字科

技，二是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我经常听中国的李克强总理及其行政人员提到这两个因素，把它们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

## Twin Drivers for Global Growth in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全球增长双动力

--- Nobel Prize Winner Joseph Stiglitz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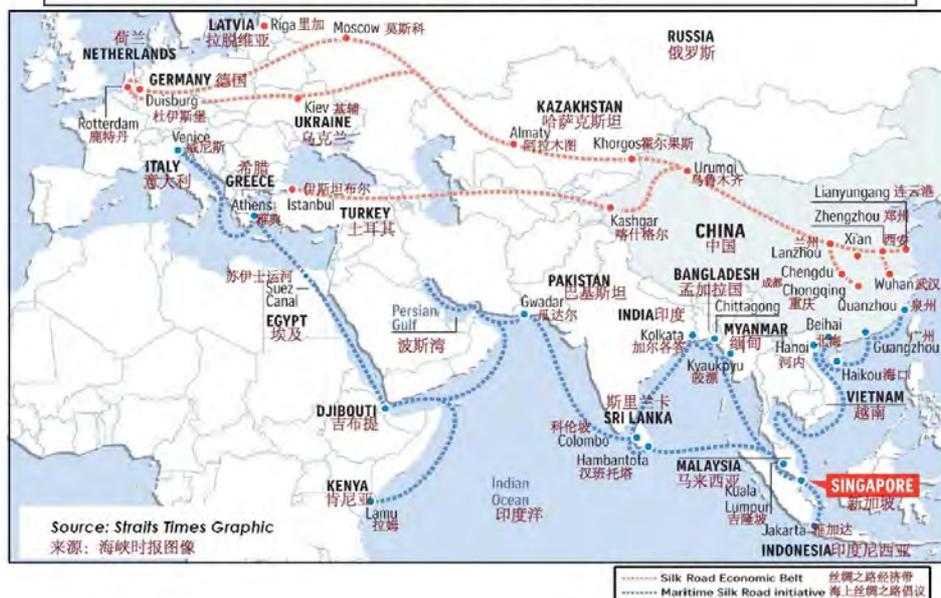
(often quoted by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经常被中国总理李克强引用)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全球经济倡议，通过开发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互联互通，从而提高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根据“一带一路倡议”规划，经济带将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横跨亚洲、中东和欧洲，南下太平洋、印度洋再北上地中海，连接65个国家。完全建成后，陆上路线可连接最大的大陆，从俄罗斯的海参崴，远至欧洲最西部的葡萄牙。

### 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 or Belt & Road Initiative (BRI)

#### “一带一路”倡议



### 通过开发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

很多国家都证实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一经济发展理论。好的基础设施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帮助进一步促进贸易，提高国家生产力及推动就业。中国有这么一句话，“要想富，先修路”。现在，我们说“路修好了，财富自然而然会来”。

日本在二战后通过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投资而加快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在 90 年代运用了相同的战略，进行跃进和经济改革。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香港亦是如此。

##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成长

- Urbaniz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are fundamental drivers of growth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两大基本动力

- Proven in several economies:  
 已被以下经济体证明

- Japan  
日本
- China  
中国
- South Korea  
韩国
- Australia  
澳大利亚
- Hong Kong  
香港
- Singapore  
新加坡



新加坡的发展是另一个值得我们展现的故事：我们如何从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第三世界的小渔村，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转变为世界一流的城市。我们通过建设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如住房、机场、海港、电力、水利、通讯、信息技术、运输等，提升我们的经济。

### Singapore's Transformation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WORLD  
 新加坡的转型  
 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













**Boat Quay**  
驳船码头



**Pinnacle @ Duxton**  
公寓住宅：达士岭



**Marine Parade Estate**  
马林百列地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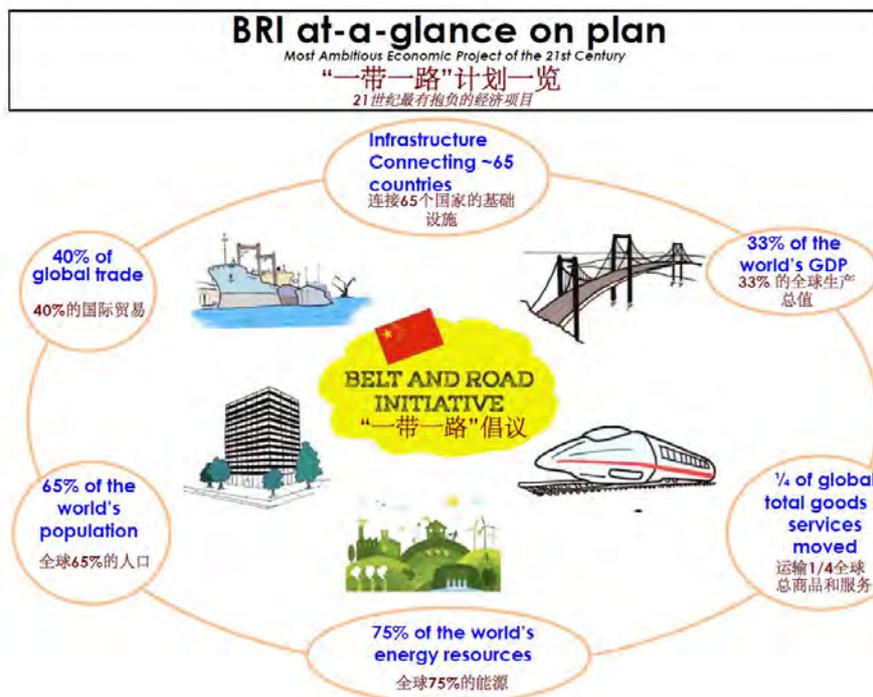
## 了解“一带一路倡议”

由于这一倡议规模巨大、地域辽阔，目前对这一倡议的真正意义的理解还有所不足。但现在还为时尚早。我很荣幸参加了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我的目的是希望在论坛上亲身感受“一带一路倡议”的活力与精神，听听与会国家的想法。来自 130 多个国家超过 1,500 位嘉宾参加了论坛，包括 29 国元首和领导人，以及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诸如联合国秘书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的领导等。



在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向各国领导承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投入。他大力推动全球化、各国互联互通、双赢项目、普惠发展并强调了中国的和平经济合作方式。会场气氛非常积极和鼓舞人心。

简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工程连接占全球总人口 65% 的 65 个国家。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 GDP、全球 40% 的贸易、全球四分之一的商品和服务流动。它也占据了全球 75% 的能源资源。就实体规模、经济规模以及地理范围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可谓 21 世纪甚至历史上最雄心万丈的经济工程。



一些经济学家估计，“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是相当于市值 1300 亿美元、用来重建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至少 12 倍。如果各方都参与其中，与中国共同来进行这一国际化的蓝图，那“一带一路倡议”会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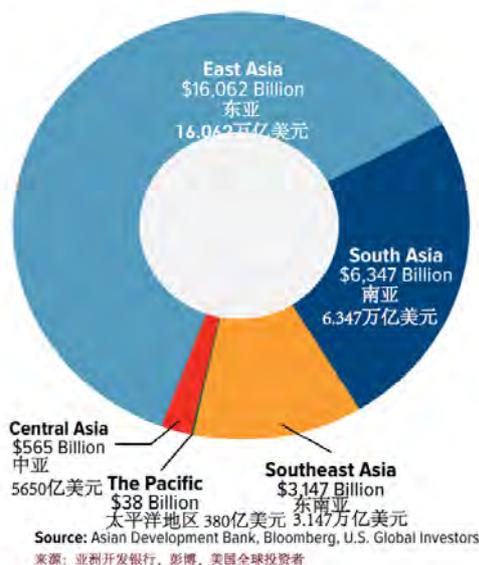


### “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规模及资金来源

亚太地区现在急需基础设施投资。据估计，从现在到 2030 年，亚太地区需要投资 26 万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

## Asia Pacific Infrastructure Needs

亚太地区基础建设的需求



Asia Pacific  
亚太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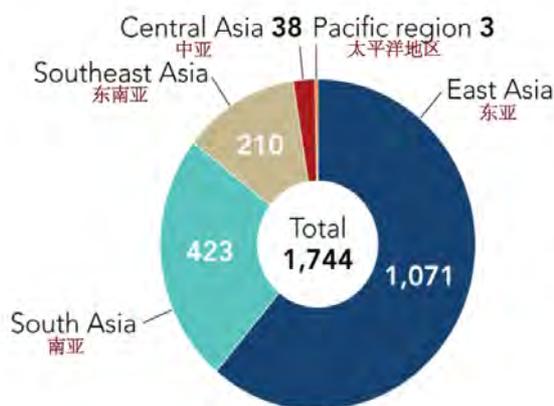
US\$26 trillion  
26万亿美元

Through 2030  
for  
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直到2030年

未来十年，亚洲每年需要投资 1.7 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才能维持增长。

## Asia's Infrastructure Needs

亚太地区基础建设需求



Asia  
亚洲

US\$1.7 trillion  
1.7万亿美元

over the next  
10 years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Sourc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来源: 亚洲开发银行

有估计认为，未来“一带一路倡议”长期累计的投资将多达 8 万亿美元。中国已开始启动进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2013 至今，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计 600 亿美元，并且最近还宣布，未来五年，每年将对外投资多达 1300 亿美元，总计投资 6000 亿美元。

中国启动了三种创新的多边发展基金来帮助一带一路倡议投资融资，如规模 1000 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规模 1000 亿美元的新开发银行、及规模 400 亿美元的“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基金”。中国还引导其主要的国家银行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工程的融资。但这远远不及所估计的总投资需要。显然，中国知道这需要国际和多边金融机构的金融合作和支持。

## China's Innovative Financing Initiatives 中国的创新型融资倡议



**AIIB**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US\$100 billion  
1000亿美元



**Silk Road Fund**  
丝路基金  
US\$40 billion  
400亿美元



**New Development Bank**  
新开发银行  
US\$100 billion  
1000亿美元

**An additional US\$124 billion pledged at BRI Forum; US\$9 billion for BRI developing countries**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许诺了额外的1240亿美元; “一带一路”中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90亿美元

中国有能力实施这一宏伟的计划吗？

过去几十年，中国已切实证明了其落实大规模项目并实现宏伟工程规划的能力。其中包括上海浦东新区，这个起初不过是大片稻田，现已成为了世界上最繁荣的金融中心之一；还有三峡大坝；中国还新建两万多公里的高速铁路，长达 50 公里的港珠澳大桥，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的北京首都机场等，不胜枚举。作为专业的工程师，我学会不低估中国的工程建设技术，也不质疑他们扬言要实现的伟大计划。

### China's Miraculous Growth Story

中国的增长奇迹  
World-class Mega Projects in China  
中国的世界级超级工程

Shanghai Pudong  
上海浦东
1972



2010





Three Gorges Dam  
三峡大坝



Qinghai-Tibet Railway  
青藏铁路



HK-Macau-Zhuhai Bridge  
港珠澳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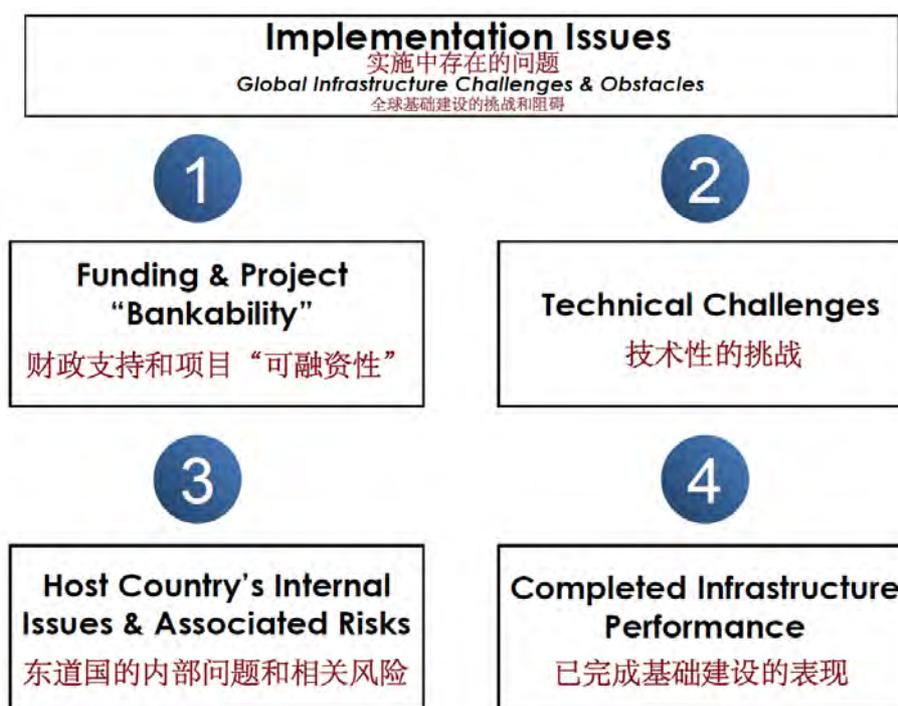


Beijing Capit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当然，“一带一路倡议”等跨境项目会面临更多不同的挑战。



工程如此巨大，其规划必然也会面对如金融、资金、技术、政治、环境、社会及政府间合作等多方面的问题。在全球基础设施工程中，无论推手是中国或其它经济强国这些因素必然存在。若由发展中国家来推动执行，风险相对较高，且必然涉及到诸如东道国政治稳定与否、当地既得利益、项目管理与实施的风险及近期反全球化的运动等问题。



根据这些及中国过去的表现，我不怀疑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力。中国已开始在其计划中做积极的准备。在五月的北京论坛上，习主席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向世界承诺中国会不遗余力地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但是，中国深知，“一带一路倡议”要成功，就必须开放包容。没有沿线东道国配合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支持，倡议不会成功。因此这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机会。

## BRI needs Global Trade & Collaboration

“一带一路”需要全球贸易和合作



### 国际合作

许多国家领导和商业领袖已在北京论坛会议上承诺努力支持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西方工商界已经快速地开始行动。

《经济学家》最近报道，许多西方跨国企业，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卡特彼勒、霍尼韦尔、**ABB** 集团、施耐德电气、巴斯夫等，对中国公司在建筑设备、技术及专业服务方面的销售已大幅提升。敦豪速递公司及马士基公司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业务也显著增加。德意志银行已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几项贸易协议及合作协议，为一带一路倡议项目提供资金。西方公司现在正迅速利用这些一带一路倡议的机会。抛开地缘政治的争论，他们正积极地带着技术更加先进的产品和服务，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

## BRI – Opportunities for Global Business

“一带一路”-- 全球商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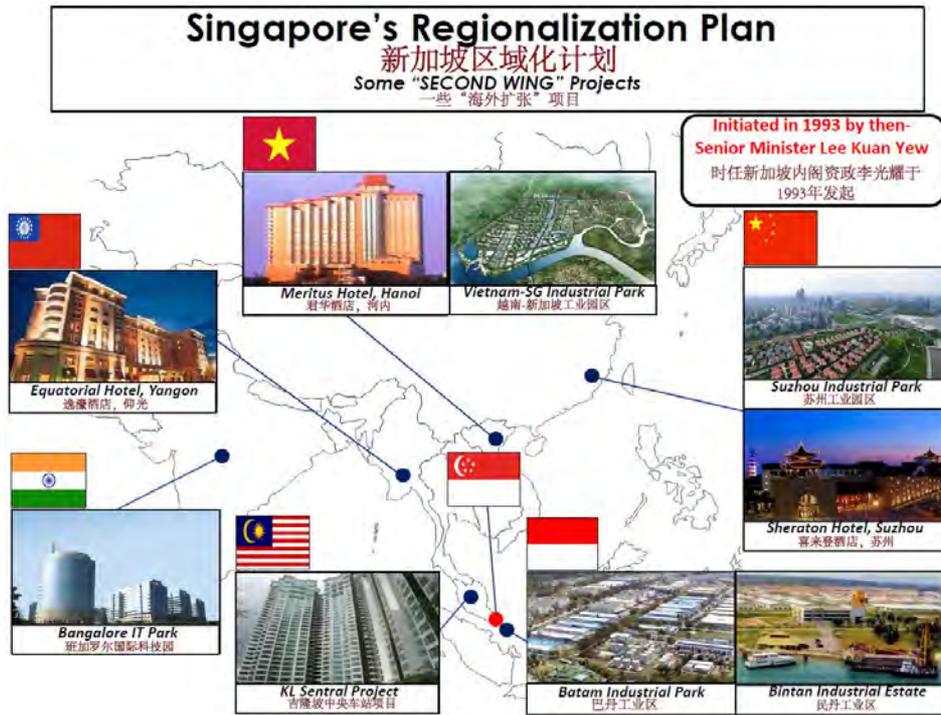


### 新加坡能否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利？

在我看来，新加坡是非常有资格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项目中的。我们之前已经在较小的规模上参与过了。

我记得 25 年前的 1993 年，我们的建国总理和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提出了一项叫做“第二翼”的区域化计划来拓展新加坡的经济。他的远见想法是，利用我们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基础设施经验和专业知识，帮助东盟、中国和印度在其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中发挥作用。

当时，我领导了一家名为 Pidemco Land 的政联开发公司(后来成为嘉德置地)，在东盟、中国和印度进行了几个项目。我们成功地在仰光、河内、苏州建造了现代化的酒店，在吉隆坡修建了住宅区，以及班加罗尔修建了一个 IT 工业园区。我们也是苏州工业园区发展的合作伙伴，这现在是我们 90 年代初与中国进行政府间合作的成功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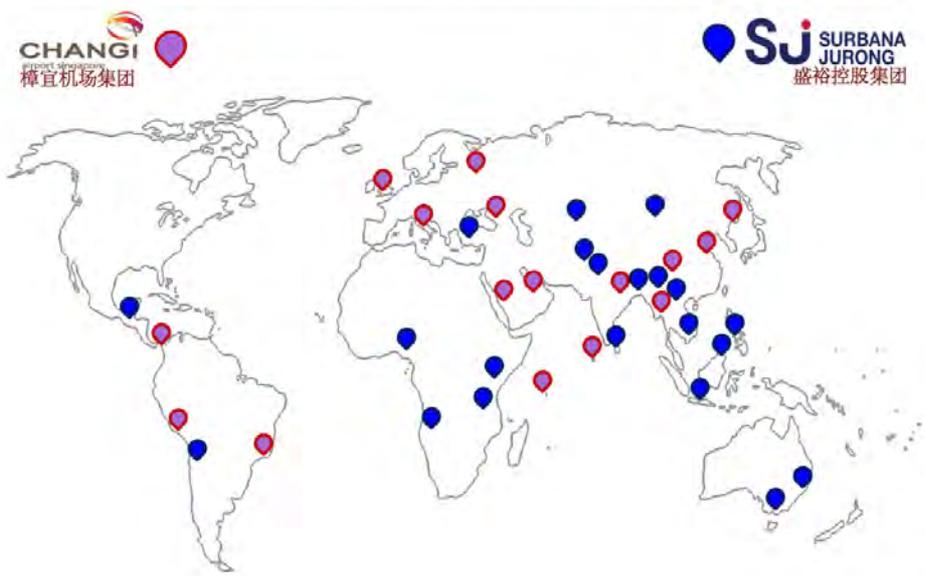


通过“第二翼”区域化项目获得的经验，嘉德置地得以发展并出口其海外专长，在亚太和欧洲 20 个国家的 110 多个城市开展房地产项目。有新加坡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成功记录和我们值得信赖的声誉，我们的公司和机构应该充分利用我们的经验、专业知识和过往记录，在一带一路倡议项目中寻找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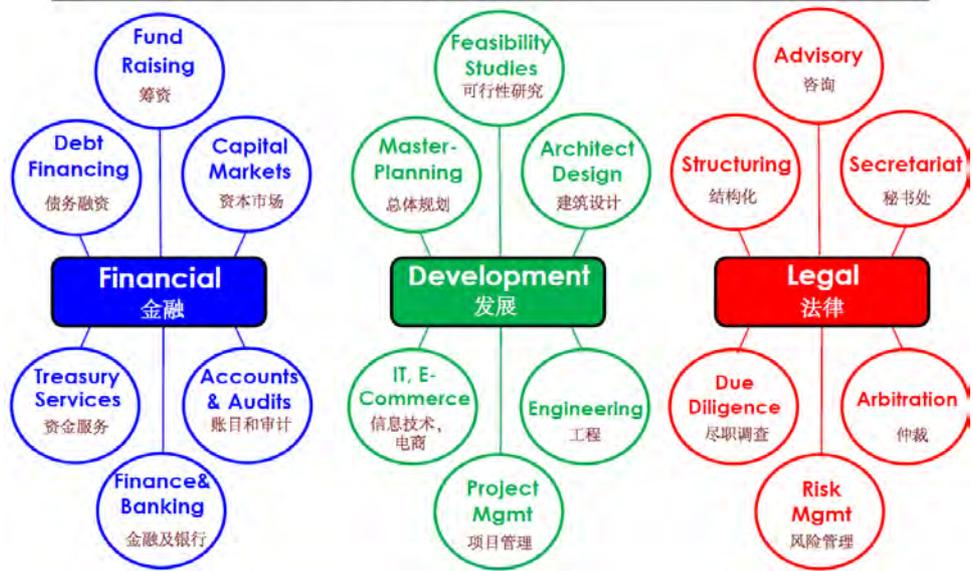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目前主持的两家公司——新加坡盛裕控股集团和樟宜机场集团——已经积极参与到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中。新加坡盛裕控股集团作为亚洲最大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咨询集团之一，目前正计划、设计和管理在 12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 17 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樟宜机场管理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樟宜机场集团的子公司，目前正在中国、中亚、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多个机场项目上进行合作。这些机场项目会帮助改善从世界各地到许多一带一路国家的航空连接。

**Can Singapore benefit from the BRI?**  
**新加坡能从“一带一路”里获益吗?**  
*Case Examples from Changi Airport Group & Surbana Jurong*  
 樟宜机场集团和盛裕控股集团的案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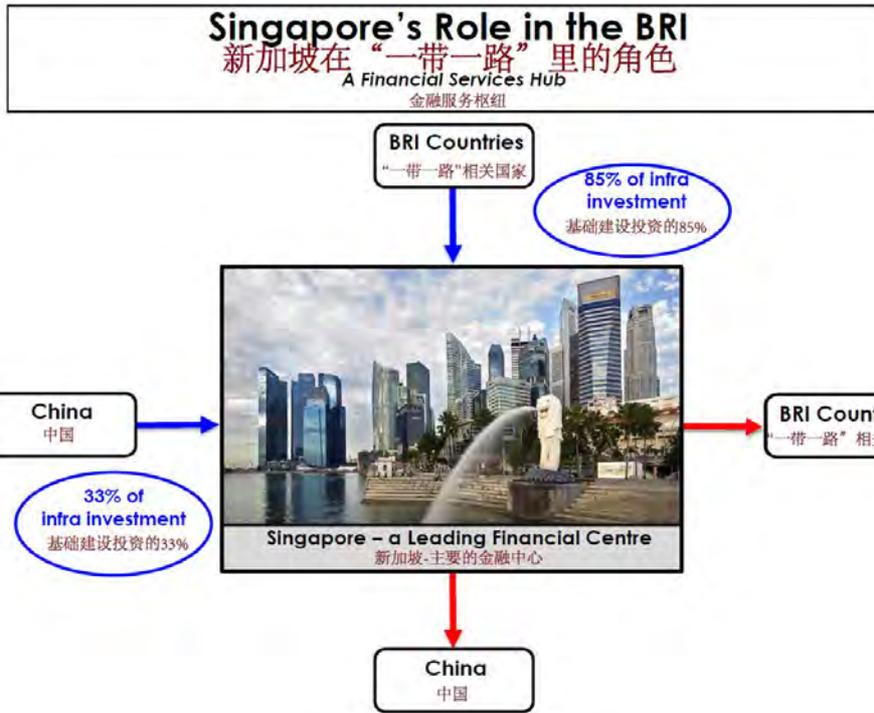


除了基础设施和发展方面的专业知识外，一带一路倡议还将增加在服务行业的整个增值产业链中的其他辅助专业服务的需求，包括发展咨询服务、项目管理、IT 和电子商务、法律和企业服务、金融和其他相关业务服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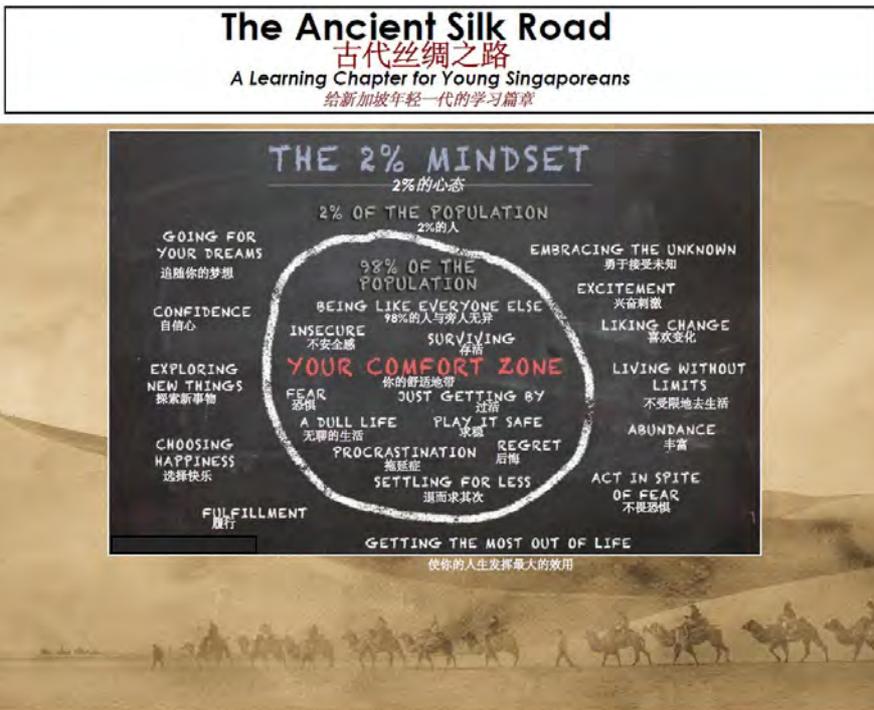
**Singapore's Role in the BRI**  
**新加坡在“一带一路”里的角色**  
*A Value Chain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一条专业服务价值链



据我所知，新加坡金融机构目前承担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 85% 的金融业务，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中占接近三分之一。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新加坡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为一带一路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债务融资、资金管理服务和处理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企业必须对这些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广泛机会有所警觉，并做好准备成为市场上的先行者。



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准备好走出他们的舒适区，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工作环境中大胆走出舒适区。年轻的新加坡人需要从古代中国人身上学习，他们远没有技术和现代化的后勤支持，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开辟了丝绸之路以扩大贸易。中国有一句谚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开拓你的思维。而北京到伦敦的距离也只有 8000 公里。



## 结论

总结一下，我有以下三个点。

首先，两年前，当世界经济放缓的时候，有两个潜在的引擎可以让全球经济复苏——跨太平洋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既然跨太平洋合作已经被中止，一带一路倡议是唯一一个主要的推动经济增长的

地缘经济引擎。中国已在最高政治层面发出信号，表示准备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领导作用，以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 2 Major Locomotives to Re-ignite Global Growth

### 重燃全球增长的两大主要引擎

BRI is now the only major locomotive remaining for World Economic Growth  
“一带一路”现在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唯一主要引擎

Opportunities for Urbanization / Infrastructure & Globalization of World Trade  
城市化/基础建设和世界贸易全球化的机遇



我们越早意识并接受它越好。不管人们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潜在主导地位有什么看法，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真实而有力的战略。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本身，将带动一带一路国家的高水平经济活动。以其庞大的规模，中国将无法完全独自承担一带一路倡议项目。中国将需要资本合作伙伴，以及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伙伴来进行一带一路的合作。

最后，新加坡企业及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企业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机会。我们都需要资金、技术、专业技能，特别是工程专业知识，经验和当地知识确保在一带一路国家的项目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准备好与有兴趣的各方开展国际合作，以满足一带一路的市场需求。

新加坡公司也可以组成联盟集中力量，中小企业应该寻求合适的机会参与到这些财团中来。新加坡也可以为一带一路的项目提供广泛的专业服务。这些我们在 20 年前的“第二翼”区域化项目中就已做过。

新加坡的一流基础设施项目展示了我们提供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的的能力。由于我们在亚太地区的本地经验，新加坡应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值得一带一路参与方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一带一路市场上取得先发优势，不能让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专长和经验白白浪费。

# Concluding Remarks

## 结束语

**1** **BRI is the sole remaining locomotive for global growth**  
“一带一路”是现存的全  
球增长的唯一推动力

**2** **China needs Partnership - Capital, Technology, Expertise**  
中国需要合作伙伴 - 资本, 科技和专业知识

**3** **Countries should capitalize on BRI opportunities**  
各个国家应当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

-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for BRI  
“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
- Singapore could serve as a preferred partner – international norms, local ASEAN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expertise, value chain of services  
新加坡可以作为优选合作伙伴 - 国际规范,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地方性知识, 基础建设项目的专业知识, 服务产业的价值链
- We must not waste our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in infrastructure  
我们绝不能浪费我们在基础建设方面的先进知识和经验

谢谢。

## 问答环节



## 论坛参与者的答复

**穆利亚阿姆里博士：**廖主席早上好！我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员。在中国，公司治理相当薄弱，这意味着在中国做生意，与中国官员打交道可能有很高的交易成本，这可能是腐败的另一个说法。考虑到您作为嘉德置地执行主席，在中国有广泛的商业交易，而且现在是盛裕控股集团的主席，你如何处理不合理的要求？

**廖文良教授：**我在地方和国际背景中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已经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腐败问题的讲话，在我的讲话后，我认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相信我的答案。

我在中国做生意已经有 20 年了。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 1981 年，但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做生意。我们处理腐败的方式就是从一开始就和政府官员说清楚。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无论是党委书记，省长，还是市长，我们都会说，“看，我能帮你做一个很好的房地产项目。城市将会受益，你会升职，你会有一定的加薪。我会得到我该获的利，但我没有钱给你！”我这么说有两个原因。

首先，我在经营一家政联企业，我们没有这个额外贿赂的预算。其次，他们不知道这一点，我们的反贪腐法是跨境的，这意味着如果你在俄罗斯或中国被抓，你将被起诉！因此，与他们合作的基础是，如果你和我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共识，那么我将为你做这个项目，但不会给你钱。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认为他们更希望升职，尤其是现在，而不是私底下拿钱。我的观点是：如果一家公司去中国或印度，贿赂他们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你会被抓住，他们会被抓住，那你很快就得离开这个国家。

在中国、印度和中东，我们已经做了 20 多年的生意。我管理的公司从未在新加坡被行动活跃的贪污调查局或活跃的中国的腐败调查机构调查过。所以，这些记录表明你可以在中国做干净的生意。我曾与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如壳牌和美孚公司进行过交谈，他们说这在中国是行得通的，但你必须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你必须证明你的整个过程是干净的、诚实的。

**斯蒂芬丹尼格先生（Mr Stephan Danniger）：**我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地区训练所。您已经列出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范围，并提到了在实施方面的一点风险。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关注发展领域，但是我想从你们的私营经验中了解，在哪些领域您认为有最大的能力建设需要？

**廖文良教授：**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启动的，包括道路、铁路，别忘了还有机场。我认为机场是发展中国家之间非常重要的联系。我的意思是，中国非常缺乏机场。他们正在建造 33 个机场，但这还不够。因此，任何将国家间或人民间联系起来的东西，都将被放在第一位。当然，也还有其他紧急需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告诉我，他们正在考虑带来电力、能源和水源的问题。但我认为，如果你们不能相连，你们的经济影响值得质疑。因此，我会同意连接性的基础设施是很重要的这一观点。

**李雪敏先生：**早上好，廖教授，我来自新加坡制造业联合会。在你的演讲以及部长早些时候的演讲中，你们都提到了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投资和双边投资，分别代表了整个投资流的 85% 和 33%。这让我想到，一带一路倡议应该是一个共同的平台和一个多边平台，而中国不应该总是在这个问题上。您觉得我对您的理解正确吗？所以，看起来，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永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什么项目的进行都必须是因为中国！因为你提到了这些内部投资，65 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平台。我认为，中国不一定非要总是在其中，而各国可以通过新加坡来合作。

**廖文良教授：**我认为这是一个谜。中国所提议的是一个由 65 个国家组成的组织，它们如何被连接起来，以及它们如何因此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要有一个明确的协议，让这 65 个

国家来签署。他们没有明确的协议。所以今天，如果你想去塔吉克斯坦建一个机场，或者建一条高速公路，那就去。除非塔吉克斯坦政府不希望你这么做，并希望中国政府这么做。所以，我认为这一切被中国垄断是一个谜。没有条约，也没有合作框架说，中国必须促进和参与一切。

**陈企业副教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问，为什么中国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总体规划？

**廖文良教授：**就像我说的，我们在 12 个一带一路国家里做了 17 个项目，而我们从来没有和中国有过一个框架。我们不需要在这些项目上与中国签署任何协议。某个国家想要建设发电厂、轨道、机场，他们会去找最合适的一方。我认为中国不会给你钱，因为他们在为你提供资金，或者帮助你为他们提供资金。所以，如果他们想让中国帮忙，那就不一样了。但在这 17 个项目中，我不确定其中有多少是单单由中国资助的。

**陈企业副教授：**针对“一带一路”的具体批评之一是，他们说，中国没有具体的总体规划。但在这里，一个从事过很多项目的从业者，说没有总体规划，你一边进行新的谈判一边前进。

**廖文良教授：**因此，总体规划是一个蓝图。实际的商业合同和协议是另外一码事。

**陈企业副教授：**你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中国不是在试图补贴，这也让我们有了亚投行。

**廖文良教授：**亚投行的目的是帮助你为你的项目融资。这不是直接的援助，我不认为这是直接的援助。

**卢森先生 (Mr Sam Loo)：**我来自 LCI 行政研讨会。我想知道，因为当很多人想到一带一路倡议时，他们认为它更适合大公司，比如嘉德置地和盛裕集团。新加坡的中小企业能发挥什么作用，他们能通过哪些行业领域来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

**廖文良教授：**让我现实地说，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大型项目，而大型项目将由大开发商、大承包商、大型建筑公司和大型咨询公司来处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 13,000 名工程师，我不认为我们能在这个国家获得如此多的项目。所以，事实是，事情必须由大公司来处理，但是小公司可以加入这个联盟。例如，如果我在设计什么东西，你是一个小型的工程公司，我需要更多的工程人手，你可以来和我一起参加。我们将欢迎并让你加入。

当嘉德置地在中国做房地产的时候，我引入了一些新加坡公司，那些可以帮助我设计的公司。我引入了向我出售防火门的新加坡公司。我在新加坡做测试。所以，很多事都可以和大公司相联，一起前进。之后，将会有大量的专业服务，无论是会计、企业、法律服务还是其他服务，这些都可以由小公司来完成。但对于大型项目，你必须与大公司合作，盛裕集团欢迎任何想要与我们打交道的人。

**李元正先生：**早上好。我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学生。刚才，你强调了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你刚才提到，新加坡金融机构目前处理了一带一路国家向中国的投资的 85%，以及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的近三分之一，你也提到了金融合作。但据我所知，苏州工业园区和目前的重庆政府间项目进展并不顺利。您能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一金融合作，并进一步详细说明两国如何进一步合作吗？

**廖文良教授：**正如你所知，苏州工业园区大约在 20 年前就开始了，一些参与这个项目的人还在。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我想今天如果你去苏州，我们会为这个城市，以及它是如何发展的而感到骄傲。现在我们已经搬到了重庆，但现在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合作并不一定是在硬件上，也不一定是在工业园区。这是因为，坦率地说，中国人现在比我们

更了解如何运作工业园区和城市。因此，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如何在软件上进行协作，例如如何通过机场建设来实现互联互通。所以它采取了不同的方向。在过去，它更多的是关于城市建设，城市化等等。现在，它是关于用更复杂的方法来联系人，而不仅仅是关于实物资产。

**陈宏伟先生 (Mr Winston Hongwei Tan)：**我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国际事务项目的硕士研究生。我想问一个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风险的问题。根据您的观点，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是什么？印度没有派代表团参加 2017 年 5 月在中国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你认为中印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会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巨大的影响吗？

**廖文良教授：**当然，这样大规模的项目，涉及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案，会有政治风险。我认为，如果你相信不会有政治风险，那你就是在做梦，因为你跨越了这么多的司法管辖区。问题是，它是否会抑制这个项目。我的意思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走廊是另一种问题，他们在冲突中。所以他们会继承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某些国家的政治风险，对我来说，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严重。如果你只是去一些与中国合作过的国家，你会意识到你的风险比以前小了。

**强始学教授：**我是来自中国共产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2010 年，我作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一名学生，在这里听了您的一节课。至于一带一路倡议，新加坡似乎更多谈论 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而不多提及中亚的经济。为什么会这样呢，您对此有何看法呢？

**廖文良教授：**我认为，公平地说，中亚是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大陆的一部分。哈萨克斯坦和所有邻国仍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理位置。话虽如此，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在中亚做项目了。15 年前，我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开始了房地产项目。我们已经开始在一些中东国家开展项目，但这些项目因为整个地理位置都不太明显而不明显。因为我们的港口，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更加明显。我们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港口，所以我认为海上航线肯定看上去比陆地航线更重要。

“东盟经济体的竞争力分析及实际汇率对外贸易的影响”



(顺时针方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发言人：  
刘阮波海先生、蔡慧莹女士、阮维先生、黎颖儒女士



(正中间)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讨会主持人：  
穆利亚阿姆里博士

第一节的评论员：



**李才永博士 (Dr Lee Jae Young)**

东盟+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组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日本）



**谭小燕博士**

马来西亚国际研究所客座教授兼新加坡国立大学尤索夫依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 午餐会演讲

### 午餐会演讲(一)

####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融资”



任冬艳女士

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是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分行的总经理任冬艳。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建设银行的一些信息。今天早上，尚穆根部长和廖文良教授都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演讲。所以，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简短概述。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对这个倡议的英文名称感兴趣，因为在今年 5 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合作峰会上，英文名称由“**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改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实际上，中文名称，一带一路，没有改变，还是包含了其隐含意义，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英文名称的变化旨在更准确地反映这一倡议。如你所知，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是指一带，它实际上包括六个经济走廊，包括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印度支那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缅甸孟加拉国印度经济走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不仅仅指一条海上航线，它包括几条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欧洲和非洲的航线。所以，现在的英文名称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简称“**BRI**”或“**B&R**”。

关于这一带一路倡议，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基本点来理解它。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一项举措。习近平主席提出这一倡议，来把重点放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合作及中国向这些国家分享中国的专业经验上。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合作，而不是中国的单独行动。这是一条与所有国家共享的黄金通道，而不是局限于一条中国的私有狭窄通道。中国在过去 30 年从外商投资中受惠，现在希望通过与周边国家分享成果来回报。习近平总统已在国

际会议和讲座中多次表示，中国的大门永远是开放的，永远不会被关闭。因此，中国欢迎各国来享受其发展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有五个相互关联的元素，分别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这五个目标中，设施联通是首要任务之一。它包括铁路、公路、航空线路、电信、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和港口的六种连通方式。这将成为建立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与其他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网络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种基础设施升级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视、冰箱、洗衣机和汽车。在城市里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旅行很困难而且很花时间。然而，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大多数家庭都有汽车和家用电器。今天，我们从现代化可靠的基础设施中受益，这些基础设施服务并连接着我们的城市。例如，在过去，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级别会议上，大多数代表不得不在北京过夜，等到第二天回家。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在下午 5 点会议结束后，乘坐高铁或国内航班回到家中。

我强烈建议，如果你以前从未访问过中国，你应该试试看在下个月访问中国。9 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没有阴霾，没有寒冷，天空很蓝，温度适宜。你会发现北京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你可以乘坐地铁、公共汽车、出租车、滴滴快车或摩拜单车出行。你可以通过高速铁路、国内航班或汽车前往其他主要城市。现在可供的选择真是多得令人惊讶。上个月，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被告知我飞往上海的航班因为天气恶劣而延误，当时我正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我改成乘高铁，只用了五个小时就到了上海，而我的航班还在北京机场等着起飞。

在东南亚和南亚，除了新加坡，大多数国家都需要改善基础设施。他们需要更好的高速公路，更好的港口，更好的铁路等等。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能力和效率是世界知名的，可以成为合作的重要来源。中国和本地区都有巨大的机遇。这些都是真正的双赢和互利的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些双赢互利的机遇？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大规模融资，因为它们通常涉及大规模投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项目融资在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流行起来，当时银行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如采矿、发电、高速公路、机场等。有许多方法可以构建项目融资，例如 BOT 模式，即建设-经营-移交，或 BTO 模式，即建设-移交-经营，BLT 模式，即建设-租约-移交，或 BOOT 模式，即建设-拥有-经营-移交。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项目融资中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PP 模式)，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开展合作，提供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拥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是为了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拥有特殊目的的公司来操作和管理项目。这一模式很好地弥补了政府筹资的不足，同时也提高了公共部门公共项目的效率和质量。

对于项目融资，银行通常需要对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核，以便独立评估关键风险。除了股东的信用风险外，项目融资还可能面临其他风险，如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政治风险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我们面临着国家风险——基本上是由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变化引起的风险，或者是突然终止许可或禁运，或债务偿还等。我们也有政策风险，即关税、税收、外汇管制等政策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法律风险指的是东道国法律的变化，这可能会对项目产生影响。

此外，还有包括利率和汇率风险在内的金融市场风险。利率或汇率的变化将对项目的回报和估值产生直接影响。项目本身还有内在风险，包括执行风险和业务可行性风险。执行风险是由延迟、项目变更和在质量和标准方面的期望差距引起的。业务可行性风险包括市场动态变化、供求状况、竞争格局、产品定价等带来的风险。

银行必须进行广泛的研究，以确定、衡量、评估和控制所有涉及的风险。项目融资通常需要股东担保、抵押贷款、投资保险或其他风险控制措施的保证。

在评估项目后，银行可以选择两种方式来提供贷款：一是如果银行不能承担项目风险，但可以承担股东的信用风险，银行可以直接向股东提供企业贷款；二是如果项目风险是可接受的，并且可以提供必要的担保和控制，那么银行直接向项目公司本身提供项目贷款。根据项目的规模，银行贷款可以是双边贷款或财团贷款的形式。

我们都知道，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大规模融资。这包括银行贷款、股权投资、债券发行等。中国政府正在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以支持“一带一路”项目。

关于银行贷款，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项目不仅可以获得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提供的贷款，还可以得到世界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其他国际多边发展组织提供的贷款。

股权投资是另一种常见的投资方法。然而，由于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期限相当短，它们不适合基础设施项目。为弥补这一缺口，中国政府已设立了一些长期投资基金，如针对地区或国家的一带一路投资基金。例如，丝路基金已经签署了 15 个项目，承诺资金达 60 亿美元。

在债券发行方面，亚洲国家已经在推进债券市场的发展，作为地区金融合作的目标。据路透社和新加坡商业时报最近的报道，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在内的四大中国商业银行都计划在离岸和在岸基金中增加 2000 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这将成为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催化剂。

为了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合作，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合作。首先，在政府层面，各国可以共同商定一套相互认可的目标、原则和措施。根据各国国情不同，这一举措将为加强合作提供合适的平台，有助于减少政治和法律风险。其次，商会、行业协会和机构可以进行联合行业分析和研究，以确定每个国家的优势和机遇。这将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第三，企业和金融机构必须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确定合适的项目，并能够控制所有相关风险。只有各方能够站在一起，本着共同发展的精神面对问题，我们才能期待这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取得丰硕成果。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是如何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服务的。中国建设银行总部位于北京，历史可追溯到 1954 年。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差。中国建设银行——当时叫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的目的是特地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为 156 个重点项目和 1000 多个工程项目分配预算和提供结算服务。中国建设银行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商业银行，2005 年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2007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基础设施融资服务一直是中国建设银行的核心强项。

中国建设银行集团目前是一家拥有商业银行业务的完整牌照的银行集团，在多个业务领域拥有分支机构，如基金管理、金融租赁、信托、保险、投资银行等。中国建设银行在中国大陆拥有近 1.5 万家分行和支行，在世界各地拥有超过 36 万名员工。2016 年底，银行的市值达到了 1920 亿美元，居世界第五，如果按一级资本进行评估的话，排名第二。

中国建设银行在重大战略层面上更加重视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首先，中国建设银行已发展出其全球化战略，近年来沿着一带一路稳步拓展海外业务。过去 5 年，中国建设银行的海外机构增加了一倍以上，目前在全球 29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31 家分行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已与 1456 家银行建立了银行关系，覆盖了五大洲的 132 个国家。

其次，关于中国建设银行实际参与的一带一路项目，在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国建设银行已经为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新加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在内的 18 个国家的

50 个主要项目提供融资解决方案，总计达 98 亿美元。目前，中国建设银行有 200 多个主要项目，融资需求超过 1100 亿美元。这些项目中有一半以上都在铁路、公路、航运、能源和电力相关基础设施领域。

第三，让我们看看中国建设银行在新加坡的努力。为向东南亚地区的一带一路客户提供服务，中国建设银行集团与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签署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设立平台，帮助中国和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公司向本地区发展，创造机会，并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今年，我们的总公司还在新加坡分行设立了一个总部级别的基础设施融资服务中心。该中心将把我们集团的基础设施服务优势出口到国际市场，为东南亚地区提供针对包括铁路、港口、航空运输、物流、能源、信息通信等在内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和咨询服务。

并且，我们支行在 12 个一带一路项目中支持中国公司，在 2017 年 7 月底数额达 70 亿美元，覆盖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波兰和瑞士等国。2016 年 8 月，我们支行成功地发行了我们的首个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狮城离岸人民币债券。我们将在今年发行我们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新加坡元债券。

最后，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分行持有批发银行牌照，并在新加坡经营了近 19 年。分行的业务覆盖范围包括新加坡、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印度和巴基斯坦。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包括贸易融资、投资银行、国债和私人银行服务的综合金融服务。非常欢迎您与我们联系，谢谢！

## 午餐会演讲(二)

### “一带一路：清算银行的角色”



张怡女士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运营主管

先生们，女士们，下午好。我是张怡，我很高兴有机会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发表这次演讲。我将简单介绍一下人民币国际化和工商银行在新加坡的人民币清算服务。

今天我的演讲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

首先，我将简要介绍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的工商银行。它在 42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417 个海外机构，这包括通过南非标准银行的股份间接覆盖的非洲 20 个国家。它支持了在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国家中的 200 多个项目，贷款总额约为 670 亿美元。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是新加坡唯一的人民币清算银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新加坡人民币清算银行的发展情况。

2013 年 2 月，中国工商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为新加坡唯一的人民币清算银行，并于 2013 年 5 月开始从事人民币业务。2014 年，它推出了人民币钞票递送服务，一年后，它开始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人民币清算服务。在过去 4 年里，新加坡人民币清算银行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自清算银行启动清算业务以来，截至 2017 年 8 月，累计人民币清算金额已超过 171 万亿元人民币。

第二部分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根据 SWIFT 数据库，在东南亚国家，人民币的支付显著增加。目前有超过 1900 家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支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且将继续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器：首先，“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中国企业向海外扩张，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竞争力。其次，“一带一路倡议”还将加快人民币的使用，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商业支付、资本市场投资的一种可信赖和高度利用的储备货币。

参考 SWIFT 数据库，人民币目前是世界上排名第 6 的支付货币。相比 2014 年 1 月，2017 年 6 月的人民币份额反映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与 2015 年 8 月高达 2.79% 的最高支付份额记录相比，人民币的份额有所下降。不过，2017 年 6 月的数据是 2016 年 12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可能并不平坦，但未来是光明的。最近，新加坡和香港市场的离岸人民币存款都出现了反弹，这也是离岸市场的一个回暖信号。

让我们看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其他里程碑。首先是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这是一个促进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并将进一步为产品创新带来更多的竞争机会，使其进入全球市场的人民币支付基础设施建设。2015 年 10 月启动时，工商银行是首批 19 家直接参与的银行之一。到 2017 年 7 月，已经有 31 家直接参与的银行和近 600 家间接参与的银行。

第二个方面是，人民币已成为一种储备货币。自 2015 年 10 月以来，人民币已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组合，目前的权重为 10.92%，仅随美元和欧元，位列第三。

第三个方面与人民币的广泛连通有关。随着股票连通和最近的债券连通，中国市场逐渐对外国投资开放。因此，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取得进展，而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加速这一趋势。

我演讲的第三部分是关于人民币清算银行的角色。中国已指定 23 家离岸人民币清算银行，其中工商银行目前占有 7 家。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是工商银行集团第一家也是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清算银行。它还是大中华区以外首个离岸人民币清算银行。

那么，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和工商银行人民币清算银行的优势是什么？首先，我们拥有一个完善的人民币支付网络。目前，我们已拥有 115 家参与银行，覆盖 44 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也可以依靠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以及中国工商银行集团的广泛网络，从而满足世界各地的支付和结算需求。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也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清算服务。我们在新加坡、北京和加拿大都有专业团队。他们携手合作，为我们的参与银行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人民币清算服务。

对于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而言，除了人民币清算服务之外，我们还有一系列产品，如清算业务、现金管理、贸易融资、项目贷款、债务资本市场、外汇和衍生品交易等。

最后，我想简要地回顾一下我们能从一带一路倡议中看到的机会。我们都知道，有五种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连通渠道。对金融机构来说，最重要的连通渠道是金融连通。因此，总的来说，人民币清算银行的作用是依赖清算网络和清算支付基础建设，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安全、高效的人民币清算服务。在这方面，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使用人民币铺平了道路。人民币清算银行在加强离岸人民币市场和在岸人民币市场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期待和你们一起工作。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找到更多的机会，并说服更多的公司更愿意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同步进行。通过这一倡议，随着更多中国企业的上市，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外投资，同时也会有以人民币计价的融资需求。公司将更愿意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现金管理、融资和投资。我们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的基础上，我们将实现互利共赢。谢谢！

## 第二节

### “印度尼西亚省份与区域竞争力分析的竞争力分析及实际汇率对外贸的影响”



(顺时针方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发言人：  
穆利亚阿姆里博士、努夏西达宾特艾哈迈德女士、伊曼纽尔林佳先生、黎颖儒女士



(正中间)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讨会主持人：  
萨希达兰高帕兰博士

第二节的评论员：



巴达莎勒布亚教授（**Prof Balthasar Kambuaya**）  
印度尼西亚巴布亚天堂鸟湾大学（**Cenderawasih University**）参议院主席



卡桑穆赫里博士（**Dr Kasan Muhri**）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贸易分析与发展机构主管

“新加坡中小企业生产力与效率监控指数”



(顺时针方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发言人：  
萨希达兰高帕兰博士、阮维先生、穆利亚阿姆里博士与蔡慧莹女士



(正中间)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讨会主持人：  
曾宪文先生

第三节的评论员：



王健全教授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黄永强博士  
台湾亚洲大学金融与大数据研究中心的首席教授

## 第四节

“评估城市宜居性与生活成本：宜居城市一定是昂贵又难以承受的吗？”



（顺时针方向）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发言人：  
蔡慧莹女士、刘阮波海先生、陈企业副教授



（右三）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讨会主持人：  
张续垚博士

第四节的评论员：



蒂莫西麦克唐纳先生 (Mr Timothy McDonald)  
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



许福禄先生  
马来西亚国库控股研究与投资战略副总裁

## 第五节

“促使越南成為一個平衡，可持續和競爭力提升的经济報告：一個批判性的評估和其發展潛能”



(顺时针方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发言人：  
刘阮波海先生、周文慷先生、阮维先生



(右四)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讨会主持人：  
陈光明先生

第五节的评论员:



**阮庭宫博士 (Dr Nguyen Dinh Cung)**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



**武进禄博士 (Dr Vu Tien Loc)**  
越南工商会主席兼总裁、2017 年亚太经合组织总裁峰会主席  
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第十四届议会议员

## 闭幕词和未来发展方向



**阿尔穆德卫兹女士 (Ms Almud Weitz)**  
世界银行交通全球实践主任

当我参加今天的第三部分关于中小企业的讨论时，我聆听了关于宜居城市和越南竞争力的精彩讨论。这是一个关于中小企业的非常详细的讨论，陈教授很好地把讨论带回来：先问自己为什么研究这个课题？。我们需要不断地从强大的数据引回问题本身，多问问自己“那又怎样？”。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工作，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东盟国家的竞争力。

现在很明显，东盟竞争力排名的年度更新面临着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一个全球性的强大力量，今年它以一种非常根本的方式改变政府，这将影响我们所有人。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倡议”。这些发展都将持续下去，而且都需要一些调整。对最接近中国的国家来说，这些调整将更为重要，但对许多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世界银行与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合作的想法是利用这些数据的力量，使之转化成为各国可以从中获益的东西。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可以被有效地利用。最近，世界银行的交通部门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我们从每个部门的每个人那里听到的都是：“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多国家接受的一方，我们想要遵守规则。我们希望以一种不被视为威胁而是机遇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如果你们看到我们的成员没有遵守他们在中国需要遵守的规则，请告诉我们。务必请告诉我们，我们想知道。”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明确听到中国想要在这么多国家扩大这一倡议，并带着希望促进这些国家经济的好的意图，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与各国合作，确保在另一方通过这一倡议获得类似的成果，这将是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非常紧密地合作。

我还听取了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挑战。这有很多的潜力，我喜欢对这些想法的分享。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国有企业模式可以行得通，在不同国家如何构建国有企业。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关于指数的正确和错误的热烈讨论，以及如何促销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我明确而清楚地听到你们的讨论。我的感觉是，如果你不能与他们斗争，就渗透他们，并与他们合作。如果其他公司的指数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且你看到了与他们合作的机会，那么如果你能抓住，这可能是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看看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

我赞同外派人员指数和普通公民指数之间的区别，我非常喜欢用五分位数的方法来做这件事。还有和我们一起合作的空间吗？我们可以更密切地关注这些新举措。总而言之，我们是来与你们合作的。你们研究了许多我们感兴趣的有趣的研究课题。

我们有许多类似的倡议，例如，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全球基础设施互联联盟，以及其他一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项目。我们的目标是探索如何确保这一倡议能使许多参与的国家受益。

最后，我要感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持续合作。我特别感谢马凯硕教授和陈企业教授，以及这里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我期待着继续我们的合作。非常感谢你们。

## 闭幕词和未来发展方向



马凯硕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在结束语中，我将坚持我一贯的传统，并提出三个要点。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认为尚穆根部长、廖文良教授的出席及你们所有的讨论象征着其重要性。所以，我希望我的结束语是来补充今天所提出的观点。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今天的重点主题，当然是“一带一路倡议”。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的这一伟大举措，我也同意。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倡议。但如果它只属于中国，它就不会走远。为了成功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所有倡议中的其他参与方都必须感受到归属感。因此，中亚国家必须有归属感，东盟国家必须有归属感，然后这一倡议才会腾飞。

坦率地说，新加坡召开这次会议是件好事。新加坡最终将扮演关键角色，而在尚穆根部长或廖教授的讲话中，最令人震惊的数据之一，是进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的 **85%**，以及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的 **33%**都是通过新加坡。因此，新加坡显然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世界银行和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共同合作召开这个非常及时的会议是很好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关于全球性的观点。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区域性的。当每个人想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经常把它与“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今天，你在幻灯片上看到了骆驼的照片。但实际上，如果你逻辑地理性地看，在基础设施需求方面，东南亚的基础设施需求要比中亚大得多。

东南亚经济体人口也更多，规模更大，也有更大的能力建设公路、机场、港口、铁路、电力和电信。因此，当人们想到“一带一路倡议”时，他们总会想到中亚，中亚的确很重要。但最终，东南亚国家实际上可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比中亚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思维模式，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将会是什么。

我的最后一点当然是关于新加坡的一个地方性的观点。显然，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倡议里的机会是巨大的。但与此同时，在新加坡，如果只有那些大型跨国公司——嘉德置地和吉宝集团及其他大公司，而不是中小企业，对一带一路倡议有归属感，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现在，新加坡的中小企业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为新加坡提供了 **68%**的就业机会，也贡献了 **47%**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一带一路倡议和这种归属感，能够被这样一个更大的群体所感受到是很重要的。坦白地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会议实际上非常重要，因为它能让这个区域里的巨头之外的人获得更多的信息。

因此，我首先要感谢世界银行与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合作，开展这一行动。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他们所说的“千步之旅”。今天，我们已经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当然，我想祝贺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企业教授和陈光炎教授以及杰出的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团队共同召开这次会议。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冒险。我之前不确定它是否会成功，但结果证明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祝贺和感谢你们！

# 2017 年亚洲经济论坛 “一带一路”的影响与意义

联合主办单位：  
世界银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

2017 年 8 月 28 日

研讨会（一）：东盟的竞争力、贸易、宜居性和生产力

议程

会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黄仲涵楼大堂

时间	节目
0800 – 0855	主礼嘉宾、评论员、主持人、发言人、与会者莅临
0900 – 0910	<b>欢迎词</b> 陈永财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候任校长、常务副校长（学术事务）兼教务长
0910 – 0920	<b>欢迎词</b> 法蒂玛杜尔易卜拉希玛女士 (Ms Fatouma Toure Ibrahima) 世界银行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部代理主任和运营顾问
0920 – 0950	<b>主礼嘉宾演讲：</b> 尚穆根先生 新加坡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
0950 – 1020	<b>问答</b> <b>研讨会主持人：</b> 陈企业副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
1020 – 1050	<b>主题演讲：“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b> 廖文良教授 盛裕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兼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务长教授
1050 – 1100	<b>问答</b> <b>研讨会主持人：</b> 陈企业副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
1100 – 1115	<b>茶歇</b>
1115 – 1220	<b>第一节：“东盟经济体的竞争力分析及实际汇率对外贸易的影响”</b>
1115 – 1120	<b>研讨会主持人：</b> 穆利亚阿姆里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副所长（研究）
1120 – 1135	<b>“2017 年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东盟经济体竞争力排名和政策模拟”</b>

时间	节目
1135 – 1150	<p><b>发言人：</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刘阮波海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li>蔡慧莹女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li>阮维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ul> <p><b>“实际有效汇率对于东盟经济体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影响”</b></p>
1150 – 1200	<p><b>发言人：</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拉姆克申雷简教授（Professor Ramkishen S Rajan）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li> <li>刘阮波海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li>蔡慧莹女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li>黎颖儒女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ul>
1200 – 1210	<p><b>评论员一：</b> 李才永博士 (Dr Lee Jae Young) 东盟+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组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日本）</p>
1210 – 1220	<p><b>评论员二：</b> 谭小燕博士 马来西亚国际研究所客座教授兼新加坡国立大学尤索夫依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p>
1220 – 1400	<p><b>午餐会演讲</b></p>
1220 – 1240	<p><b>午餐会演讲（一）：“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融资”</b> 演讲者： 任冬艳女士 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p>
1240 – 1300	<p><b>午餐会演讲（二）：“一带一路：清算银行的角色”</b> 演讲者： 张怡女士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运营主管</p>
1300 – 1310	<p><b>问答</b></p>
1310 – 1400	<p><b>研讨会主持人：</b> 陈光炎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p>
1400 – 1505	<p><b>第二节：“印度尼西亚省份与区域竞争力分析的竞争力分析及实际汇率对外贸易的影响”</b></p>
1400 – 1405	<p><b>研讨会主持人：</b> 萨希达兰高帕兰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副所长（行政）</p>
1405 – 1420	<p><b>“2017年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印度尼西亚经济体竞争力排名和政策模拟”</b></p> <p><b>发言人：</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穆利亚阿姆里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研究）</li> </ul>

时间	节目
1420 – 143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努夏西达·宾特艾哈迈德女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li>黎颖儒女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ul> <p><b>“实际有效汇率对于印度尼西亚的省贸易的影响”</b></p> <p><b>发言人：</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拉姆克申雷简教授 (Professor Ramkishan S Rajan)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li> <li>穆利亚阿姆里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副所长（研究）</li> <li>伊曼纽尔林佳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兼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博士生</li> <li>努夏西达·宾特艾哈迈德女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ul>
1435 - 1445	<p><b>评论员一：</b> 巴达莎勒布亚教授 (Professor Balthasar Kambuaya) 印度尼西亚巴布亚天堂鸟湾大学 (Cenderawasih University) 参议院主席</p>
1445 – 1455	<p><b>评论员二：</b> 卡桑穆赫里博士 (Dr Kasan Muhri)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贸易分析与发展机构主管</p>
1455 - 1505	<b>问答</b>
1505 – 1555	<b>第三节：“新加坡中小企业生产力与效率监控指数”</b>
1505 – 1510	<p><b>研讨会主持人：</b> 曾宪文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司长兼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首席管理员</p>
1510 – 1525	<p><b>发言人：</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陈企业副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li> <li>穆利亚阿姆里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员及副所长（研究）</li> <li>萨希达兰高帕兰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员及副所长（行政管理）</li> <li>蔡慧莹女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li>阮维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ul>
1525 – 1535	<p><b>评论员一：</b> 王健全教授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职台副院长</p>
1535 – 1545	<p><b>评论员二：</b> 黄永强博士 台湾亚洲大学金融与大数据研究中心首席教授</p>
1545 - 1555	<b>问答</b>
1555 – 1610	<b>茶歇</b>
1610 – 1700	<b>第四节：“评估城市宜居性与生活成本：宜居城市一定是昂贵又难以承受的吗？”</b>

时间	节目
1610 – 1615	<b>研讨会主持人:</b> 张续垚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
1615 – 1630	<b>发言人:</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陈企业副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li> <li>刘阮波海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li>蔡慧莹女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ul>
1630 – 1640	<b>评论员一:</b> 蒂莫西麦克唐纳先生 (Mr Timothy Mcdonald) 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
1640 – 1650	<b>评论员二:</b> 许福祿先生 马来西亚国库控股研究和投资策略副总裁
1650 – 1700	<b>问答</b>
1700 – 1800	<b>第五节：“促使越南成为一个平衡，可持续和竞争力提升的经济报告：一个批判性的评估和其发展潜能”</b>
1700 – 1705	<b>研讨会主持人:</b> 陈光明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
1705 – 1720	<b>发言人:</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陈企业副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li> <li>刘阮波海先生</li> <li>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li>阮维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li> <li>周文慷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兼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生</li> </ul>
1720 – 1730	<b>评论员一:</b> 阮庭宫博士 (Dr Nguyen Dinh Cung)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
1730 – 1740	<b>评论员二:</b> 武进禄博士 (Dr Vu Tien Loc) 越南工商会主席兼总裁、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总裁峰会主席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第十四届议会议员
1740 – 1750	<b>评论员三:</b> 黄永强博士 台湾亚洲大学金融与大数据研究中心首席教授
1750 – 1800	<b>问答</b>
1800 – 1820	<b>闭幕词和未来发展方向</b>
1800 – 181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阿尔穆德卫兹女士 (Ms Almud Weitz) 世界银行交通全球实践主任</li> </ul>
1810 – 182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马凯硕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li> </ul>

研讨一结束

## 演讲者、评论员和研讨主持人的简介

### 巴达莎 勘布亚 (Balthasar Kambuaya)

巴达莎勘布亚教授目前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天堂鸟湾大学担任企业管理教授。在 2011 至 2014 年之间，他受委成为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总统任期下的环境部长。在此之前，他也是巴布亚银行的管理委员会委员，更于 2005 年起就任称得拉瓦西大学校长一职。他曾于 1995 至 2000 年间担任亚洲开发银行在称得拉瓦西大学项目实施的主任。勘布亚教授累积了将近 40 年的经验，前后撰写了多本关于他主要研究项目的书籍。这包括了巴布亚的小型企业 and 经济发展。此外，他也是大家广泛推崇的教育者，为讲师所表现的典范更在 1988 年受颁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特别奖项。源于西巴布亚，勘布亚教授 2003 年在印尼望加锡的哈桑丁大学获得经济博士学位。此前，他于英国杜伦大学完成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在印尼玛琅的布劳爪哇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 曾宪文

曾宪文是一位特许会计师，他于 1998 年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商科学士学位（会计）。他有将近 20 年的私企、高等教育行业和研究机构工作经验。他的专业领域集中于研究资金管理、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和章程的实施、财务监控和管理报告。他目前担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司长，主要负责研究资金管理部门。同时监管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日常管理事务。在此之前，他曾就职于量子研究中心，这是由国家研究基金和教育部资助的第一家杰出研究中心，所管理的研究资金超过每年三千万。他所关注的课题涵盖政治、国际局势动态和历史文化。

### 周文慷

周文慷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文慷同时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学士学位。除了参与《新加坡中小企业生产力与效率监控指数》的研究，文慷也负责撰写另一项研究项目《促使越南成为一个平衡，可持续和竞争力提升的经济报告：一个批判性的评估和其发展潜力》的报告。文慷的研究兴趣包括国际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 蔡慧莹

就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助理，蔡慧莹拥有发展研究领域的硕士学位。在此之前，她获颁马来亚大学经济学士一等荣誉学位，并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提名英联邦奖学金以攻读其硕士学位。她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项目有关国际贸易，东盟经济体与中小型企业。此外，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发展研究和公共政策。

### 萨希达兰 高帕兰

萨希达兰高帕兰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员及副所长（行政）。加入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前，他曾担任香港科技大学新兴市场研究所和赛马会高级研究所博士后。高帕兰博士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完成公共政策博士学位，专攻国际金融与政策。他从洛约拉学院（印度金奈）和马德拉斯经济学院（印度金奈）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印度管理学院班加罗尔分校研究院担任了一年副研究员后，他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做了两年国际经济与南亚政策问题的研究工作。他已经在国际领先的出版社合著出版了多本书，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中发表过多篇论文，并专著一些章节、政策简报以及全球领先金融日报上的的专栏文章。高帕兰博士的研究兴趣广泛，包括国际金融和发展政策。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他是印度旗舰项目的负责人，包括竞争力研究、营商便利度以及汇率对于次国家经济层面上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流动的影响。同时，他主管并参与多项实证研究项目的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地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并在更广泛的政策领域提供见解。

### 法蒂玛 杜尔易 卜拉希玛 (Fatouma Toure Ibrahima)

法蒂玛杜尔易卜拉希玛是世界银行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部新加坡地区的代理主任和运营顾问。该部门由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共同合作以便为基础设施和相关行业生成直接投资以及提供技术支持。自 1998 年加入世界银行以来，法蒂玛在金融和能源等多个行业工作过。在加入新加坡地区之前，易卜拉希玛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设施的地区代表，主管非洲西部，中部和北部的投资组合，同时她也是金融行业高级专家以及非洲地区任务组长，带领着不同国家和地区能源项目的设计和和实施。作为马里的公民，法蒂玛也是世界银行常务董事以及首席财务官的特别助理，她同时也作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金融行业专家，管理着金融行业和金融系统基础设施项目并且为金融行业评估项目作出贡献。

### 卡桑 穆赫里 (Kasan Muhri)

卡桑 穆赫里现任印度尼西亚贸易分析和发展机构主管，该智库位于雅加达，隶属于贸易部。他 1966 年出生于印尼西爪哇的双木丹，分别于 1998 年和 2012 年获得印尼大学硕士学位和茂物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自 2013 年起，他就职于国家利益咨询组，并与 2017 年升任组长，主要负责对贸易部提供关于反倾销及印尼贸易的保障措施的建议。他同时是贸易部下加速国际贸易谈判专门工作组的专家组组长。在成为印度尼西亚贸易分析和发展机构主管之前，卡桑曾是国际关系贸易部的专家（2016）。他还被任命为贸易分析和发展机构对外贸易政策中心主任（2016）；印度尼西亚保障监督委员会执行秘书（2012-2014）和贸易数据中心副主任（2005-2007）他在印尼对外贸易领域有着丰富的知识。在国际层面，他在 2017 年四月至 2018 年四月担任战略市场运营委员会主席 - 国际橡胶联盟。作为一名学者，在国际贸易领域，他发表过数篇论文。同时他还担任贸易科学杂志及印尼贸易总览的主编，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 1998 年以来，作为印度尼西亚农业经济学会的会员和雅加达佩巴班学院亚洲银行金融与信息研究所的客座讲师，他积极传授农业经济学和经济学知识。除了大学教育，他积极参与了两项由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组织的前沿未来领袖课程（2011）；特惠贸易协定下的发展问题和启示课程（2009）；亚洲基金会监管影响评估研讨会（2006）；美国普渡大学一般均衡建模课程（2005）；澳大利亚墨尔本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结构调整课程（2004）等机构主办的教育活动。

### 许福祿

许福祿先生在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国库控股现任经济学家，领导经济研究（发展）精英。许先生在国库控股职掌多种经济学课题，主要是工业政策，发展地理学，人口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等。此外，他还辅导国库控股的资源中心，打理机构的知识体系，活动以及出版刊物。许先生加入国库控股之前，曾担任马来西亚政府的经济规划部经济学家，有给予贡献于国家发展项目，其中包括 第十大马计划，各项经济转型，战略政策等等。他是发展经济领域学者，特别关注历史和文化对当今经济和公共政策的长期影响课题。许先生毕业于哈佛肯尼迪学院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经济学本科学位。每月，他也为马来西亚财经报“*The Edge*”撰写专栏。他的文章可在 [www.nicholaskhaw.com](http://www.nicholaskhaw.com) 网站上找到。

### 黎颖儒

黎颖儒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她是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获颁文学学士荣誉学位，并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学期中获得满分。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里，她是印尼竞争力分析团队中的一员，负责协调研究项目的实地调查工作，并协助进行数据分析。同时她也是东盟经济体团队的成员，研究实际汇率波动值对于附加值贸易的影响。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城市竞争力、发展学、政策流动性以及将研究转化为公共政策。

### 李才永 (Lee Jae Young)

李才永博士现任东盟+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 (AMRO) 组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负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日本等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监管。在加入 AMRO 前，李博士在韩国财政部服务 20 多年。在 1991 加入该部后，他曾担任了各种职位，特别是在国际金融、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合作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专业知识。1996 至 1999 年间，李博士担任国际经济政策局副局长，负责贸易与投资谈判，如经合组织多边投资协定、韩美双边投资协定和韩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2005 至 2006 年间，他担任韩国总统助理秘书，负责政策监督和监管。他也曾担任金融中心合作部主任（2006-2007 年），福利经济政策部主任（2007-2008）和文化预算部主任（2009-2010），致力于对金融、经济和财政等政策的研究。2008 年，正当雷曼兄弟破产重创全球经济之际，时任外汇政策司司长的他肩负起韩国外债管理及监测资本流动的重任。2010 年，在担任财政合作司司长期间，他对加强东盟+3 国间的区域金融合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尤为重要的是，他在创建 AMRO 及该办公室初期运作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不仅从事于东盟+3 框架内，同时还积极服务于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合作组织。在加入 AMRO 前，他曾担任外汇市场部主任，负责汇率和外汇储备。李博士拥有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 廖文良

廖文良目前是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盛裕控股集团（盛裕），和淡马锡（培育）基金会的主席。廖文良也是新加坡交易所和新中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同时他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管理咨询委员会和新加坡华社自助理事会信托局的理事。除此之外，廖文良在 2013 年被任命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和工学院的教务长教授；2017 年也同样被任命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务长教授。廖文良拥有 45 年以上的建筑和房地产开发（新加坡以及海外）的经验。从 200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廖文良担任凯德置地集团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从 1997 年至 1998 年廖文良也担任过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执行董事，并当选为一届主席。为表彰他为新加坡的卓越贡献，廖文良在 2011 年荣获了总统颁发的新加坡国庆功绩奖章。在 2016 年，廖文良也被授予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Ordre national de la Légion d'honneur)。廖文良是凯德置地的第一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他任期期间曾荣获许多奖项。在 2006 年，新加坡商业奖授予廖文良“年度杰出首席执行官”的奖章；2007 年，他在《商业时报》举办的新加坡企业大奖评选中，获得“年度最佳首席执行官奖”（公司市值高于 5 亿新元）。在 2008 年，廖文良分别荣膺《亚洲货币》颁发的“亚洲最佳首席执行官”（新加坡）及《机构投资者》杂志颁发的“亚洲最佳首席执行官（房地产）”。2011 年，他被《财经杂志》评选为亚洲 25 位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人士，还被《亚洲金融》杂志评选为新加坡最佳首席执行官。2012 年，廖先生被新加坡公共关系学会(IPRS)授予“2012 年杰出公共关系领导者”荣誉。廖文良拥有新加坡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而且是一名注册的专业土木工程师。廖文良写过五本著作：《建宇树人,第一至第三册, 总裁周日随想录》，《建宇树人, 第四册,主席周日随想录》及《近观李光耀》(Up Close with Lee Kuan Yew)。

### 伊曼纽尔 林佳

伊曼纽尔林佳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博士生，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他也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贸易部的研究员负责研究进口关税政策。在他目前的博士项目中，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机构制度因素对企业绩效，外资所有制结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关于他的博士论文是有关调查腐败对印度尼西亚外资公司所有制结构的影响以及腐败行为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力。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他加入了印度尼西亚项目组，负责研究印度尼西亚各省的竞争力以及汇率对印度尼西亚各省份出口的影响。他还积极向印度尼西亚各省政府，商人和学术界宣传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竞争力指数。

### 刘阮波海

刘阮波海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副研究员。2015 年，刘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经济学荣誉学士学位（二等甲）。刘曾获颁东盟本科奖学金，并在大学期间以优异成绩分别进入院长名单和院长学者名单。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他是旗舰项目“世界各大城市外派人员和普通居民的生活开支、工资及购买力指数”和“对于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体增长的国内和国外引擎的经济计量学模型”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东盟研究团队的副负责人，参与监管所有与东盟十国相关的项目。他也积极参与了多项研究项目，包括关于收入临界值的增长减速分析，汇率对于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影响。刘曾合作撰写了学术论文，书籍和专栏文章，内容包括世界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刘的研究兴趣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策略、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体、应用计量学、国际贸易与公共经济学等。

### 马凯硕

马凯硕教授热衷于历史和哲学，多年服务于政府部门，同时经常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他于 1971 年至 2004 年任职新加坡外交部。国外任职经历包括柬埔寨（他任职时恰逢 1973 年-1974 年的战争）、马来西亚、美国和联合国。他曾经两次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并于 2001 年和 2002 年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1993 年至 1998 年，马凯硕担任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书。他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他同时也是几个国际研究机构和智囊团的成员，包括耶鲁大学校长的国际活动委员会、国际事务专业学校协会、印度总理的全球咨询委员会、博科尼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全球议程理事会及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奖项提名委员会主席。马凯硕经常应邀在世界各国发表演讲和讲座。他曾在许多外交刊物发表文章，如《外交》、《外交政策》、《国家利益》、《华盛顿季刊》、《时代》、《新闻周刊》、《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专著有《亚洲人会思考吗？》、《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新亚洲半球：势不可当的全球权力东移》、及 2013 年出版的《大汇合：亚洲、西方与世界大同的逻辑》和《新加坡能存活吗？》。他同时也是《亚细安奇迹》的合著者。他的著作被广泛阅读并翻译。他的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美国、法国、德国、荷兰、埃及、中国、韩国、日本、印尼、意大利、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台湾和越南出版。更多详情请浏览 [mahbubani.net](http://mahbubani.net)。马凯硕于 1967 年获得总统奖学金。1971 年，他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他于 1976 年在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于 1995 年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91 年至 1992 年，马凯硕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任研究员。1998 年，马凯硕获颁公共行政功绩金奖章。2004 年 6 月，他获得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奖章，获奖咨文对其成就予以高度评价，称其为“一位天才的外交家、历史和哲学的学者，引人深思的作家、敏锐的思想家”。2005 年 9 月，马凯硕被《外交政策》和《展望》杂志推举为世界上 100 名最有权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09 年 3 月，《金融时报》将其列为在资本世界未来的辩论中最具影响力的 50 名人物之一（名单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美国总

统贝拉克·奥巴马、以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马凯硕于 2010 年与 2011 年又被《外交政策》杂志推举为“全球 100 强思想家”之一，被称为“亚洲世纪的沉思者”。

### 蒂莫西·麦克唐纳 (Timothy McDonald)

蒂莫西·麦克唐纳是一个生活在新加坡的视频、文字和电台新闻记者。他拥有自己的公司 Humidity Media。该公司主要为国际媒体客户提供服务。这些客户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BBC)、德国之声、澳洲广播电台和澳大利亚 SBS 广播公司。Humidity Media 也为新加坡本地制作公司提供媒体和撰写服务。蒂莫西在《BBC 资本》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加坡生活成本的文章，就多种生活成本调研的假设和缺点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此后，蒂莫西便受邀在 2017 亚洲经济论坛发表他的看法。蒂莫西四年前来到新加坡工作生活。在此之前，他在悉尼的澳洲广播电台工作，参与议题设定的广播时事节目 AM、PM 和《今日世界》(The World Today)。工作期间，他获得多个奖项。蒂莫西拥有玛丽华盛顿大学的国际关系文学学士学位和悉尼科技大学新闻专业硕士学位。

### 穆利亚·阿姆里

穆利亚·阿姆里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员及副所长(研究)。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自 2011 年以来，他在印尼次国家竞争力研究项目中扮演关键角色。他已在此方面合著三本书，包括最新撰写出版了《2015 年印尼各省年度竞争力分析与发展策略》。他还密切参与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对各大城市宜居性与竞争力的研究，并曾广泛撰文探讨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水平相关话题。穆利亚拥有 15 年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和非营利机构的工作经验。2008 年移居新加坡后，他在 HOK 建筑师事务所(一家全球性的规划和建筑顾问公司)任职规划整个亚洲的城市项目，也在裕廊顾问公司(新加坡裕廊集团的咨询分支)任职规划中东的工业园区。在此之前，穆利亚曾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居署等多家国际发展机构合作，他在印尼各地区开展过项目，研究课题涵盖城市和住房的发展、地方的治理和社区驱动发展等。他是总部位于印尼日惹的非营利机构“COMBINE 资源学会”的联合创始人，并且是该机构顾问委员会成员。穆利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公共政策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在印尼万隆学院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授予其富布赖特奖学金攻读城市规划硕士学位，他也曾获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志奋领奖学金。

### 阮庭宫 (Nguyen Dinh Cung)

阮庭宫博士现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他先后于 1982 年和 1996 年获得捷克共和国布拉格经济大学贸易经济学学士学位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于 2009 年获得 CIEM 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的 30 多年间，阮博士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作为主要撰写人，他曾先后撰写了《公司法及私营企业法》(1990)，《企业法》(1999, 2005 及 2014)，《投资法》(2005 及 2014)和《破产法》(1991)，以及大量指导性文件。他也曾参与了众多政策的制定，如国有企业改革，商业环境改革，改善竞争关系，投资，公共投资和促进公平竞争等等。阮博士直接参与编写了改善商业环境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 4 项决议草案，包括 2014 年 3 月 18 日第 19/NQ-CP 号决议；2015 年 3 月 12 日第 19/NQ-CP 号决议；2016 年 4 月 26 日第 19-2016/NQ-CP 号决议；以及 2017 年 2 月 2 日第 19-2017/NQ-CP 号决议。这四项决议为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行政中的时间，成本及风险的改革、提高商业及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创造了条件。他的研究方向包括公共投资，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私营部门发展，体制改革，商业环境等等。他是越南改善商业环境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倡议者，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合作发布了《2010 年越南竞争力报告》。2010 年，他的团队与亚洲基金会联合发布了《越南电子产品、纺织品和海产品出口公司的竞争力报告》。他近期的出版物包括：2015 年出版的参考书《经济全面转型过程中的监测与评价》和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参考书《国有企业与市场扭曲》，以及 2013 年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参考书《国有企业中国家所有制职能模式的改革：理论、国际经验及在越南的可行性》等。目前他还是总理公共行政改革咨询委员会委员和总理经济顾问团成员。他可以直接对总理提出关于改善商业环境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建议。他的电子邮箱为 [cunghoa22@gmail.com](mailto:cunghoa22@gmail.com)

### 阮维

阮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他以生物学学士一等荣誉学位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并曾获颁东南亚国家联盟本科奖学金。他最近的学术论文为《汇率如何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以及《实际有效汇率的数值变化和波动对于印尼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实证分析》。他的兴趣以及目前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包括：在回归和预测经济实体数据方面应用经济计量方法，例如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构建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竞争力排名和模拟分析；对新加坡中小型企业设计调查问卷及收集数据；研究世界范围内关于驻外职员及当地居民的城市生活成本。

### 努夏西达 宾特 艾哈迈德

努夏西达·宾特·艾哈迈德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她以经济学学士学位荣誉学位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努夏西达积极参与印尼省级与区域竞争力分析研究，以及其它项目如实际汇率对于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同时，她也参与公司级别生产力与效率方面的研究。努夏西达合作撰写了三本有关印尼省级发展与政策方面的书籍。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发展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等。

### 拉姆克申 雷简 (Ramkishan S Rajan)

拉姆克申雷简（博士，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此前为埃塞克商学院（或称高等经济商业学院）亚太校区经济学教授，2006年到2016年为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国际经济政策教授。此外还曾任教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和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其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发展。出版过多本书籍，期刊文章和书籍章节，以及关于国际经济学各个方面的一些政策简报，专栏和书评。

### 任冬艳

任冬艳，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技术经济专业、环境化工专业双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1996年加入中国建设银行从事国际业务工作，1997年至2001年在法兰克福分行工作；2012年3月至今在新加坡分行工作。20多年的银行从业经验中，历经前台营销、中台运营、后台管理、系统研发等多个岗位工作，曾多次参与总行级的业务战略转型规划研究和产品研发，她牵头研发的“民本通达”系列民生领域产品是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产品之一，在中国市场有较突出的影响力；曾荣获中国建设银行“十大杰出青年”荣誉。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分行持有批发业务牌照，植根本地19年。近年有效推进业务转型，优化业务结构，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在本地开展了贸易融资、公司业务、投行业务、资金业务和私人银行业务。今年四月，中国建设银行在分行设立了总行级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中心、私人银行业务中心，将分别为东南亚地区的铁路、港口、航空、交通物流、能源、信息通讯等“一带一路”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为东南亚地区私人银行客户提供高端财富管理。新加坡分行的经营区域包括新加坡、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七个国家。

### 尚穆根

尚穆根先生曾于1972年至1977年在莱佛士学院接受教育，并于1984年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顶尖学生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他在1985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代讼人和律师。尚穆根先生之后进行私人执业并成为本地最大律师行之一艾伦格禧的高级合伙人和诉讼及争议解决部门的一把手。1988年，38岁的他被委任为高等法庭的高级律师，是我国法律史上最年轻的高级律师之一。尚穆根先生作为亚洲和新加坡顶尖的诉讼，仲裁和破产法律顾问之一在执业上很成功，并持续在国际出版物中得到认可。在执业中，他经常处理重大的企业，商业和破产纠纷，不正当诉讼和查询的审判工作；并在律师纪律调查和刑事诉讼中有所作为。尚穆根先生还为新加坡的高级政府领导人，包括新加坡现任及以前的总理以及新加坡首席法官工作。超过100多件由尚穆根先生处理的案件都有被“法律报告”记录。在接受公职之前，尚穆根先生在各种委员会和董事会任职，包括法学院咨询委员会，莱佛士学院理事会；媒体发展局和胜科集团（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公司）。尚穆根先生2002年3月至2009年3月期间曾经担任新加坡印度发展协会的主席。尚穆根先生在2008年5月1日进入内阁，如今是律政部长和内政部长。他同时还担任外交部长。

### 陈永财

陈永财教授将于2018年1月1日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第五任校长。国大1905年初创时仅为一所小型医科学学校，而现已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陈教授将会是这所学府的第23位掌舵人，他目前是国大常务副校长（学术事务）兼教务长。陈教授中学时期就读于莱佛士书院（1974年至1979年），1985年在国大考获数学（一等荣誉）学士学位，1989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学士课程毕业后，陈教授继续留守国大，在数学系执教，担任高级导师。陈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李群表示论、李代数表示论、不变量理论、代数组论。他多次受邀到海外顶级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并曾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和会议论文集中发表20篇以上的论文。他曾合著三部数学书籍，包括著名的研究生教科书《非阿贝尔调和与分析》。陈教授是一位充满热忱的教育家。他是国大现行学术体系的最早期策划人，同时在校内发起了多项计划，例如“理科特殊计划”、“大学学者计划”、“大学城寄宿学习课程”、“免学分学年计划”、“技术强化学习计划”。陈教

授 1998 年获得国大创新教学奖，并曾担任新加坡数学学会会长（2001 年至 2005 年）和东南亚数学学会会长（2004 年至 2005 年）。陈教授是多个研究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国防部属下的国防科技局、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国防科技研究院、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他也是国立教育学院和国大数理中学的理事会成员，以及社会企业“商联中心”（Bizlink Centre）的董事局成员。陈教授于 2014 年国庆日获颁公共行政（金）奖章，以表扬他对教育的杰出贡献。

### 陈光明

陈光明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助理。在英国约克大学取得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后，他于 2016 年在牛津大学取得世界英语文学的一等硕士学位。自 2017 年初加入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以来，他一直负责协助 OUE 商业案例研究项目的资料整理工作，并同时参与研究所关于中小型企业生产力的追踪和效率监控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他也协助更新研究所关于生活成本、工资和购买力，以及全球宜居城市指数的资料库。陈光明参与撰写了“为未来经济打造新共识”这篇评论员文章，并发表于海峡时报。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东盟的经济发展，还有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增长的交互情况。

### 陈企业

陈博士曾被英国大学副校长委员会授予海外研究生奖学金，并于 1987 年毕业于英国东英格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进入银行业担任财库资金经理，并任职资产与负债委员会的秘书长长达三年。此后，他在 1990 至 1993 年间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系。陈博士于 1993 年加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并在 2007 至 2009 年间担任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目前，他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担任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博士也是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主席。陈博士广泛地为各政府部门、法定机构及新加坡政府关联企业提供咨询和研讨关于金融、财政、贸易、旅游业、公共住屋、人力资源、电信、宜居城市、创意产业、媒体、社区发展、机场及海港的运作等领域的相关政策及措施。这些部门、机构和企业包括财政部，贸工部，人力部，建屋发展局，新加坡民航局，新加坡旅游局，贸易发展局，海事港务局，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国家发展部，媒体发展局，环境和水利部，新加坡设计理事会，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新加坡报业控股，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星和电信、嘉德置地和大东方人寿等。他还曾为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世界黄金协会，东盟秘书处，香港中央政策组，科兹纳国际，拉斯维加斯金沙和滨海湾金沙酒店等国际机构和部门担任顾问。陈博士已撰写了超过二十本书，他是美国《太平洋地区金融市场和政策评论》期刊的副主编，也是英国《竞争力研究期刊》的编辑咨询委员。他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计量经济预测，生活成本指数，全球宜居城市指数和中国 31 个省、印度 35 个州和东盟十国的竞争力分析。陈博士曾于 2004 年担任新加坡经济学会副主席。他在 2002 年的经济审查委员会担任便携式医疗福利工作组主席，在 2003 年担任政策研究学院经济重组论坛副主席，并且自 2007 年起担任国会运输委员会、国会财政及贸工委员会与国会国防及外交委员会的顾问小组成员。陈博士广泛地指导和引领了多家跨国公司的公开上市，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公司。他目前也是新加坡上市公司面包物语、宝德工程、腾地有限公司与成都农商银行的独立董事。

### 陈光炎

陈光炎教授现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教授和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他也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教授同时也是樟宜机场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盛邦裕廊私人有限公司、星桥桥腾飞私人有限公司和凯德商用中国信托管理公司的董事。1985-1988 年，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应邓小平先生之邀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咨询期间，陈教授担任吴庆瑞博士的首席助手。2002 年 6 月至 2005 年 6 月，陈教授出任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陈教授也是 2004 年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专家组成员。专家组针对城市化、区域差距、创新政策、能源与水资源政策，以及银行改革战略等领域为中国政府提供分析和政策建议。在此之前，陈光炎教授曾担任新加坡政府首席经济学家（1999—2002），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决策系主任。陈教授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75-79，1931 学者班优异奖、Paul Volcker 论文奖），之后他在三年内获取斯坦福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1980-83）。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职之前，陈教授曾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世界银行以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工作，并曾担任新加坡贸工部经济研究署署长。陈光炎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与金融、亚太地区经济与贸易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经济改革。他出版过 10 本有关亚太地区经济和商业研究的著作，并在《美国经济评论》、《世界银行经济评论》、《长期决策》和《澳大利亚管理杂志》等主要国际性期刊上发表过众多相关主题文章。1984—1996 年期间陈教授担任新加坡中央公积金董事，1989—1990 年任国家生产力委员会委员；此外他还为多家公司或组织提供咨询，其中包括：淡马锡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花旗银行、IBM、美国电话电报公司、BP 石油公司、

荷兰银行、宜家、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新加坡经济发展局、阿海珐集团、嘉德置地、美孚石油公司、新加坡技术公司等。

### 谭小燕

谭小燕博士是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一名高级研究员，同时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的一名兼任教授。她曾担任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她还曾担任数个国家机构的咨询顾问，比如马来西亚生产力中心（后被重新命名为马来西亚生产力机构），马来西亚通商产业部以及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她的咨询工作同样涉及到国际机构，例如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学院，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她的科研方向及论文发表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贸易政策以及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工业发展。她近期发表的论文包括“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当代亚洲期刊第 46 卷第 4 期第 680-699 页，2016 年（与安德鲁·金和诺·伊萨蒂娜·阿西斯合著）；“研究向服务行业的转型：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比较”，当代亚洲期刊，2017 年 4 月，数位物件识别号：10.1080/00472336.2017.1310273；“东亚经济机构的制度化”，《制度化东亚》（由爱丽丝·巴，郭清水和须藤末雄编辑），第三章（与须藤末雄合著），阿宾登罗德奇出版社，2016 年。谭秀英博士拥有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 武进禄 (Vu Tien Loc)

第十四届立法会议员（2016 - 2021 年）

越南工商会主席兼总裁

2017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席执行官峰会主席

武进禄博士自 2003 年起担任越南工商总会会长，主席。自 2001 年起，他担任国民议会的高级会员，并且是经济委员会的成员。武进禄博士也是东盟工商会主席。于 1960 年出生于北部沿海的太平市，越南。在越南的政治结构中担任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职位，包括越南企业中央委员主席、越南商业论坛联合主席、总理行政程序改革咨询委员会副主席、等等。他一直站在建立正规商业协会的前沿，他的商业和创业精神是受到政府和党的认可与赞许的。例如，他是第一个获得“企业家- 和平时期的战士”称号的。他是越南共产党在 2013 年被批准作为第一个正式认可并赞同创业的党决议（第 09-NQ/TW 决议）背后的推动力。他在 2013 年提出并说服国民议会在越南宪法中认可企业和创业精神。他是国家提高越南竞争力的项目主任。他监督了省竞争力指数和部会绩效指数的创建，以激励改革进程，改善当局的治理。他主持和领导了中小企业第一批发展的实施。他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治理论学士学位。他领导许多研究项目，并在越南和海外的几所大学讲课。

### 王健全

王健全，台湾彰化人，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前往美国攻读研究所，取得美国普渡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专长为产业经济、产业科技政策。1989 年学成归国，任职中华经济研究院，由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升任目前的副院长，并兼任第三所（台湾经济所）所长。研究之暇，担任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兼任教授。经历包括中国文化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并曾担任过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经济部顾问、经济部产业咨询发展委员会委员、总统府经济发展咨询会委员、经贸国是会议引言人等。参与研究计画超过 200 个，并发表过 20 篇左右的 SSCI 或 EI 论文，以及报章时论 200 篇以上。

### 阿尔穆德 卫兹 (Almud Weitz)

阿尔穆德 卫兹女士现任世界银行交通及信息通讯的全球项目的执行经理，此项目覆盖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多个国家。此前，她曾作为用水卫生专家担任世界银行全球水计划的地区负责人九年之久，专门处理东亚和南亚的用水卫生项目。卫兹女士于 2007 年加入世界银行，在此之前她曾有八年在马尼拉和雅加达的亚洲发展银行承担多个项目经理职位。她最初于纽约的联合国发展项目任政策分析师一职。卫兹女士拥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双重国籍，以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 黄永强

黄永强教授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取得他的博士学位，主修为商业统计(财务统计)。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学士学位，主修数学，副修经济统计。近来，他任职于亚洲大学财经系教授，曾任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风险管理学系副主任。黄教授曾出现在奎斯世界名人录。他的埃尔德什数为 3，也被社会科学研究网评为前 1%，并都被台湾经济学家、亚洲经济学家及 RePEc 收录于顶尖经济学家名单。黄教授获得了 5124 位（2012 年以来的 3209 位）google 学者的引用，更超过 2854 次被 Researchgate 引用，以及超过

600个引用于科学网。根据 Google 学术搜寻引擎，得到 h 指数：40（2012年以来的 32个）和 i10 指数：114。他一直在为国际学院、政府、社会和大学服务，也为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并向几所大学提供讲座和研讨会。例如，黄教授曾担任国际期刊编辑、客座主编、顾问、副主编，更被任命为各种国际协会研究机构的顾问成员，担任许多期刊会议的裁判、独自或共同监督海外研究生、外部审查员及其他大学的外部审查员，并被许多大学机构邀请提交论文或举办研讨会。他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发表论文。

### 张续堉

张续堉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6 年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应用数学系荣誉学士学位和经济学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曾经担任该大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的助教。其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和公共经济学，尤其对专利授权，技术转让和反垄断方面有更深的研究。研究论文包括：在存在腐败的情况下，政府在治理污染问题时的最优税率；在合资研究中，技术转让的益处；以及高通公司在中国的反垄断案中应采取的专利授权方法。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主要负责大中华经济圈中各经济体的竞争力分析，以及山东省 17 个地级市城市发展指数的研究。还协同负责研究汇率对于中国大陆各省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也在研究如何把夏普利值应用于指数排名分析中。这个方法将广泛应用于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有指数排名的项目。同时，也参与讨论了创建经济发展特区指数和基础设施建设指数等项目。

### 张怡

新加坡分行运行管理部主管，自 2013 年 6 月外派至工行新加坡分行工作，负责新加坡人民币清算行建设。张怡自 2002 年加入中国工商银行，在清算支付领域具有 15 年的丰富经验，外汇新加坡工作前，曾先后在工行苏州分行国际业务部、工行总行运行管理部工作。在总行工作期间，全程参与了工行全球化统一的清算支付体系建设，以及 SWIFT 相关解决方案的实施、整合和全球推广，并应邀多次作为嘉宾在 Sibos 年会就跨境清算业务发表主题演讲。张怡毕业于苏州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拥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以及 FRM 资格证书。2012 年，参加工行国际化培训项目，在多伦多大学进行了为期 10 个月的学习和进修。

28 Aug 2017 10:45 AM  
[Home](#) [News](#) [Singapore](#) [World](#) [CNA Insider](#) [Business](#) [Sport](#) [Lifestyle](#) [Technology](#) [Health](#) [Commentary](#) [Catch-up TV](#)



Singapore

## For Belt and Road to succeed, China must work harmoniously with other countries: Shanmugam

Through the trade route and other initiatives, China has the potential to build a "new economic architecture that can uplift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hemisphere", Singapore's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say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presents many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in the region, but the Asian superpower has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for it to succeed, Singapore's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said on Monday (Aug 28).

SINGAPORE: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ws/singapore/belt-and-road-initiative-will-help-china-grow-ties-with-rest-of-9033642\)](#) (BRI) presents many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in the region, but the Asian superpower has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for it to succeed, Singapore's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said on Monday (Aug 28).

Building on the ancient overland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onnecting China to Europ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onnecting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e BRI is aimed at facilita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infrastructure.

Speaking at the Asia Economic Forum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r Shanmugam said the project was bold, imaginative and ambitious, and exemplifies the vision of a country that is currently the "world leader in many aspects of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China has also been "very strategic" in the way it has been investing, linking up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s, and its companies are prepared to take risks and invest in lar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e minister said.

Noting the many criticisms levelled at China and its political system, Mr Shanmugam said that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the country has achieved results for its people over the last 35 years "on a scale that no other country in history has" – both in terms of the speed of progres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made the leap from poverty to prosperity.

"China has been showing its detractors are getting it wrong," he said, citing its succes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rary to claims that its political system does not allow innovation.

Mr Shanmugam called the BRI "arguably the most ambitious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history" with the "potential to bring Eurasia,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even closer together".

However, he added a note of caution:

While routes such as the BRI enable trade, they can also enhance connectivity between extremists and jihadist influences. There are also risks associated with other countries' individual interests, he said.

"China will have to try and work with thes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try to align them. That is not going to be easy. In many ways, building the infrastructure is the easier part."

If there is a deficit in trust with other countries, regional counter blocs with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Japan and perhaps powers outside Asia may form, and possible US influenc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the minister said.

It will be easier to achieve this if it is able to work harmoniously with "countries which have weight, influence in the world economy" as well as receives the cooperation of such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ute, he added.

### CHANGING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his speech, Mr Shanmugam noted the rise of China, which he said is likely to be the largest world economy in absolute terms, though not in per capita terms. Technologically and militarily, China will become a more significant player over the next 20 to 30 years, he predicted.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for-belt-and-road-to-succeed-china-must-work-harmoniously-with-9162874>

Channel NewsAsia  
Singapore, 28 Aug 2017 11:07AM



With this, he said there will also inevitably be a change of relative power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Although the minister stressed that the US still has a significant lead, the world superpower will have "less and less scope for unilateral actions especially in areas of the globe where China has strong interests", he said.

China also will not be able to ignore US interests even as its power increases, he added.

"It is likely that the US ability to decide unilaterally will be reduced from what it has been in the last 25 year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difficult to see any one country - including China - taking over the US' role of global leadership."

Mr Shanmugam also argued that it is in China's interests to work with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uilt on free trade.

He said that for many Asian countries, while China is the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the ultimate consumer of most of the traded products is still the US. The products go as intermediate products to China, before the finished products are then exported to the US.

This situation will likely remain for some time to come, he said, adding that for the BRI to succeed, the globalized economy needs to function. This means "there must be no trade wa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re must be continued growth, peace and stability - all of this and more will be necessary."

The minister said: "How stable a more multipolar world will be difficult to predict, but it will be in the US', China's and other countries' interests to maintain stability."

#### HOW DOES THIS IMPACT SINGAPORE?

According to the Home Affairs Minister, figures show Singapore is already benefiting from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BRI, with China's investments in Singapore alone making up about a third of its total investments in BRI countries.

Singapore's investments in China also accounted for 85 per cent of total inbound investments from BRI countries, he noted.

The country recognised very early the potential for China's growth from the early 1980s, and was an "active proponent of that growth", Mr Shanmugam said, adding that the country supported the BRI since its early years of inception.

"With the new opportunities, we can (and) should be able to find ways of being economically relevant."

Small states must continually earn their releva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he said. "China, the US, India will be there a hundred years from now. For us, nothing is guaranteed. The world can pass us by in an instant."

Singapore benefits from initiatives like the BRI and will also continue to maintain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its neighbours, with China as well as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in Europe and the US, he said.

"Can Singapore remain relevant in the future? We can, if we are smart ... we achieved what we have achieved by thinking bold, thinking big."

Source:  
CNA/mz

#### Tags

[China \(/action/news/8396414/search?query=%22China%22\)](#)

[Singapore \(/news/singapore%22\)](#)

[Belt and Road \(/action/news/8396414/search?query=%22Belt%20and%20Road%22\)](#)

[One Belt One Road \(/action/news/8396414/search?query=%22One%20Belt%20One%20Road%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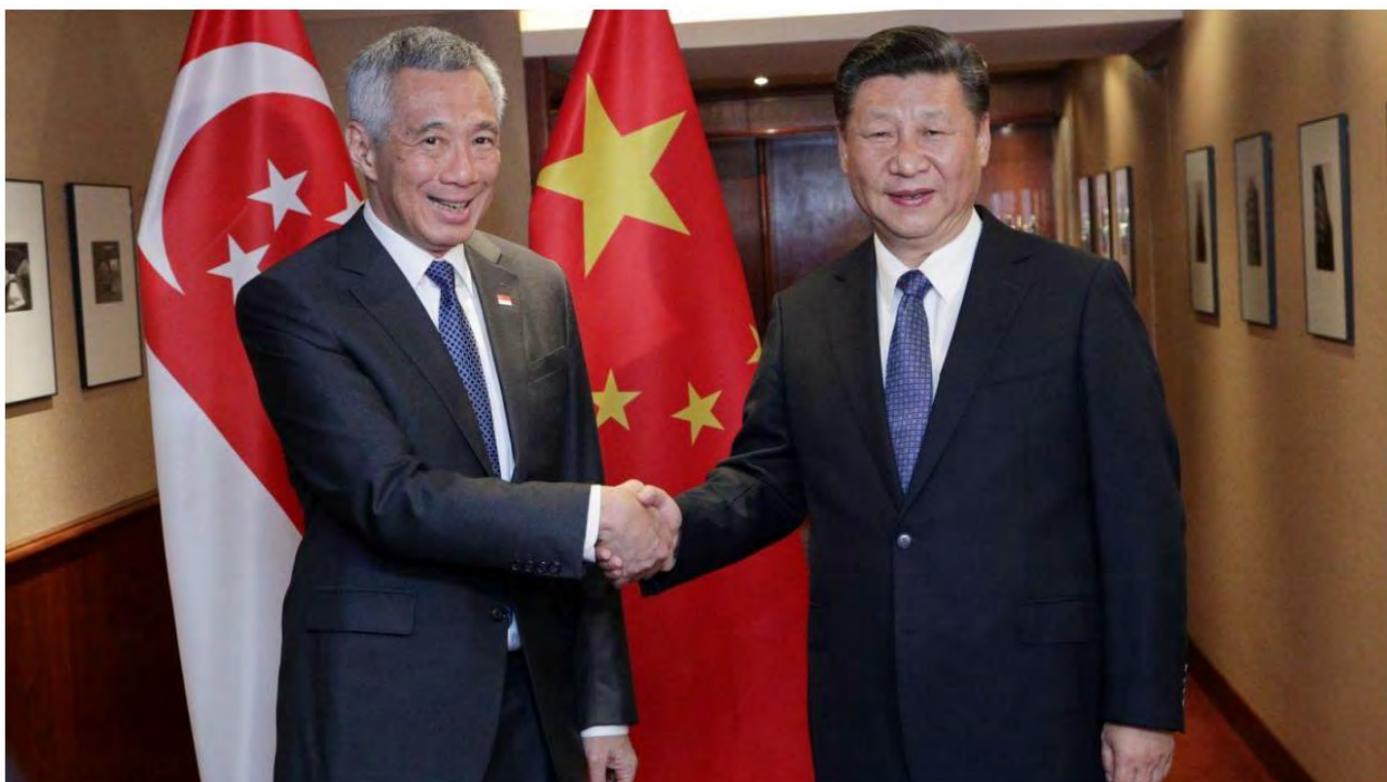
[K Shanmugam \(/action/news/8396414/search?query=%22K%20Shanmugam%22\)](#)

Get the Channel NewsAsia newsletter in your inbox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for-belt-and-road-to-succeed-china-must-work-harmoniously-with-9162874>

9/4/2017

先趕間諜後讚最強 完美示範打倒昨日的我 新加坡突力撐一帶一路 | 香港01 | 國際 |



國際

## 先趕間諜後讚最強 完美示範打倒昨日的我 新加坡突力撐一帶一路

撰文：楊紫微 發佈日期：2017-08-28 22:45 最後更新日期：2017-08-28 22:45

新加坡內政部長尚穆根（K. Shanmugam）在周一（28日）發表演講，指新加坡積極支持一帶一路及準備就緒從中獲利。

他今次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旗下的亞洲競爭力研究所組織的論壇中的演說，似是最近期新加坡一系列支持中國一帶一路的動作之一。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115221/%E5%85%88%E8%B6%95%E9%96%93%E8%AB%9C%E5%BE%8C%E8%AE%9A...> 1/5



新加坡內務部長尚穆根發表演講，指新加坡積極支持一帶一路及準備就緒從中獲利。(VCG)

「一帶一路帶來極大的經濟機遇。如果改善(國家間的)連接，人們旅行來往，投資循環增加，我們若有準備又夠精明的話就會獲利。」曾任職外交部長的尚穆根說道。新加坡這種對一帶一路抱有正面態度的說法，近月着實罕見。

一帶一路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跨國經濟帶項目，希望以鐵路、公路等基建連接亞洲各國、並貫通至歐洲及中東等地，全球共有60多個國家參與計劃，預計基建投資達數萬億美元。

尚穆根認為一帶一路「改變了遊戲規則」，更是「歷史上最雄心壯志的基建計劃」，又以數據指出，新加坡已在一帶一路中獲利。例如，新加坡在中國向一帶一路投資總額中佔三分之一；而在共計60個國家向一帶一路作出投資總額中，新加坡佔當中85%。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115221/%E5%85%88%E8%B6%95%E9%96%93%E8%AB%9C%E5%BE%8C%E8%AE%9A...> 2/5



一帶一路計劃示意圖。

## 中新關係惹疑慮

今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中，只有3個參與國的最高領導人未有出席，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引來外界對中新關係的疑慮。有分析曾指，按照一帶一路的計劃，最終亞洲與其他大陸的貿易路線，可繞過新加坡這個貿易大港口，削弱了獅城的地位，所以新加坡沒有積極支持一帶一路，其實可以理解。但完全抗拒這個進行的如火如荼的計劃，或許不是明智之舉。

然而，尚穆根周一的這趟發言，與過往新加坡對華態度截然不同的程度，予人「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之感。本月4日，新加坡知名國際關係學者黃靖被指控「勾結了外國的情報組織」，同由尚穆根領導的內政部以他「損害新加坡利益」及「顛覆新加坡主權和干預內政」為由，指黃靖和他的太太「不再適合在新加坡出現」，而取消他的新加坡永久居民身分。儘管內政部聲明未有明言，但一般相信此舉是針對中國，即使黃靖夫婦二人上訴，最終亦被駁回。

《彭博》引述消息指，新加坡5月時派出國家發展部長黃循財出席，而非總理李顯龍親自到場，是由於中方未有對各國國家領袖發出正式邀請函。新國政府冷待該次峰會，中方將其視為合作意願不大的意思。

但今次新加坡內務部長的發言顯然希望積極與中國修補關係，尚穆根提及外界對於中方政治系統的鞭撻，認為必須承認中國在過去35年來的發展規模「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做到」。

尚穆根又盛讚一帶一路是中國崛起的成果，同時亦是推進國家發展的關鍵，除此以外，他又指中國在絕對數值上應是全球最大貿易國。不過，根據世貿組織4月發表的報告，中國自2013年起拿下全球貿易一哥位置，三年後已被美國以3.7萬億美元貿易額，在中國手上重奪世界最大貿易國頭銜，同年中國貿易額為3.68萬億。



一帶一路為巨型跨國經濟帶計劃，全球共有60多個國家參與計劃，預計基建投資達數萬億美元。（網上圖片）

《海峽時報》的報道亦在旁吹風，表示新加坡是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的「積極擁護者」，更是最早加入中國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員國之一，亞投行就是一帶一路的重點項目之一。

尚穆根特別提及新加坡的小國身分，指雖然新加坡小得難以影響大趨勢，故選擇成為觀察者並隨行就市：「當我們的利益受損時，我們觀察，我們清楚表達立場。」他又指，如果小國容許自己受大國利誘或欺壓，便會極易喪失主權，尤其是多元文化組成的新加坡社會，更加難以復原。似乎對中新關係的相處模式有所暗示。

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雖小，但在大國之間游走如魚得水；自從李顯龍上任總理之位後，中新關係一直猶如大海中的小船，風平浪靜時看似四平八穩；但天有不測之風雲時，便極易翻船。回望去年底的中方扣押新加坡裝甲車事件，又或是威脅新加坡港作最大轉運港地位的克拉運河計劃，中方出手頻頻，新國態度就且軟且硬，今次尚穆根的演說看來是另一次的俯身。

9/4/2017

先趕間諜後讚最強 完美示範打倒昨日的我 新加坡突力撐一帶一路 | 香港01 | 國際 |



尚穆根演講矛頭直指特朗普推行的美國優先政策。(VCG)

### 一帶一路或改寫中美地位

尚穆根又在演說中談及地緣政治局勢，他認為一帶一路是中美對奕之中的重要關鍵，將會影響世界權力平衡。他表示，中國正以超級大國之勢崛起，即使是貪腐及人口老化等國內問題亦無阻其發展。又指中美兩國的相對地位即將起變化。

尚穆根評論指近期美國視野變窄，重點推行「美國優先」政策，似乎放棄了從前對自由貿易的堅持。「如果美國繼續走反貿易路線，退出貿易協議，對其他國家實施經濟制裁和關稅戰爭，就會有越來越多國家發現一帶一路更加有吸引力。」尚穆根說道。

不過，對中國來說一帶一路亦非全無風險。尚穆根警告指，一帶一路途經的中亞地區局勢緊張，俄羅斯、印度、土耳其及伊朗各國都有各自的打算，未必會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而且通路改善後，得益的不止是商貿組織，也可以是恐怖分子。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115221/%E5%85%88%E8%B6%95%E9%96%93%E8%AB%9C%E5%BE%8C%E8%AE%9A...> 5/5



首页 > 即时 >

## 尚穆根：智库扮演着重要角色 必须保持客观

© 2017年8月28日 22:05



内政部长尚穆根（照片：TODAY档案图片）

内政部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示，智库扮演着重要角色，可提供不同的观点，但关键是智库必须保持客观。

尚穆根在“一带一路倡议：效果与影响”亚洲经济论坛上，答复有关智库和商人在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扮演着什么角色的提问时，表示这点。

尚穆根说，学者如果被外国政府收买，表面上以客观和学术自由之名，呈现出一套观点，而隐藏的议程却是要影响新加坡的政策，这是无法被接受的。

尚穆根说，智库必须时时保持警惕，而真正的学者能提出具学术性且实用的观点，来帮助国家。不过，这不意味着智库必须认同政府的做法，智库甚至是可以客观地挑战政府，或者其他人的观点的。

针对商人的角色，尚穆根指出，商人在同国外建立关系时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有时政府无法接纳商人的建议，是因为商人有商业的考量，而政府必须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利益。

- 958/Y1

<http://www.channel8news.sg/news8/latestnews/20170828-sg-thinktank/3811016.html>



首页 > 新加坡 >

## 尚穆根：我国会继续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 2017年8月28日 16:23



(照片：Raj Nadarajan/TODAY)

内政部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示，我国会继续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因为它将让我国和其他亚细安国家受惠。

尚穆根在“一带一路倡议：效果与影响”亚洲经济论坛上致词时说，我国应该抓紧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机遇，在面对来自其他地区的竞争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尚穆根说，在新机遇下，我国可以、也应该找到能让新加坡发挥经济作用的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和各国打好关系，因为小国必须不断在国际舞台上证明自己能够作出贡献。

尚穆根也形容“一带一路”倡议是大胆和创新的愿景。他认为，中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计划，建构新的经济结构，提升本区域的经济增长。

尚穆根说，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务必同对世界经济有影响力的国家和平共事，并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 958/Y1

<http://www.channel8news.sg/news8/singapore/20170828-sg-shanmugam/3810586.html>

9/18/2017

【亚洲经济论坛】尚穆根：支持一带一路 积极发挥影响力 - 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



首页 > 新加坡 >

## 【亚洲经济论坛】尚穆根：支持一带一路 积极发挥影响力

© 2017年8月28日 13:02 2017年8月28日 14:41

A A+ f t in g+ e +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示，我国会继续支持一带一路，因为这些项目让我国和其他亚细安国家受惠。尚穆根也表示，我国应该抓紧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遇，在面对来自其他地区的竞争时，做好应对。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今早的“一带一路倡议：效果与影响”亚洲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说。他表示我国从一开始就支持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以后也会继续支持这个倡议。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说，“在新的机会之下，我们可以也应该寻找方法，让我国在经济上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同各方打好关系，小国一定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尚穆根形容一带一路倡议，是地缘政治的趋势，以及大胆和创新的愿景。他指出，中国能融合国家资源，也拥有世界领先的基建和科技，在同其他国家合作之下，中国将能把愿景化为现实。

他认为中国策略性地投资各地的基建，使得更多国家支持一带一路。而美国采取美国优先的政策虽然可以理解，但如果它继续采取反贸易措施，将令更多国家发现一带一路的吸引力。

他也认为，一带一路能拉近东亚、亚细安和中国的关系，并改变贸易路线。尚穆根表示，在一带一路，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下，中国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使区域内所有国家获益。

- CH8/KH

<http://www.channel8news.sg/news8/singapore/20170828-sg-belt-road/3810386.html>

9/18/2017

尚穆根：中国有能力克服挑战 实现一带一路愿景 - 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



首页 > 即时 >

## 尚穆根：中国有能力克服挑战 实现一带一路愿景

🕒 2017年8月28日 20:47 🔄 2017年8月28日 22:55

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大胆创新的愿景，中国有能力克服挑战，实现愿景。尚穆根也指出，一带一路带来许多机遇，使区域内所有国家，包括我国也能从中受惠。中国如果同其他国家合作，将能更容易实现愿景。

尚穆根在亚洲经济论坛上指出，一带一路预计耗资几万亿元，涵盖60多个国家，可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项目。他说中国必须平衡好不同国家的利益，说服一些国家，如日本和印度也加入计划等，不过，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内政部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即便是中国，可在现代世界孤立无援生存。该如何在利益矛盾之时取得平衡，稳定与强国间的关系，都是棘手问题。中国以平和方式日益强大，或成为超级强国，对中国和我国都有利。”

尚穆根指出，一带一路不会取代目前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如果倡议取得成功，将能重新塑造全球贸易体系，使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亚洲。他也说我国虽然是小国，但只要做好应对，抓紧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机遇，即使面对外来竞争，还是能保持与时俱进。

尚穆根也强调我国同各方打好关系的重要性。小国一定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国正因为勇于大胆设想，取得今天的成就。我国没让任何人欺负，也没迎合他国的要求。很多人试过，但我们没屈服。国际关系就像弱肉强食的环境一样，小国面对风险。”

尚穆根说，我国会继续支持一带一路，因为这些项目让我国和其他亚细安国家受惠。

- CH8/YI

<http://www.channel8news.sg/news8/latestnews/20170828-sg-obor-shanmugam/3810840.html>

9/18/2017

尚穆根：中美双方要找出新的共存方式 | 联合早报



## 尚穆根：中美双方要找出新的共存方式

2017年8月28日 星期一 09:47 AM  
文 / 何惜微 (/byline/he-xi-wei-4)

中国急剧增长，它所占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预计将继续增长。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越美国。不过，它的人均GDP与美国仍有一段距离。

此外，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也是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今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效果与影响”经济论坛上突出中国的增长趋势。他举例，美国国会尝试阻挠中国在世界银行中应扮演的角色，但中国经济强劲、外汇储备庞大，可谓势不可挡，“中国于是设立自己的国际银行。”

尚穆根指的是中国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他说，新加坡是最早支持设立亚投行的国家之一，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随后急忙予以支持。

他指出，如果美国坚持反贸易的论述，抽身于贸易协定，并且以经济制裁对付特定国家，又出现“关税战争”，那相信更多国家会觉得“一带一路”倡议具吸引力。这意味着在中国有浓厚兴趣的领域里，美国要采取单方面行动的空间越来越小。

<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70828-790690>

# 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面对风险 尚穆根：中国应争取他国合作支持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左）在45分钟的演讲中突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潜能和挑战，他也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企业博士主持的对话会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海峡时报）

## 智库应在必要时 提供独立客观观点

智库不是任何时候都要附和政府的意见，更关键的是在必要时挑战政府的思维，提供独立和客观的观点。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效果与影响”亚洲经济论坛上，就向与会者扮演什么角色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说，已故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是设立智库的功臣，吴庆瑞当时不希望政府出现“集体盲思”（groupthink），希望智库能为政府提供独立、客观的观点以及新鲜的视角。“不是无谓地挑战政府，而是在必要时这么做”。

尚穆根也说，如果吴庆瑞觉得他一手成立的智库成为其他国家对我政策发挥影响力的工具，“吴博士在天之灵必定不能安息”。

尚穆根回应问题时并没有提起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黄靖，本月月初被取消去后留任的事件。

下与国外情报机构和情报人员接触，与他们合作影响新加坡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本地舆论。

黄靖被指是试图影响本地舆论的外国代理人（agent of influence），内政部指他在知情

“一带一路”倡议可促进贸易，但也可能促进极端分子和支持圣战者之间的沟通。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阐明倡议可面对的风险之余，也呼吁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争取他国的支持。

他昨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效果与影响”亚洲经济论坛上说，中亚国家的机制仍在发展中，领导人一改变，政策也会相应改变，这些国家的局势不太稳定。偏偏俄罗斯对中亚区域虎视眈眈，印度、土耳其和伊朗等中亚国家也有自身的利益，而这些

利益未必与中国的一致，中国必须正视各国的关注，以取得这些国家的支持。

另外，像印度和日本等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也不太热衷，中国同样需要把触角伸向这些国家。

“理想的情况是中国受尊敬、爱戴和信任，因为大国的举动会被他国一一分析，如果缺少信任，可形成区域对抗集团（bloc）。”

尚穆根举例，印度、日本和亚洲以外的国家都可能形成这类集团。“任何国家，包括中国，

都不能在这现代世界里独自行事。它如何使相抵触的利益一致，并消除其他国家的担忧，是不容易处理的事。”

他也说，目前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不是这个国际秩序的代替品，如果全世界都倾向保护主义，倡议就会受影响，而如果中美掀起贸易战，倡议同样会受影响。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各国都有多个贸易伙伴。许多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虽然是中国，经贸产品最终的消费者却在美

国。中间产品往中国去，制成品从中国再到美国，这情况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要成功，全球化经济就要顺利运行。”

尚穆根指出，中国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胆愿景，就要与能对世界经济发挥影响力的国家合作，也要与可发挥影响力的沿线国家合作。他说，亚细安这个区域组织在道路、轨道和港口的互联互通，预计能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经济区。

## 中国将很快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中国急速增长，尽管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仍有一段距离，但它所占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预计将继续增长。如果以绝对值而言，相信它很快就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加上中国将近14亿的人口，以及军力和科技实力，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目标指日可待。若以中美的相对实力而言，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相信，假以时日会出现改变，而且变化或许比想象中更快。

他昨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效果与影响”亚洲经济论坛上说，以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nominal terms）来说，美国目前占25%，中国占15%，但1980年时，中国才占2.7%，美国的占比则是26%。

尚穆根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史无前例，它在30年里让7亿人脱贫。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越美国。

此外，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也是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尚穆根说，美国国会曾尝试阻挠中国在世界银行中扮演应有的角色，但中国经济强劲、外汇

储备庞大，可谓势不可挡，“中国于是设立自己的国际银行”。

他指的是中国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他说，新加坡是最早支持设立亚投行的国家之一，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随后急忙予以支持。

他也说，中国在海外的战略投资尽管有时造成紧张关系，却整体而言对建立良好关系是有利的，因此“吸引许多国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相反的，美国近期更狭隘地定义其自身利益，采取“美国优先”做法，并且有意偏离一些基本立场，如支持自由贸易。

尚穆根说，美国认为它长期承担的成本，包括安保成本，与其他国家不成正比。“当美国政府的政策更清晰时，如果大家仍认为美国在撤消或削弱它的全球影响力……如果美国持续它的反贸易论调，抽身于贸易协定，以经济制裁对付特定国家，又出现关税战争，那相信更多国家会觉得一带一路倡议具吸引力。”

这意味着渐渐地，在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地域里，美国要采取单方面行动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不过，就算中国加强了实力，也不表示中国就可以忽视美国的利益，双方得找出新的共存方式。”

## 尚穆根： 新加坡应求新求变为“一带一路”做贡献

何惜薇 报道  
hosb@sph.com.sg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形容“一带一路”倡议是个“大胆、创新的愿景”，他相信中国能够实现这个愿景，因为它不仅拥有所需资源、政治决心和先进科技，在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上，也是全球领先的国家。

尚穆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为每个人创造契机，像新加坡这样的蕞尔小国也不例外。他说，新加坡应该求新求变，继续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他昨早在世界银行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联合的经济论坛上指出，这个“开创新局”“史上最具雄心的基础建设项目”已经让新加坡受益。中国在新加坡的投资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则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总额的85%。

部长说：“我们必须很机敏，要有所警觉有所准备，抓住这些时机。”

昨天的论坛主题是“一带一路倡议：效果与影响”。在45分钟的演讲中，尚穆根也追溯“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发展背景。他说，殖民地的历史教科书，虽然提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埃及、印度河谷和中

尚穆根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开创新局”“史上最具雄心的基础建设项目”已经让新加坡受益。中国在新加坡的投资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则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总额的85%。

国等古老文明，但只是把它们视为西方世界崛起的前奏。其实在西方探险家如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出现之前，丝绸之路早已是世界贸易的命脉，为中国和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带来财富，也传播了各种资讯和思想，使亚洲当时成为文明的中心。

尚穆根说，中国正是希望透过“一带一路”倡议“重塑那一段历史”。

### 将世界经济重心巩固在亚洲 中国是“中心的中心”

他说，“一带一路”倡议将把世界的经济重心巩固在亚洲，而中国会是“这个中心的中心”。“不是条条道路都会通向北京，但是很多道路都能通达。一个前提是亚洲主要经济体合作，不引发贸易战争，也不出现各国联盟相互对抗的局面。”

尚穆根说，正如新加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潜能，我国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初期就已予以支持，并认识到这个倡议会让亚洲和亚细安受惠，包括促进更大的区

域经济整合。

“有了新的契机，我们可以也应该能够找出让我们发挥经济作用的方法。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多极世界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竭力建立良好关系。”

除了尚穆根，李显龙总理和张志贤副总理也曾在不同场合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能起的积极作用。例如李总理认为，这个倡议能通过加强各国联系，创造双赢协作。张志贤则形容“一带一路”是“宏伟愿景”。

### 提醒小国不能迎合大国

与此同时，尚穆根也谈到小国必须能在世界舞台发挥作用的重要，并提醒小国不能迎合大国而影响自身身份和利益，否则将难以长久维持国家的主权和自主。

“因为我们勇于梦想才取得今天的成就，我们不让任何人欺负或迎合其他国家的要求；许多国家曾尝试要我们这么做，但我们都抗拒。”

**相信中国很快超越美国成最大经济体  
刊第6页**

# S'pore must stay smart to profit in 'multi-polar world'

*Law and Home Affairs Minister K Shanmugam discusses the Republic's global opportunities*

**SINGAPORE** - The Republic can benefit from the many growth opportunities in Asia and continue to stay economically relevant if it is "ready and smar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not allow itself to be bullied or seduced by big powers, said Law and Home Affairs Minister K Shanmugam yesterday. "If we allow (this), that can break or severely stress our own domestic social-political compact on which modern Singapore rests," he said. "Once broken, it will b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ut together this compact again."

Mr Shanmugam was speaking at a forum on th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OBOR) initiative.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Singapore had recognised the potential of China's growth "very early", from the 1980s, and that it was an "active proponent" of that growth.

The Republic has supported the OBOR since the early years of its inception, recognising the benefits for Asia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Mr Shanmugam noted. It was also among the first few countries to support the China-backe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Reiterating that the OBOR in itself offers "tremendou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Mr Shanmugam said that Singapore is already benefiting from the initiative.

China's investments in Singapore alone make up about a third of its total investments in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OBOR initiative. Singapore's investments in China accounted for 85 per cent of total inbound investments from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With the new opportunities, we can, should be able to find ways of being economically relevant," he said.

Mr Shanmugam reiterated that it was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Singapore to have "as many good relationships as possible" in what he described as an "unfolding multi-polar world".

"Small states must continually

Small states that are intimidated or cajoled by bigger states into allowing their identity and interests to be defined by bigger states are not going to remain sovereign states for very long. They may retain a flag, a national anthem and a vote in the United Nations, but that is all. They will lose the autonomy to be themselves. The issue is existential.

**Mr K Shanmugam**  
LAW AND HOME AFFAIRS MINISTER



earn their releva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he stressed.

While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a hundred years from now, nothing is guaranteed for Singapore. He added: "The world can pass us by in an instant. The forgotten cities of the Silk Route are a salutary warning to us." As such, the Republic needs to keep improving and finding new ways to be of value to others.

"Singapore remain relevant in the future? We can. If we are smart," said Mr Shanmugam. "We should try to punch above our weight, rather than just to be seen as a 700 sq km rock in the southern tip of Peninsular Malaysia."

Adding that Singapore packs "quite a punch", Mr Shanmugam said the country has "good reasons to be optimistic", citing areas in which Singapore outperforms countries that are far larger, such 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size of foreign reserves and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While there will be fierce competition from its neighbours, Singapore must be nimble and "have the fore-

sight to make the necessary changes today for a better tomorrow", said Mr Shanmugam.

But he also urged Singapore not to be "easily rattled".

"Don't be complacent, take competitors very seriously, be paranoid, but don't be spooked by social media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that claim we are about to be surrounded and cut off," he said.

Mr Shanmugam reiterated that Singapore achieved its economic success "by thinking bold, thinking big", and it did not allow anyone to bully it or subject itself to the demands of other countries.

Describ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not unlike a jungle", he said: "Small states that are intimidated or cajoled by bigger states into allowing their identity and interests to be defined by bigger states are not going to remain sovereign states for very long. They may retain a flag, a national anthem and a vote in the United Nations, but that is all. They will lose the autonomy to be themselves. The issue is existential."

**\* COMMENT & ANALYSIS**  
**S'PORE WILL KEEP THINKING BIG, BEING BOLD, AND WON'T BE BULLIED** 23

## Harmonious collaboration key to success of OBOR: Shanmugam

RUMI HARDASMALANI  
rumih@mediacorp.com.sg

**SINGAPORE** - Call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OBOR) initiative the "most ambitious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history",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said the Asian giant has to work harmoniously with other countries for it to succeed.

"OBOR has the potential to bring Eurasia,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even closer together ... But the Chinese are not romantics with their heads in the clouds. They are practical, hard-headed. They know the Silk Route has historically been beset with conflict and violence. The risks are not insignificant," he said yesterday at the 2017 Asia Economic Forum at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e pointed out that Central Asia remains one of the toughest regions in the world, suffering from serious instability as a result of violence and wars.

"(In) Central Asia, the institutions in the countries are still developing.

Much depends on a leader, or a few leaders. If there is a change in leadership, then there could be changes in policy," he said.

He also noted that Russia has substantial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and that it is not a given that Russian and Chinese interests will always be aligned.

"Russia has the ability to impose its will, if it believes that its interests are affected.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are unlikely to want to choos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he said.

Meanwhile, India, Turkey and Iran also have key interests in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Mr Shanmugam added. "China will have to try and work with thes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try to align them. That is not going to be easy," he said.

Moreover, as China engages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and Japan, which have been less than enthusiastic about OBOR, aligning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working with them will be much tougher than building the infrastructure. "It is good for China to be respected, liked and trusted ...

It's in China's interest — and ours too — that its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or even superpower status, is peaceful, and be seen as peaceful," he said.

Saying that criticism of China has been skewed, Mr Shanmugam pointed out that the country has lifted 7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within three decades, a feat unparalleled in history. On criticism that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does not allow innovation, he said Beijing has been showing its detractors are getting it wrong.

He said China has shown it can move up the tech value chain quickly, and also cited the example of IT giant Huawei, which makes world-lead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However, Mr Shanmugam warned that OBOR will be undermined if the world turns protectionist or if there is a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a globalised world, countries trade with many partners. And for many Asian countries, while China is the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the ultimate consumer of most of the traded products is still the US.

"The products go as intermediate

products to China, and the finished products go from China to the US. This will likely remain so for some time," he said.

"Thus, for OBOR to succeed, you need the globalised economy to function. There must be no trade wa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re must be continued growth, peace and stability," he added.

If China plays it right and successfully conveys that it has benign intentions, the opportunity is tremendous through the OBOR and other initiatives like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to "build a new economic architecture that can uplift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hemisphere," said Mr Shanmugam.

Launch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3, OBOR is aimed at connecting China with Europe,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parts of Africa via roads, railway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It is expected to creat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orth US\$4 trillion across 60 countries, of which about US\$50 billion has already been invested.

# S'pore in 'a position to benefit' from Belt and Road push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speaking at the 2017 Asia Economic Forum at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yesterday. ST PHOTO: SEAH KWANG PENG

Its edge includes good governance, educated workforce, financial centre and port, says Shanmugam

**Elgin Toh**

Having recognised early the benefits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push, Singapore has actively supported it and is well-positioned to make gains from it,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said in a lecture yesterday.

Singapore's edge lies in its good governance, the rule of law, its educated workforce and its respected financial centre and port, he said.

Singapore has also been an "active proponent" of China's growth since its opening-up, and was an early supporter of the China-le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which funds Belt and Road projects.

One Belt, One Road - unveil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3 - seeks to enhance links between Asia, Europe and Africa by building roads, railway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in a network of projects covering more than 60 countries.

Describing it as a "game changer" that is bold, innovative and ambitious, Mr Shanmugam said: "If connectivity improves, people travel, investment flows increase, we will benefit if we are ready and smart."

He cited figures that showed Singapore is already benefiting: 30 per cen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vestments in all countries are in Singapore. In return, Singapore's investments in China account for 85 per cent of total Belt and Road invest-

ments there by all countries.

Mr Shanmugam's speech, at an Asia Competitiveness Institute forum, wa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remarks by Singapore's leaders in support of China's bid to recreate the Silk Road.

The Republic was one of thre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ose heads of government did not attend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in Beijing in May, causing some to raise questions about bilateral ties.

But observers say relations are on an even keel, with a June announcement that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will be visiting Singapore.

In a wide-ranging speech, Mr Shanmugam also plac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context of shifting geopolitics. China, said the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was likely to continue its rise as a superpower, despite domestic problems like corruption and an ageing population. And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gone into actual decline,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will change.

One Belt, One Road, a result of China's rise, may well accelerate that rise, he said, noting that China is already the largest trading nation in the world. China is also able to translate plans into reality, given its resources, its ability to muster the nation's will towards a clear goal, and its great leap forward i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he added.

China's strategic investments abroad have at times created tensions, but they have also helped forge strong ties and are likely to "pre-dispose many countries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contrast, the US has in recent times defined its interests more nar-

rowly, wavering on once fundamental issues like free trade, he noted.

Mr Shanmugam said the shift is understandable, since the US has hitherto been bearing a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security costs. But if it continues, "more countries may fi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be more attractive".

For China, the initiative is not without risks, he said, as the Silk Road passes through Central Asia, a very "tough" region where other powers - Russia, India, Turkey and Iran - have their own interests.

A key to China's success is to convey benign intentions and to foster trust by working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he added.

In this unfolding situation, Singapore's interest is in developing good relations with as many countries as possible and in latching on to One Belt, One Road and other growth opportunities, he said.

"The world can pass us by in an instant... We need to keep... finding new ways to add value," he said.

Singapore has to work hard to meet competition that will arise, such as from neighbouring ports built to challenge Singapore's ports, he said.

As a small state, Singapore is a price-taker. But if it gives in to bigger states, it will lose its sovereignty.

Said Mr Shanmugam: "If we allow ourselves to be bullied or seduced by bigger powers, that can break or severely stress our own domestic social compact, which is built on multiracialism. Once broken, it will b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ut together this compact again."

elgintoh@sph.com.sg

## Think-tanks 'may disagree with Govt but not under a foreign state's influence'

Think-tanks may sometimes disagree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they must not do s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foreign country,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said yesterday.

While such institu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 to explore issues civil servants may not be able to - they must maintain an independence stance.

"Objectivity is critical," he said at a forum at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His remarks came shortly after an academic was rapped for working with a foreign government to influence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Dr Huang Jing, 60, who was from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had his permanent residency cancelled this month after the Home Affairs Ministry labelled him "an agent of a foreign country".

While Mr Shanmugam did not refer to a specific case, he said it is unacceptable for academics to be "suborned" and to project the views of a foreign country "under the guise of objectivity and academic freedom", with a hidden agenda of influencing Singapore's policies.

He said academics do so either because they are "working with foreign intelligence" or because they are "seduced by them".

He was responding to a question about the role of think-tanks and businessmen in foreign relations.

Mr Shanmugam said the late

deputy prime minister Goh Keng Swee set up think-tanks here to provide fresh perspectives and to prevent groupthink.

Dr Goh envisioned think-tanks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s views at times and being knowledgeable, objective and clear.

"Dr Goh would certainly turn in his grave if he thinks that the think-tanks he set up or was responsible for have become instruments of influence for other countries," he said.

He added that think-tanks could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 not "for the sake of challenging", but "wher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e challenged". Academics ought to be "real scholars and... put forward scholarly viewpoints, but practical ones, that help the country".

Turning to businessmen, he said they play a key role in expanding Singapore'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in building goo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which helps Singapore's foreign relations.

But both businessmen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understand where the line is drawn".

"Sometimes, the Government cannot take the advice of businessmen... because businessmen will carry a business perspective, but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arger, countrywide perspective as a sovereign state," he said.

Elgin Toh



VIDEO  
Shanmugam: Singapore well-positioned to make gains. str.sg/4HSv

## Firms urged to 'act fast to secure first-mover advantage'

**Chia Yan Min**  
Economics Correspondent

Singapore companies keen to tap opportunities i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must act fast to secure our first-mover advantage", said Mr Liew Mun Leong, the chairman of Changi Airport Group and Sarhana Jurong Group.

While the projects on offer might

be too huge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to take on alone, Singapore firms can come together to form consortiums, the former CapitaLand chief executive added.

Mr Liew was speaking yesterday at this year's Asia Economic Forum, co-organised by the World Bank Group and the Asia Competitiveness Institute at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LKYSPP) at the Na-

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forum focused on th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which calls for massive development of trade routes and infrastructure across 60 countries, mainly in Asia and Europe.

Mr Liew, who is provost's chair and practice professor at LKYSPP, said the BRI could be the sole remaining locomotive propelling

global growth in the coming years as other efforts to lift trade, such a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have run into roadblocks.

Besides infrastructure, there will also be opportunities for Singapore firms to provide services in BRI countries - including in development consultancy, IT, logistic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he noted. "We must be prepared to enter into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Mr Liew Mun Leong said Singapore SMEs can form consortiums to take on bigger Belt and Road projects.

BRI market demand," he said.

SMEs can also tap these opportunities, said Mr Liew.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 fact is that many of these are mega projects, which can be handled only by big developers... But small companies can join a con-

sortium to participate," he said.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about dealing with po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 when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Mr Liew said his approach is to make sure business partners understand that "under the table" deals are out of the question.

"For a company going to China, it is not sustainable to pay bribes if you want to be there for the long term. You will get caught, they will get caught," said Mr Liew, who has been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chiaym@sph.com.sg

## Think-tanks useful for policymaking, but must be objective: Shanmugam

RUMI HARDASMALANI  
rumih@mediacorp.com.sg

**SINGAPORE** – Think-tank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policymaking as they put forward “practical viewpoints that help the country”.

But while they may disagree with the Government, they ought to do so “objectively” and not “for the sake of challenging” or b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said yesterday.

Mr Shanmugam was speaking dur-

ing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at the Asia Economic Forum, organised by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LKYSPP).

Think-tanks cannot be projecting views of a foreign countries “under the guise of objectivity and academic freedom”, Mr Shanmugam said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on the role of think-tanks and businessmen in managing foreign relations.

Recently, LKYSPP academic Huang Jing, who is a United States-China expert, was identified by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as an “agent

of influence of a foreign country”.

The permanent residency status of Prof Huang and his wife, Ms Shirley Yang Xiuping, were revoked, and their appeals were recently rejected. They will be permanently banned from re-entering Singapore.

Without referring to the case yesterday, Mr Shanmugam stressed that projecting views of foreign countries “under the guise of objectivity and academic freedom” is unacceptable.

Noting the role of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Goh Keng Swee in the setting up of think-tanks in Singapore, he said: “Dr Goh would certainly turn in his grave if he (knows) that the think-tanks he set up have become instruments of influence for other countries.

“Dr Goh saw the think-tank’s role as being very knowledgeable, objective,

clear, and putting those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which means not necessarily agreeing with the Government.”

On the role of businessmen, Mr Shanmugam said they play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erms of engaging communities and growing Singapore’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part from forging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nd creating the fundamentals for the country’s success.

He added: “At the same time, both business and the Government need to understand where the line is to be drawn.

“Sometimes, the Government cannot take the advice of businesses. It has to decide what is in the nation’s interest. Businessmen will carry a business perspective, but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arger perspective as a sovereign state.”



**BUSINESS  
S'PORE MUST  
STAY SMART  
TO PROFIT IN  
'MULTI-POLAR  
WORLD' 14**

news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explains crucial role of think-tanks in S'pore

# Think-tanks must be objective: Shanmugam

ELGIN TOH, THE STRAITS TIMES

Think-tanks may disagree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they must not do s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foreign country,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said yesterday.

While such institu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 to explore issues civil servants may not be able to – they must maintain an independent stance.

“Objectivity is critical,” he said at a forum by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His remarks come shortly after an academic was rapped for working with a foreign government to influence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Dr Huang Jing, 60, who was from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had his permanent residency cancelled this month after the Home Affairs Ministry labelled him “an agent of a foreign country”.

While Mr Shanmugam did not refer to a specific case, he said it was unacceptable for academics to be “suborned” and to project views of a foreign country “under the guise of objectivity and academic freedom”, with a hidden agenda of influencing Singapore’s policies.

He said academics do so because they are “working with foreign intelligence” or because they are “seduced by them”.

He was responding to a question about the role of think-tanks and businessmen in foreign relations.

Mr Shanmugam said the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was responding to a question at a forum by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PHOTO: THE STRAITS TIMES

late deputy prime minister Goh Keng Swee set up think-tanks to provide fresh perspectives and prevent groupthink.

Dr Goh pictured think-tanks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s views at times and being knowledgeable, objective and clear.

“Dr Goh would certainly turn in his grave if he thinks that the think-tanks he set up or was responsible for have become instruments of influence for other countries,” he said.

He added that think-tanks should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wher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e challenged”.

Academics ought to be “real scholars and put forward (not just) scholarly viewpoints, but

practical ones, that help the country”.

Turning to businessmen, he said they played a key role in expanding Singapore’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in building goo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which helps Singapore’s foreign relations.

But both businessmen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understand where the line is drawn”, and the Government cannot take the advice of businessmen due to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elgintoh@sph.com.sg](mailto:elgintoh@sph.com.sg)

FOR MORE, READ THE STRAITS TIMES TODAY

## ASEAN/East Asia

Home > News > ASEAN/East Asia

Tuesday, 29 August 2017

# Singapore hails Belt and Road

SINGAPORE: Having recognised early on the benefit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ingapore has actively supported it and is well-positioned to make gains from it,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said.

"Singapor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lies partly in the fact that it is well-governed, upholds the rule of law, has a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 and is a respected financial centre and port," he said.

Singapore has also been an "active proponent" of China's growth since the opening up of the country in 1978, and was among the earliest supporters of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which will fund project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eeks to enhance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parts of Africa by building roads, railway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First unveil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3, China's plan is expected to bring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to over 60 countr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fers tremendou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f connectivity improves, people travel, investment flows increase, we will benefit if we are ready and smart," said Shanmugam, who is a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Calling China's initiative a game changer and "the most ambitious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history", Shanmugam noted

9/4/2017

Singapore hails Belt and Road - ASEAN/East Asia | The Star Online

figures that showed Singapore was already benefiting significantly from it.

"For example, one-third of China's total Belt and Road-related investments in all countries is in Singapore. In return, Singapore's investments in China account for 85% of the total Belt and Road investments made by all countries there," he said.

Shanmugam was speaking yesterday at a forum organised by the Asia Competitiveness Institute, which is part of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His speech wa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remarks from Singapore's leaders in support of what has been called China's bid to recreate the Silk Road.

Singapore was one of thre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ose heads of government did not attend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in Beijing in May this year, causing some to raise questions about bilateral ties.

But observers sa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on an even keel,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in June that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has accepted an invitation to visit Singapore.  
— The Straits Times/Asia News Network

## S'pore well-positioned to reap gains in Belt & Road: Shanmugam

Singapore

HAVING recognised early on the benefits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Singapore has actively supported it and is well-positioned to make gains from it, Home Affairs and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said in a lecture this morning.

Singapor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lies partly in the fact that it is well-governed, upholds the rule of law, has a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 and is a respected financial centre and port, he said.

Singapore has also been an "active proponent" of China's growth since the opening up of the country in 1978, and was among the earliest supporters of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which will fund projects under One Belt, One Roa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fers tremendou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f connectivity improves, people travel, investment flows increase, we will benefit if we are ready and smart," said Mr Shanmugam, who was a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Calling China's initiative a game changer and "the most ambitious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history", Mr Shanmugam noted figures that showed Singapore was already benefiting significantly from One Belt, One Road.

For example, one-third of China's total "Belt and Road" related investments in all countries is in Singapore. In return, Singapore's investments in China account for 85 per cent of the total "Belt and Road" investments made by all countries there.

One Belt, One Road is expected to bring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to over 60 countries.

Mr Shanmugam was speaking at a forum organised by the Asia Competitiveness Institute, which is part of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His speech wa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remarks from Singapore's leaders in support of what has been called China's bid to recreate the Silk Road.

Singapore was one of thre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ose heads of government did not attend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in Beijing in May this year, causing some to raise questions about bilateral ties.

But observers sa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on an even keel,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in June that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had accepted an invitation to visit Singapore.

In a wide-ranging speech on Monday that also dwelled on geopolitics, Mr Shanmugam sought to place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 the context of US-China rivalry and the shifting power balance in the world.

China, he said, was likely to con-



Mr Shanmugam: "If connectivity improves, people travel, investment flows increase, we will benefit if we are ready and smart."

tinue its rise as a superpower, despite domestic problems it is grappling with such as corruption and an ageing population. And while the US has not gone into actual decline,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will change.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s a result of China's rise, and may well accelerate its rise, he said, noting that China was already the largest trading nation in the world.

Mr Shanmugam praised One Belt, One Road as a "bold, innovative and ambitious" project. It is roo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at a time when the centre of gravity of world trade was in China and India.

China furthermore is able to translate One Belt, One Road into reality, given its resources, its centralised political system that is able to muster the nation's will towards a clear goal, and its great leap forward i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he said, noting in particular its advancements in telecommunications, quantum satellites, high speed rail and rail in permafrost conditions.

China's strategic investments abroad have at times created tensions, but they have also helped forge strong relationships and are likely to, on the whole, "predispose many countries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e noted.

In contrast, the US has in recent times defined its interests more narrowly and taken an "America First" approach, he observed. The US has of late "wondered aloud" on positions once considered fundamental, such as its commitment to free trade.

Mr Shanmugam said that some of these moves are understandable, since the US has been bearing a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costs – includ-

ing security costs. "If there continues to be a perception that the US is withdrawing or reducing its global footprint... and if the US continues with anti-trade rhetoric, removes itself from trade agreements, targets countries with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re are tariff wars, then more countries may fi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be more attractive," he said.

For China, One Belt, One Road is not without its risks, noted Mr Shanmugam. The Silk Road passes through Central Asia, one of the toughest regions of the world, where other powers – including Russia, India, Turkey and Iran – have their own interests, which may not be aligned with China's. Enhanced connections can also be used by traders as well as terrorists.

Infrastructure also does not create its own supply and demand, it merely facilitates them – and so, if there is a trade war, the trade routes that One Belt, One Road seeks to build up will be affected, he said.

A key to the success of One Belt, One Road is for China to convey "benign intentions" and to work harmoniously with other countries with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and receive their trust and support, he said.

In this overall unfolding situation, Singapore's interest is in developing good relations with as many countries as possible, including China and the US, and in latching on to One Belt, One Road and other growth opportunities, said Mr Shanmugam.

He said the "forgotten cities" along the once-prosperous Silk Road are a stark warning to Singapore that nothing can be taken for granted. "The world can pass us by in an instant... We need to keep improving, we need to keep reinventing and finding new ways to add value," he said.

Singapore will have to work hard to meet the fierce competition that will arise, including the ports that its neighbours are building to challenge Singapore's, he said.

As a small state, Singapore also has to tread a fine bal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said.

On the one hand, Singapore is too small to influence overall trends – it is an observer and a price-taker. "So we observe, we say things clearly, when our own interests are affected, and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wisdom,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small states that are "intimidated or cajoled by bigger states" will soon lose their sovereignty and autonomy.

"The issue is existential. If we allow ourselves to be bullied or seduced by bigger powers, that can break or severely stress our own domestic social compact, which is built on multiracialism. Once broken, it will b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ut together this compact again," he said. THE STRAITS TIMES

Lee Hsien Loong

Like Follow Share ...



**Lee Hsien Loong**  
@leehsienloong

Home  
About  
Videos  
Photos  
Posts  
Notes  
House Rules  
Community

Create a Page

**Lee Hsien Loong**  
31 August at 18:02

Minister K Shanmugam Sc gave a good speech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OBOR) initiative, and what it offers Singapore, at the 2017 Asia Economic Forum.

The OBOR is a bold vision to link countries across Europe and Asia together, recreating a modern day Silk Route, and engaging China with the world. If successful, it will bring prosperity to many countries – especially in ASEAN. Singapore stands to benefit greatly, as the OBOR means better connectivity in our region, and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us.

We must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OBOR. As Minister Shanmugam pointed out, we may be small, but by thinking boldly and acting swiftly, and not being complacent, we can keep our place in the sun.

You can read the transcript of the speech here: <http://bit.ly/2xxiWZw>

– LHL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一带一路倡议：效果与影响”亚洲经济论坛上，重申新加坡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大胆和创新的愿景。这项倡议能拉近亚细安和中国和欧亚的关系。– 李显龙



**Singapore in 'a position to benefit' from Belt and Road push**

Having recognised early the benefits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OBOR) push, Singapore has actively supported it and is well-positioned to make gains from it...

STRAITSTIMES.COM

Like Comment Share

9/18/2017

Q n A session at Asia Economic Forum on "The 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beltandroaden)

## Q N A Session At Asia Economic Forum On "The 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31/8/2017 Thur



Mr K Shanmugam(L),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and Minister for Law taking questions at Asia Economic Forum on "The 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28 Aug 2017 . PHOTO: LIANHE ZAOBAO

Question & Answer Session with Mr K Shanmugam,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and Minister for Law at the 2017 Asia Economic Forum on "The 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NUS, 28 August 2017

(1) Singapore & China

Q: You mentioned a lot of Belt-and-Road investment from China was flowing into Singapore. Obviously, Singapore is a very successful financial centre. To what extent do you think that investment will be retained in Singapore? Or do you think that Singapore is more like a hub for investment to flow into the wider ASEAN region? Secondly, do you have any examples of successful China-Singapore partnerships 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Do you expect that the Singapore-KL rail project might be one?

A: I'll respond to your third question, first. On the High Speed Railway, we have made it clear,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has also made it clear, that it will go for an open tender. The matrices, the framework for that tender will be set out.

As for your other two questions - my main response is that Singapore has had a number of G to G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http://beltandroad.zaobao.com/beltandroaden/spotlight/story20170831-791374>

1/12

9/18/2017

Q n A session at Asia Economic Forum on "The 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For instance - Suzhou of course, everyone knows. I'm not sure if you'd call it infrastructure, but it includes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associated facilities; trying to replicate in China a part of Singapore which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It has been a sort of a leader for others to come through.

We have got the Tianjin Eco-city project.

And of course now, specific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logistics cooperation based on Western China (regarding which,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a number of opportunities).

But in addition to these sorts of high signature projects, the reality is that there is so much money that has got to be spent in this region, upgrading the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And if trade is going to increase as a result - all of these are "ifs" - then we are in a very good position to benefit from that. We've got the best port, the most efficient port, we've got a great financial system, we've got rule of law, we've got a system that people across Asia and across the world trust.

So I don't see any reason why you should not benefit from this. I think the likelihood is that it will significantly benefit us.

2

Q: If we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ill ou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deteriorate?

A: During the Cold War, we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nd we traded with the Soviet Union. If the Soviet Union was a more effective trading partner, we would have done more.

As Dr. Goh Keng Swee used to make clear, our trade has no ideology - we trade with everyone.

For a small country, I think that has got to be the approach. Other countries can argue with each other, but for us,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e can't afford to take sides.

We do business with everyone who will do business with us.

(2) China and the West

Q: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estern media's approach towards China?

A: The official ideology in the West is that the media is the "Fourth Estate". It's independent, they don't stoop or bend their public policies because of money, and so on.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look at China, China makes clear what it views as acceptable reporting in journalism.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riticism of China; some of it I think is skewed and unbalanced, as I said in my speech. But you also see for example Bloomberg, whose Chairman said in 2014 -I'm paraphrasing this, these are not his exact words - that perhaps they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in their coverage of China. They ran a series of articles, but they also provide these terminals which are very, very lucrative for them in China, which are used by the traders and banks and so on. And they knew that that their financial bottom line was at risk. And so he said that they should have focused more on economic issues and been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they wrote.

More recently, a few weeks ago, you heard the kerfuffle ov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ere they took out 300 odd articles on human rights and Tibet and so on. There was an uproar, and they reversed that decision.

If you look at Australia, I think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or some other Australian newspaper now regularly carries a "China Watch". I'm sure there's a financial tie up.

9/18/2017

Q n A session at Asia Economic Forum on "The 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In the end, China is big, China offers hug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So I think it expose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he ideology that the Western media puts up, and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Q

3

Q: Under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America's government, and how effective is it in delivering governance?

A: I think on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by first asking: (1) What do you mean by governance; and (2) What are the end points you want.

If the end point is that there should be unqualified "rights" – such as the right to vot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he right to say what you like (which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hough I believe there has got to be a framework within which it should be exercised), the right to carry guns, the right to burn the flag, the right to engage in nasty sloganism, the right to do what you like

– there is a broad range, and you can do all of that in the US.

But you can go further and ask: does governance mean also the state actively improving people's lives through education, uplifting people, increasing national power through focusing on its resources?

If you ask the second question and you're not ideological about it, I think you would say that, overall, for the last two hundred odd years, the American system has done very well. It is the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But at various periods, it has suffered crisis and inability of it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o mediate between the competing interests. You had the major civil war in 1860s, you had a variety of civil rights movements, you had America turning isolationist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turning inward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So it's gone through ups and downs, most times the system works well, sometimes the system doesn't work so well.

If you look at it right now, serious questions are being asked, of the system that was set up in the 18th century when 15% or so of the people had the franchise of voting – to vote, you had to be white, you had to be male, you had to own land. So whoever came into power was essentially from the same class and similar outlook, and there was a long period of stability. I am generalising, but broadly I think my point holds.

Today, questions are being asked because of the deep cleavages, and the deep divides along cultural lines, along racial lines, along economic lines,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etc. You have these questions being raised. Such qu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in the past. Where it will go from here, if you ask me, looking at it today, I don't know. America has bounced back many times in the past.

Seasoned observers think that some updating of its political system is necessary, if America is to mediate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mpeting interests to bring about a betterment in its people's lives. People who are better off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but what about the ordinary person? Issues like the schooling system, the opioid crisis raise challenging questions.

4

Q: All along, many people have taken for granted that the Western capitalist, democratic system is a preferred one. But you mentioned that China has been growing so fast in the past 30 years. Are you suggesting that the Chinese system is the preferred one, and is it especially releva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are at a very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A: I will put it this way - actually,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in some essential sense.

Take the US. The period of its rapid growth, from the time it got independent to the civil war a 100 years later, through to the time it became a superpower - f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at period, the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as I explained just now, who had the franchise?

About 10-15% of the population. They were very similar in their outlook,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franchise. And whether you had one or the other party in power, the approach was broadly similar and there was stability to the macro policies.

Now, these are generalisations. Of course there were differences, of course there were changes, and of course there were arguments – including the one which resulted in a civil war and lots of bloodshed.

9/18/2017

Q n A session at Asia Economic Forum on "The 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But in a sense, there was a broad agreement on what major policies should be. So you can argue that in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what a country needs and w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ought to deliver, is stability and the ability which then gives its leaders the possibility of thinking 20 or 30 years and putting in policies and driving the changes: education, female empowerment, growth, economic opportunities, levelling up.

If you look at the UK, you can make the same argument about the franchise - it was very narrow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t was very stable for the period, but it grew. Countries go through phases.

China's model of development follows more the path that was taken by Taiwan, South Korea.

A strong central state imposing its will, thinking long term, bringing together all the resources, and projecting forward.

You could, I think, reasonably argue, that any other system would not have seen China progress so rapidly, but then again, you can have ideological arguments about progress, which is why I said if you say the right to vote and the right to say what you lik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ay the education of a child, healthcare, access to material benefits, opportunities, you are entitled to that view, and then China's system does not deliver that.

But if you believe that educating children, developing the infrastructure, creating a better life for your people is the key goal of governance, then China's system delivers it. I think China's system delivers it today, but as the people get educated, as the people become wealthier, then the political system would have to adapt to that.

5

Q: To what extent do you actually think China is a competitor of the US?

A: Well I think it will be fairly clear from my speech. There is competition, obviously, and the competition will be on all fronts. Our hope is that the competition will take place within a framework of peace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lobal order.

America has had competitors before. If you look at the post Second World War period, of course the old Soviet Union was a huge competitor. The Soviet Union was a military competitor not an economic competitor.

And then you have Japan. I think some of you would remember books like "Japan as No. 1" and so on. But I think, realistically, given the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 don't think Japan could ever have been a competitor across all matrices. But Japan in any event was an economic competitor - it was not a military competitor.

If you take China, it is both a military and economic competitor, and its population is four times as large. This is why I think I drew some of the conclusions that I have, and we just have to look at the recent history. Now, you don't therefore say that the recent history will continue unbroken; there will be stumbles along the way. But I think the secular trend is quite clear.

### (3) Other Questions

Q: All countries face the reality of competition, especially smaller countr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see the need to cooperate. How do you balance this tension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for all countries?

A: Competition is a fact of life. Countries act in their best interests. They cooperate when they need to. There is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coopera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competition.

For instance, we compete as a port with many other ports, but we also have great cooperation with them, including ou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So the reality is to just accept that people will want to take your lunch, but nobody will want to give you your lunch.

Particularly since, as I often say, there are three ways in which you make money: You either take something from the ground, or you grow something on the ground, or you go and trade with others who take something from the ground.

9/18/2017

Q n A session at Asia Economic Forum on "The 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We don't take anything from under the ground and sell, we don't grow anything and sell, so we have to be the service provider to others who grow their own things and dig their own oil.

Of course, they will ask themselves, "Why should I not be making this money? Why should I let Singapore make this money?" The only way we can make the money, given how small we are, is to keep the size of our economy going, and we have a \$300 billion economy based on a 3 million citizen population. To keep that going, you just need to run faster, be smarter and continuously be relevant.

If you're not relevant, others will take your lunch. This is simply a fact of life. One of my favourite books in this context is "Who Moved My Cheese?" If you think your income and your economy is going to prosper by you doing the same things that you've grown fat on, you will starve to death.

Q: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and business people in forging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A: The reason why Singapore has got so many successful think tanks is Dr. Goh Keng Swee.

Dr. Goh was a visionary. Many good things in Singapore were due to his long range thinking.

Dr. Goh felt that if you just take the government and ministry officials' thinking about economic policy, foreign policy issues, you will eventually get a reversion to some type of "group think". And you needed active, good think tanks which will be out there giving valuable input to the government.

And so he saw the think tanks' role as being very knowledgeable, being very objective, being very clear and putting those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which means not necessarily agreeing with the government in everything. If they simply agree with the government, unthinkingly, then the role of a think tank is useless.

But I think Dr. Goh would turn in his grave if he felt think-tanks had become places where – I mean, objectivity is critical – people are suborned, and they promote to you, under the guise of objectivity and academic freedom, the viewpoints of a foreign country in order to influence your policies.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acceptable to Dr. Goh, and that will certainly not be acceptable to us. And you can be suborned either because you're working with foreign intelligence or you can be seduced by them.

Another type of lack of objectivity would of course be if you have a political agenda and you lose your objectivity, and project your political arguments under the guise of academic scholarship.

The key is not whether you disagree or you agree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the key is whether you're objective in doing so or whether you have another reason for promoting that position.

So think tanks have a critical role in presenting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 alternate perspective.

If you look at the think tanks that Dr. Goh was instrumental for, like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ey play the role of helping to understand our region much better because think tanks can go about and say things, explore, and can put forward an additional set of views. That is useful. So that's what I think is the critical role that think tanks should play - to be very alert, to be real scholars and to put forward scholarly viewpoints which are practical, which would help the country. As I have said, that doesn't mean agreeing with the government on everything; it means even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 objectively when the government's viewpoints have to be challenged, or anybody's viewpoints, where they have to be challenged.

Businessmen, I think play a very,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erms of engaging other countries.

They expand our GNP by investing, they are forging relationships, they are creating the fundamentals for our success. Without an economy, what will we be? So they are critical.

Bu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again let me go back to Dr. Goh. He said, "Our businessme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work, have numerous dealings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their countries. They have to obtain licenses, concessions, contracts, permits. Thus the Singapore businessman, in the eyes of these governments, performs the role of supplicants for favours.

9/18/2017

Q n A session at Asia Economic Forum on "The One-Belt One-Road Initiativ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As our businessmen often compete in their supplications, the image that this creates of Singapore can well be imagined." He was talking about a regional country. Q

He continued, "It is not unnatural I suppose for these governments to expect tha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to behave in like manner. Businessmen have never hesitated to give me free advice on how to conduct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periodic grouse we have had with our neighbours. Unfortunately, they do not understand – and I'm afraid they cannot understand – that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relations betwee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s cannot be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supplicant and overlord. The methods they found wer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are not available to us in government."

So what we need is an understanding: businessmen have a huge rol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conomy, very important in forging good relationships. And of course, foreign affairs and relationships prosper if there are good economic relations.

But one has got to understand where the line should be drawn. The government has to act in Singapore's best interests. Sometimes, this will mean departing from the advice of business people. The businessman will have his business perspective. But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arger, country-wide perspective as a sovereign state.

<http://beltandroad.zaobao.com/beltandroaden/spotlight/story20170831-791374>

6/12

# 早 言 论

ZBOpinion

伍逸松 新加坡报业控股执行总裁  
陈康威 新加坡报业控股副执行长  
李慧玲 华文媒体集团主管  
leehe@sph.com.sg

吴新迪 总编辑  
gohnd@sph.com.sg  
韩咏梅 副总编辑/数码总编辑  
harym@sph.com.sg  
王彼得 副总编辑  
ongp@sph.com.sg  
吴新慧 副总编辑  
gohshe@sph.com.sg  
杨瑞锋 执行编辑  
yeohsf@sph.com.sg

谭德婷 采访主任  
tannd@sph.com.sg  
叶鹏飞 言论主任  
yepf@sph.com.sg  
林传美 国际新闻主任  
limcb@sph.com.sg  
韩咏虹 中国新闻/早报网(中国)主任  
haryh@sph.com.sg  
宋以彬 体育新闻主任  
songyb@sph.com.sg

郭丽娟 财经新闻主任  
quekik@sph.com.sg  
郭惠清 编辑主任  
queism@sph.com.sg  
胡文雁 副刊主任  
woonm@sph.com.sg  
李天钧 摄影主任  
leetk@sph.com.sg  
陈聪明 美术主任  
tanob@sph.com.sg

联络电邮  
《言论》版欢迎读者来信。  
来稿时请随同信件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英文通讯地址以及电话号码。  
电邮: zbyanlun@sph.com.sg  
传真: 6319-8118

审时度势 尚穆根

## “一带一路”理念须集体来实现

我们先探讨地缘政治的大趋势。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因这些大趋势而形成的，它也会给大趋势带来影响。

第一个趋势是中国的崛起。如果以绝对值而言，中国很可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如果考虑经济、技术和人口的综合指标，就可以得出个结论：中国成为超级强国的目标指日可待。

第二个趋势是，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实力将会无可避免地出现变化。

我并不是说美国正在走向衰落。这是相对实力的问题，两国的相对性已经出现变化，并且还会继续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单方面行动的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尤其是在中国强烈关注的地区。

中国崛起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的利益，必须找到两国和平共处的方式。

我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会加速推动我之前所提到的地缘政治大趋势。

容我列举会影响趋势的三项发展。

一、中国通过投资战略，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和关系。综观世界各地——亚洲、非洲，甚至南美洲，不难发现中国企业正不断拓展版图。这些企业投下数十亿的资金，愿意承担风险，投资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体系都不一样。他们的国家领袖也无法做出和中国一样的长期承诺。

二、中国有能力聚集资源并能够坚定地朝目标迈进。中国拥有一套中央体系，让它能聚集所需资源，集中精力，坚持不懈地达成所设下的目标。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体系一切都好或样样都行之有效。例如，贪污在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团队正在积极地处理这个问题。

三、美国的外交政策。二战后，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是，维持世界和平和秩序，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现在有舆论提出，美国应该更狭隘地定义其国家利益，采取“美国优先”政策。

这一观念的转变，可从备受尊敬的军事战略家麦克马斯特中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一番话看出。

他谨慎指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并非“美国独行”（America Alone）。但这确实表示美国现在的立场已有改变，美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已有别于从前。

每一个国家都会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当美国重新审视自己的利益，改变想法时，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世界各国。

现任美国政府会重新评估国家立场，因为他们需要兑现对选民的承诺。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旦现任美国政府的政策逐渐明朗，届时，美国若仍然让其他国家感觉到它选择脱离国际舞台，或减少自己在

中国必须认识到，基于其面积、重要性和影响力，它的行为将对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措施去向其他国家保证，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并且积极同其他国家交流。

国际上的影响力，就可能进一步推动我先前所谈到的地缘政治大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有潜力拉近欧亚大陆、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通过海陆渠道来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

中亚大陆是一片不容易发展的土地，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发展的地区。这个地区也一直处在极其动荡不安中。

“一带一路”的跨区域对接能带动贸易的往来，不过也能促使极端分子更容易交流，散播圣战思想。这是把双刃剑。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些地区不一定会取得预期的成效。除此之外，中亚大陆还存在着其他相关风险。

首先，中亚各国的政治体系还有欠完善。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立场和支持更多取决于某个领导人或领导队伍的意见。领导层一旦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的政策也可能会改变。

其次，中亚大陆对俄罗斯来说存在着显著的利益。在“一带一路”倡议这方面，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不一定吻合。若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俄罗斯是有可能将自身的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中亚各国将不愿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被逼做出选择。

第三，印度在中亚区域也有其关键的利益，而他们也决心去捍卫并推进这些利益。

第四，其他国家，如土耳其和伊朗等，在中亚区域也有自身的利益，而他们也决心去推进这些利益。

中国必须尝试与各个利益方合作，协调利益，达成互惠。这不容易办到。相较之下，建造基础设施就比较容易办成。

除了在中亚大陆面对的挑战，中国也必须去争取那些对“一带一路”倡议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的支持，如印度和日本。

作为成功的大国，中国必须认识到，基于其面积、重要性和影响力，它的行为将对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措施去向其他国家保证，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并且积极同其他国家交流。

我们希望中国能得到各国的尊重、喜爱与信任，这对大家都好，因为大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一旦出现信任赤字，本区域就会出现对立集团；印度、日本等国，可能与亚洲以外的国家组织起来，形成对立集团。

美国在本区域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美国将继续以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科技实力，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我们千万不能轻视美国。

我们并不希望看到任何集团或对立集

团的形式，这是不利的；不管是对中国或其他国家，或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现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特立独行，包括中国在内。

第五，基本上，“一带一路”倡议不能取代目前的国际秩序。目前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如果全球各国都采取保护主义，这必将影响此倡议。而如果中美展开贸易战，此倡议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要完全发挥功效，取得最大成功，国际贸易和全球化趋势就必须持续，全球化经济模式也要继续操作。这意味着，中美不能发生贸易战。全球经济需要持续增长、和平及稳定。这些都是此倡议取得成功的一些必要元素，也包括其他元素。

这些道理相信中国都知道。

新加坡是个小国，无法影响或参与这些对立组合。我们是观察者，常常只能接受各种情况。所以我们要观察，如果国家利益受到影响，我们就把话说清楚，希望大家展现智慧，保持和平稳定。

“一带一路”倡议一旦成功落实，必将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论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印度和日本已经列入世界十大经济体，亚细安作为单一的经济体也名列前茅。“一带一路”倡议将把世界经济的重心锁定于亚洲，而中国会是这个重心的中心。

但前提是，亚洲的各大经济体互相合作，没有贸易战，没有对立的联盟。

我们应该会看到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多级。美国、欧洲、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是不会在亚洲或其他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消失。

同时，我们也很很难想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取代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包括中国。而且，美国在数个区域仍会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虽然，我们很难预测，这样一个多级化的世界会多稳定，但是一个稳定的世界符合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所以它们必将确保世界维持稳定。

最后，这一切对新加坡来说有何意义？我们从一开始就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且认识到倡议将有利于亚洲和亚细安，也能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此外，我们也意识到亚投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所以成为首批支持亚投行成立的国家之一。

亚洲充满着机遇，除了有“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和印度也在增长中。亚细安本身的增长率也十分可观，到了2020年，亚细安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预计高达近4万亿美元。

作为一个治理良好、推行法治和拥有高学历人口的小国，新加坡应该能从这些经济增长中受惠。不过，前提是我们自己必须做好准备，有足够机智能抓住这些时机。

其实数据显示我国已经从“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机遇中获益良多。中国在新加坡的投资是它投入在“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的三分之一；新加坡在中国的总投资，则是“一带一路”国家对华总投资的85%。

一百年后，中国、美国和印度仍会存在。一百年后的新加坡则是个未知数。我们可以在一瞬间被世界淘汰，并且消失。丝绸之路上的那些遭人们遗忘的古老城市让我们引以为戒。新加坡必须不断进取，求新求变；我们要寻找新的方法，确保自己仍对其他国家有影响力，并且继续受到重视。

新加坡会继续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因为这些项目让我国乃至本区域受惠。我国也会继续与邻近国家、中国、欧洲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些年来，新加坡就是这么做，以国家利益为先，我们将继续这么做。

新加坡是否能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发挥作用？我认为可以，只要我们够机智能，可以抓住时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席唐武教授曾说：“一个小国如果能团结一致、拥有明确的目标并且专注寻找和建立良好关系，它便可以拥有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而且我们有很好的理由保持积极乐观，因为身为小国，我们在经济方面实力雄厚。许通美教授在这个月上旬也提出，虽然新加坡在领土或人口方面显得很小，但是我们并不是小国。尤其是以其他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比如外汇储备、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营商环境等。

激烈的竞争是肯定会有的。我们必须

须做好准备，也应该设想到周边国家会，比如说，想要建造更大的码头来同我们打对台，因为他们有权那么做。

我们必须很机敏、随机应变，并且继续扩充这些码头；我们也要有远见，和以往一样，决心为更好的明天做出必要的改变。这一来就能够保障我们的未来，并且可以确保新加坡依旧是东南亚区域的一个重要的停靠港口。

我们千万不可以轻易被动摇。就如《海峡时报》所报道的，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枢纽地位使我国的港口不容易完全被取代。

可是，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我们一定要认真看待新加坡的竞争者。虽然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但是我们不应该被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传言和信息蒙骗，认为新加坡即将被包围，并且孤立起来。

最后，我想说的是：正因为我们勇于梦想，大胆尝试，我们才取得今天的成就，我们不曾让任何国家欺负或屈意迎合其他国家的要求；许多国家曾尝试要我们这么做，但我们都一一拒绝接受。

利用丛林法则看待国际关系，小国身处险境。小国如果受到大国威逼或遭利诱，并让他国来决定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将无法长久维持国家的主权和自主。即使它们继续拥有国旗、国歌，或者在联合国保有投票权，它们将失去做自己的自主权。

这是一个攸关国家生存的课题。倘若我们允许自己被强大的国家或势力所欺负或引诱，这将破坏或严重打击我们的社会与政治契约。独立后的新加坡就建立在这项契约上；一旦被破坏，我们很难，甚至无法，重新建立它。

本文是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8月28日于2017年亚洲经济论坛：“一带一路”倡议：效果与影响”开幕辞的英语演讲节译

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

18 Evans Road  
Singapore 259364

电话: (65) 6516 5025

传真: (65) 6235 0248

电邮: [aci@nus.edu.sg](mailto:aci@nus.edu.sg)

网站: <http://www.lkyspp.nus.edu.sg/ACI>

截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的版本